



| 人间丛书 |

# 失语者的呼声

中国打工妹口述

本书记录了 16 位打工妹口述的故事

当打工妹满怀憧憬地来到城市以后，她们常常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超时加班，职业病和工伤的威胁，拖欠工资和人身侮辱，还要面对城市的冷漠与歧视。然而，她们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抗争，往往也难以取得全面胜利。

可她们为什么还不断地涌向城市？为什么进城了，又回乡，回乡了，又进城？进城务工仅仅是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或者是开阔眼界？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城市的繁荣离不开打工妹辛勤的汗水，因此，就不该让她们再付出辛酸的泪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ISBN 7-108-02390-3



9 787108 023902 >

ISBN 7-108-02390-3

定价: 23.00 元

# 失语者的呼声

中国打工妹口述





Copyright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 / 潘毅，黎婉薇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

ISBN 7-108-02390-3

I. 失… II. ①潘… ②黎… III. 纪实文学-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970 号

策划编辑 黄 华

责任编辑 黄大刚

装帧设计 朱 锷

设计制作 贾 鑫 [北京阳光谷文化]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北京第1版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889毫米 1/16 印张14.5

字 数 80千字 图 片 65幅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3.00元





# 目录

序 006

导言·小历史的火光 008

导言·在精彩和无奈之间开辟自己的空间 020

027 壹·离乡背井 | 1.脱离家庭才能得以“逍遥” 030  
2.钱是一回事，尊严是另外一回事 043  
3.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 052  
4.两手空空想回家 068

077 贰·寻找婚姻自主的空间 | 1.只为逃脱自我封闭的世界 080  
2.打工邂逅爱情 087  
3.为了找个避风港 097  
4.50岁女人的自主 107

117 叁·打工路上的苦涩 | 1.都是胶水惹的祸 120  
2.彷徨于打工路上 131  
3.机器轧掉了我的手指 143  
4.我的妹妹就这样没有了 155

165 肆·争取中成长的女工 | 1.深圳只是我一个驿站 168  
2.给工人装上一部电话机 181  
3.抗议中成长的秋月 191  
4.站在反抗线上的女工 208

“人间丛书”出版缘起 226

乐施会 228

“女工关怀”简介 230

# 序

庄陈有  
乐施会总干事

香港乐施会于1976年由香港的志愿人士发起成立，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独立发展援助机构。1995年，香港乐施会与其他8家乐施会一起组织成立了国际乐施会，现在委员会已增至12个，服务遍及120个发展中国家。而香港乐施会则专注在中国、东南亚、东帝汶、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以及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人道救援行动及发展项目。我们的宗旨是与全社会携手，共同努力，改变贫困、弱势人群的生活状况。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乐施会确定了5个全球发展目标，争取尽快落实贫困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这5个目标是：有权得到可持续的生活保障、接受基本服务、生命安全受保障、被聆听和受平等对待（包括社会性别平等和多元化）。

从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便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开发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社区组织发展、农村综合发展、增加收入、小型基本建设、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政策研究和基本教育等。1992年，乐施会中国发展基金建立之后，先后在昆明、北京、贵州和兰州设立了办事处，参与了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江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的紧急救灾工作。到目前为止，乐施会在中国18个省市，总共投入超过两亿港币的资金用以支持国内的发展建设。

近年随着城市化及城市发展，愈来愈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到城市寻找工作，由此民工权利保障问题也逐渐彰显。而乐施会也关注到民工所遇的种种困难，包括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工伤事故频发、家人不能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及保障等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表明了中国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平等的意愿，其中部分条文达到甚至是超越国际劳动法的标准。在《劳动法》实施的将近十年时间里，乐施会及合作伙伴对法律的推广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在法律框架内，探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模式和方法，在维权教育、法律援助及职业健康等方面做工作。在2003年，乐施会



开展了35个项目，投入超过六百万人民币，而2004年截至11月为止的25个项目，便已超过五百万人民币。另外，乐施会希望能与专家们研究和改善劳动法落实的效果，也同时增强工人文化素质，让他们能肯定自我价值，维护合法权益。

在法律实施的这个时期内，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外资量增加，我们当然欢迎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及发展，为我国带来更多资金及就业机会，可是跨国公司同时掌握操控市场的能力，迫使成本压低，导致劳工被剥削，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反而在不平衡的市场环境中变成压抑劳工的工具。在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大量工人下岗，而民办企业的出现，导致从农村到城市的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劳工问题，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呈现了劳工弱势、资本强势这个新景况；同时资本的国际化，使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其中所导致的问题，都关系到国内劳动者的自身生活和社会平等，比如，如何解决非正规机构就业者参加社保问题，以及《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监督预防困境等。乐施会希望跨国企业能够确立保护劳工的标准，对劳工问题肩负更大的责任，可是，他们的反应却叫人失望。全球化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大量机遇，但当所有人都在注意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维护劳动阶层的利益和保持社会公义。

乐施会在中国发展援助项目的经验，就是通过加强与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组织、贫困及弱势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社会共同协作的前提下，完成扶贫和维权的目标，共同解决打工者、下岗工人、非正规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和残疾人士所面对的问题。至于此等工作能否成功，则取决于我们在集思广益的时候，有没有反映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能不能确保她们的声音被聆听。《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一书，是“女工关怀”一次很好的尝试，它以最直接和全面的方式，记录了基层打工女性的声音，使她们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实践表达意见的权利。

## 小历史的火光

潘毅

1993年的11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7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外五十多人被严重烧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农民工们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火，闪现着社会创伤，也映照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现有社会、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的三重社会压力，这三者一起创造出一种以阶层、性别和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主体——中国打工妹。

这场大火已过去十多年了，中国打工妹的命运又如何？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社会境遇，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对接的过程中，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路。现代中国正在迅速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因此，我们曾经尝试在现代中国提出一种女工争取权益的次文体，它所承载的是女工们有声和无声的种种抗争，以及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妹生命之中的争取活动。

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和渴求的躁动，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劳动者

的牺牲往往被视为发展所必需的。小历史的趣味在于道尽大历史的虚妄，大部分人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起飞所引发的一些恶果（如贫富分化等）是必然甚至必需的，而本书所讲述的小历史将为这种论述画上休止符。

## 打工主体的生成

“打工”意味着将个体变成工作主体的过程，尤其是在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情况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工作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打工”一词意指劳动关系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打工”就是“为老板工作”，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或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意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打工妹”和“打工仔”成了两个在中国被非常广泛使用的词汇，与“工人”，即无产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更普遍使用的词形成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阶级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国家宣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是社会主义中国将劳动力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实现自我的新型主体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是为国家工作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老板”，不仅给工人发工资，同时还提供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总之，它是中国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打工”不仅仅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老板”，而且也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保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

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者则是劳动被剥削、具有阶级意识的新的蜕变体。

### 背井离乡的欲望

要明白打工主体的出现及其抗争的可能性，首先便必须探索打工主体欲望之所在。中国全球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打工潮从农村向城市的涌动，工业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面在既梦想成为城市工人，又梦想成为现代消费者的打工者中间将“现代化”神圣化。外出打工的欲望和经历错综复杂，想找寻一些线索弄明白打工者的生涯真是不容易。历史性和个体性相互冲突，相互胶着；我们的着眼处不在于历史性和社会结构性的因素，而在于个体在历史性中的种种挣扎和在种种困境中摸索出路。对于外出打工，我们的理解是源自一种历史性和结构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把中国农村的新生代一个又一个地送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轨道。书中，秋月把这种欲望说得浅白：“当时同村的女孩子出去打工，出去前穿的衣服都不好看，打工回来穿的衣服却好漂亮，而且皮肤也白了，人也漂亮了，这对我真的有点诱惑哩！”追求生活的改善原本是劳动者普遍性的心愿，女孩子追求身份的转变也是人之常情，只是给“现代化”的大话语套上，国家与资本的欲望，便成为个人的欲望，相互扣连，相互胶着。

欠缺和欲望，为贫乏的农村和富有的城市所滋生的阶级经验相互映照，贫乏的农村恰恰是欲望滋生的温床。慧的父亲是国企煤矿工人，90年代末下岗，家庭经济拮据，父亲在家里种田无法养活一家人，再加上母亲患上脑血管等疾

病，医疗费用昂贵，一次化疗几百元，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无法承担的，一家4口的生活便陷入困境。农村医疗制度的保障不足，已经让无数家庭举债累累，惶恐度日。

没钱治病，父亲的性情变得暴烈，经常打骂慧和她妈妈；慧的妈妈说：“如果不是你和你弟弟活在这个世上，我早就去死了。”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之高，恐怕也不用在此多加注脚。15岁的慧，便渴望逃离家庭，她说：“跑得越远越好，外面的日子会很逍遥。”借了同乡的身份证，慧就头也不回地往城里打工去了。

华的命运与慧的有相似之处，父亲得胃病，家里没有钱动手术，将当初只有6岁的她许配给人；直至华17岁，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母亲才告诉她。华当时已有男朋友，家人极力反对，她只有痛苦地分手。华对父母的安排怀着很大的怨恨，对于男方的迫婚，她别无选择，便只好离家出走。

华说：“那时候我想出来散散心，不想面对所有的问题，想逃脱出来，找一个空间放松自己。”问她出来打工是否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空间，华这样回答：“其实我没有找到什么，心里很难受。为了那件事，我失去了快乐，活着和死了一样……”

历史所造成的伤痛无法补偿，结构性的裂痕进一步加深，20年的经济发展没有为打工妹的命运带来改变。农村的生活贫乏依旧，进城打工的欲望没有稀释。

中红是一位河南的农村姑娘，属90年代打工潮中的佼佼者，她年轻，不喜欢农村，初中毕业后在城里学计算机，18岁那年，她背上行囊，和其他老乡坐上劳动局的包车，直奔南方打工去。对于像中红一样的年轻人来说，打工为的是逃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 城市打工生活

可是逃离农村，迎接她们的又是怎么样的城市打工生活？入城、受骗，是打工者的共同经历。阿芳第一天到达广州，在火车站旁，等待她的就是一群骗子。骗子当中有男有女，有的要带她乘车，有的硬要她买金链和戒指，有的要向她借钱。受骗的滋味不好受，阿芳咬紧牙关，独自找工去。多少打工姐妹像阿芳一样，她们出来闯世界，这个世界给予她们“最精彩”的序幕却是这些无奈。年轻的心灵受伤害，对人、对城市的不信任就这样产生，而且这种不信任深化着城乡的鸿沟。

相对阿红的经历，阿芳的受骗有点儿小儿科。阿红自幼失去双亲，大哥为她订下了一门亲事。为了逃避婚姻，阿红到镇里打工，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一年后，往宜昌打工的途中，阿红被老乡拐卖，以2400元的价格卖到了安徽的农村。就这样，阿红被迫与没有感情又大地十多岁的穷汉子结婚生子，苦闷的生活逼得她多次自杀，但都未遂。那时，阿红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回家，跟以前订婚的男子结婚。

出外打工，对许多打工妹来说，是想找寻一个避风港，但社会的无情，制度的压力，工厂生活的辛酸，又让她们跌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有希望时，背上行囊，往城里去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又发现老板太凶太无理，既不按时发工资，又经常骂人，打工者失去尊严，希望落空。回乡，很闷，无趣，无钱，又让她们蠢蠢欲动，再次往城里去。

芬的经历是典型的这种短暂而又重复的打工历程。她进了一间雨伞厂，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工资是计件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老板又拖欠工人工资，再加上食物不干

净，芬每天拉肚子，工作了二十多天，便撑不下去，于是便决定离厂回家。要求离开时，厂方不愿放人，不发“放行条”给她，保安又很严，芬只好尽量把衣物穿上身，然后在厂旁边的小杂物店把衣服脱下来，又回到厂宿舍里把衣服穿上带出来，就这样，她终于成功“逃出”工厂，连工钱也不要。

阿春说：“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才20岁的她，已经三进三出。第一次出来打工是1996年，进电子厂，负责剪灯脚，由于厂方没有发手套，手开始起泡发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便回家了。回家半年，阿春觉得无聊，又要向父母伸手要钱，于是第二次出来打工，进了一间生产VCD的电子厂，是焊锡位，她受不了焊锡线释放出的难闻气味，又跑出来。之后，她和一个朋友开了一间小店，结果受骗。她第三次打工是1998年3月，进了深圳一间印刷厂，每月700元工资。她的工作是将纸放入烘干机过胶，因工序中涉及化学品，如天拿水，所以和其他女工一样，经常出冷汗，经期也不准。阿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家乡。

就这样，打工者，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追逐一个又一个破灭的梦。“很累很累”是打工一族共同的语言，在工厂宿舍尖叫依然是女工的无奈的发泄。10年过去了，她们发出的声音仍如出一辙。慧说，尖叫也是一种解脱，好像心里的什么东西都随着叫声一起飞出去了。

难道除了尖叫外，打工妹们别无出路？

## 伤的自白

慧的尖叫不管如何也是一种力量，沉默的晓却让我们忐忑不安。对于她出来打工所受的伤害，她久久不能言说。

在珠海，晓进了一间有一千多人的塑料花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很差，由于做塑料材料要不时地烧熔塑料，再加工成不同类型的成品，因此车间里的温度很高。晓说：“经常会有危险，比如熔融的塑料落下来会把人烫伤，或者是在加工花叶时将手粘住；厂方没有安装空调，在高温作业环境下我们十分辛苦，但是这个车间的工资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多苦我们也要撑下去。”

可是，工作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晓进了那间工厂，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两名工人被机器轧伤手。

“我们车间里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她们的工作都是要用手把模具放进啤机（又名裁断机）内，有时工人没装好就按下按钮，手被轧到了；有时模具和机器也会失控，轧到工人的手。我刚去的一个月就有两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个女孩刚上班不久，手就残废了。后来，一个老乡做了二十多天就被轧到了小手指，只好拿着一个月的工资回家了。”

阿秀同晓的经历一样，进了一间生产电动马达的台资工厂。她原觉得这家工厂很不错，没想到这家工厂给她的一生带来了抹不去的阴影。

“我的工作负责装配马达的零件。厂里的管理并不严格，我做得很轻松，也很高兴。厂里的生活条件也不错，12个人一个宿舍，每个宿舍都有热水、冲凉房，每个人还有一个衣柜，厂方还给工人发被子、碗、筷等。”

阿秀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即将零件送入台钻钻孔，用手和脚踏着开动机器。早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机器就已被西方国家淘汰，但阿秀却在操作着，她说：“马达里面的那个零件上面本来有一个小孔，只要在机器上钻大一点就行了，好像不是很危险。事先厂方没有对工人进行任何安全培



训，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操作。那天我把零件放进去，可是机器失灵了，砸到了我的手指。”

“我刚到那个岗位才两天就出了事，组长很害怕。那时我差一点昏倒，但我知道手指没有掉下来，一直在流血，整个手已经麻木了，没什么感觉。坐车到了医院，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就听厂方的安排，截掉了手指。”

失去一节手指的阿秀很难过。“我想这下可完了，手都断了还有什么用，以前在家里父母邻居都很喜欢我，村里只有3个女孩子和我学历一样，找男孩子也可以挑别人；现在变成这样子，还说什么去挑人家，不知道能不能嫁出去。当时我很委屈，天天哭，好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和许许多多的工伤者一样，阿秀进厂打工几天就受伤，年近婚龄的她自此变得寡言、孤僻和自卑。

### 争取权益主体

打工妹之所以能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在中国，外资厂经常被比喻为桃花源，那里的少女们正在等待着男性们的追求。生产机器对普遍性的人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人，即女性才感兴趣。因为女性通常被想象为更加驯服、忍耐和适应工厂机器。

然而，作为一个打工主体，打工妹是自身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争取“行动者回归”而生成的一个主体。中国打工妹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图控制打工者身体的资本规训权力，因此，打工者将作为行动者展开行动来改变

自己的生活。

尖叫和梦魇，并不是打工妹作为主体进行反抗的唯一策略。会尖叫的慧，同时也会参加工厂宿舍内的集体行动，她进入深圳宝安的一间电子厂不久，便遇上了怠工事件。慧忆述，当时那间工厂每月扣工人150元的伙食费，但伙食却很差，都是一些烂菜。“最便宜的菜才给我们吃，大饭堂里面菜很脏，像猪吃的一样，而且是青菜炒虫，菜里全部都是虫子。”慧由于不满意伙食，草拟了一封信，要求厂方改善伙食，并且在宿舍内发动其他打工者签名，结果反应不好。不少女工因担心被炒，所以那封信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女工的不满仍是存在的。

伟珍是一位来自河南的打工妹，比起慧，她有更多的集体争取经历。伟珍本来是一间电子厂里的装配工，在流水线工作。除了不停地超时加班工作外，还要受主管的责骂。伟珍回忆说：

“她(主管)以前也是与我们一个车间的，以前管一条生产线，后来她管整个车间的两条生产线。因为她的管理方法不对，以权压人，很刻薄，我们都不愿让她做主管，所以我们投诉她，想把她炒掉或调走。我们几个员工闯进生产办公室去讲理，但经理态度很恶劣，瞪着眼，讲话也很没水平，凶巴巴地说他是皇帝，我们没资格与他讲条件。我们说，我们打工的是来厂做事的，是有头有脑、有思想的，并不是天天被骂的。”但是，跟经理反映后没有任何回应，结果，伟珍想出了以怠工的方法来反抗那个主管。

“因为我们那条线是第一道工序，也就是插件，第二条线是执锡，第三条线是组装，若是我们有半天或一天不上班，工厂就不能生产了。我们这条线有几十个人，人也比较

齐心，我在线上是坐第一个工位的。大家一传一，吃完饭就已经商量好，如果不加班就全都不加班。我们就是晚上忘工，白天不会的。”

后来，她面对的是工厂搬迁的问题。这一次，她又采取了忘工行动。

“当时厂方搬厂到关外的公明镇某村，并且逼迫员工，不想搬也得搬。厂方说，关外开发了一个新的工业区，有很多厂房，都是一流的，好像是想把我们骗过去。一部分还是搬去了，而我不想去，因为关外太偏僻了，治安也不好。整家厂的四五百人，只有二百人左右过去了。”伟珍回忆道。

由于不想去关外的工厂，她们开始辞工，但厂里不允许辞工，非要她们一起搬到关外去，否则就不给工资。她们没办法了，又不忍自己的血汗钱白白丢掉，于是，她们给劳动局送去了投诉信，并且亲自去了劳动局投诉。

提起去劳动局的经历，伟珍记忆犹新：

“我们一大群人，几人一组，分头出发。一组去区劳动局，一组去市劳动局，一组去区政府，还有一组去了特区报。我还是个代表呢！那时我们选了3个代表，我们去劳动局时，由于人多就只让我们3个代表进去了。劳动局的职员问我们这么多人来干吗？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事。当时不是很怕，唉！怕也没办法，就是怕，也要装出不怕的样子，为了争取权益，自己为自己打气吧。”

对于打工者的地位和意识，伟珍很是清楚的：若是不去投诉的话，我们的工资就会白白地丢掉了。

## 未能完结

打工妹，作为一个以各种形式的合作、反抗以及挑战为特征的特殊底层阶级，体现了支配与反抗这个双重过程，它们共同创造出这个复杂、叛逆而异质性的主题。打工妹是复杂、叛逆而机灵的主体，她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全能的支配体系，而且她们懂得应该如何如何在权力和纪律的网格缝隙中来进行反叛。无论打工妹们怎样无权，她们都不单只是“驯服的身体”。相反，她们是“机灵而反叛的身体”，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抗着霸权。我并无意要将这些生活实践或争取活动传奇化，但是，工厂女工们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一幅打工阶级“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

与西方的无产阶级化道路不同，中国的打工妹没有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对抗，也没有能够成为一股重要的反抗力量。外来工们作为城市过客的两个重要特点——无常和游离，也给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阶层力量设置了障碍。但是一有机会，打工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在对抗性集体行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争取活动。

简而言之，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关系、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以及争取活动。如果说，传统的阶级主体是一个将自己外化于他人的他者化的结果，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抽象形式，那么，这个新的打工主体则是“行动者的回归”的实现。从这个实现开始，一个人决定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方式

采取行动。这是对自我的坚定回归，对主体权利的掌控可以使其于强权之中捍卫自身。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的争取活动不应该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那种工人斗争。她们的争取活动既是打工者对不公平的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



## 在精彩和无奈之间开辟自己的空间

古学斌

执笔书写农村外出打工妹故事的时候，窗外传来台湾歌手齐秦的老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是否就是打工妹的心声呢？是否有人愿意聆听她们的心声呢？

现今徘徊在精彩和无奈之间的打工妹们，为何选择走出乡村呢？是什么吸引着她们呢？是出于一种纯经济的考虑，还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逼迫？是出于别人眼中的盲目或好高骛远，还是有个人背后的多重复杂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潮流从没停止过。人们对这种打工潮的理解往往是一种轻率而简化的解释。不少研究认为，打工妹的外出纯粹是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或者是对外面世界的盲目钦慕，社会上把她们的流动说成是“盲流”——盲目流窜，这成为农民工的负面代名词。

有研究将出外打工的原因分为4点：发展型外出、生活型外出、特殊型外出与生活预期型外出。发展型外出主要是指家庭生活并不太困难，外出打工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经济收入与个人发展。生活型外出主要是指因为家庭生活困难，选择外出打工赚钱。特殊型外出主要是指因特殊性事件而外出，如逃避乡村的人事纠纷等。生活预期型外出则是指外出打工者对未来抱有一定的期望，并做出了一定的安排，如赚了钱回乡办事业等。这种经济解释代表了主流的社会流动理论。

然而，这种对各种外出打工类型的划分，却没有解决个人与家庭、亲戚及朋友等一系列的互动关系。譬如，一个有

外出打工期望的妇女要受很多因素的限制,她们必须运用策略超越各种限制;而对一个已经外出打工的妇女,她本身却未必有出外打工的期望。无论是否愿意外出打工,青年妇女都必须面对家庭的安排,以及亲戚、朋友的干预,这些安排和干预改变着她们的期望,使她们在调适与家庭的关系中经历更多的抉择。可见,以推拉合力为依据的迁移流动理论简化了个人的外出打工动机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忽略了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视外出打工为一种毫无障碍的个人策略,并认为外出打工提升了个人社会地位的观点,是将打工对农民的意义简单化、夸大化了。

其实,外出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原因很多,经济考虑仅仅是一个表面因素,其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原因。有的是为改善家庭生活;有的是为支持家庭的特殊开支,如弟妹的学费、修建房子、负债等等;有的是希望改变女性在农村的角色而外出寻求创业机会;有的是向往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有的是逃避乡间沉闷的生活以及逃避婚约等。这些已非纯经济行为。

打工妹的故事说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单纯经济解说是乏力的。故事告诉我们,她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差,除了慧之外,中红、华和阿芳都来自小康之家,她们离开农村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华的出走是为了抗拒父母安排的婚姻,这使我们看到在农村父权的家庭里,女儿是父母的财产,女儿的婚姻是解救家庭经济危机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儿的婚姻也是父母履行其道德责任的手段,是中国农村中“互惠交换”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华的出走是无奈的,夹在家庭责任和婚姻自主之间,她选择了逃避。慧的出走也是基于家庭因素:“我受不了父亲暴烈的脾气,

愈快脱离家庭，就是一种逍遥。”父亲的坏脾气，以及其对母亲的暴力使慧觉得在家中无法继续停留，她终于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抗议，她逃离了家庭。可见，打工妹本身的背景和经历就是对出外打工原因的诠释。

也许有人认为，尽管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很多，但经济因素仍然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深究为何经济原因是农村人口外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为何农村贫困问题那么严重？为何农民生活那么艰难？也许有人认为打工妹对城市生活的追求是好高骛远，那么，我们是否看到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农民（或者说农村中的年轻一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恰恰是因为长期以来由城乡不平等加剧而造成城乡差距拉大。贫困是很多农民生活的写真，这种真实的经历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社会缺乏感，进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离开农村，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

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制度强化了城乡间的不平等，拉大了城乡以及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加强了农民的边缘性。户口制度一直被批评为对中国农民最不公平的制度之一，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身份界定——市民与农民，它加剧了中国城乡的二元分化。至今，这种行之有效并与票证制度挂钩的户籍制度，还在强化已经拉大的城乡差距，使农民在社会和经济上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

改革开放的今天，大量农民成为了新工业开发区的劳动力，被吸纳到工厂里打工。社会给他们以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农民工”。这种亦工亦农身份的出现，意味着户籍制度时至今日仍然强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社会。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工虽然改变了劳动的性质，但户口的标签使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这个被赋予的身份不断地



塑造着农民的传统、文化和自我认知。对于大部分农民而言，通过不同的手段(譬如用钱购买户口等)转变自己的身份成为城市人，始终是一个难圆的梦，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在城市的长久居住权，失掉工作后随时会变成城市的流浪人口，为此，他们还承担着被遣送回乡的风险。

并不是每个打工者都能赚到钱，也不是每个人的梦想都能实现。打工过程中还会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被城里人歧视、被老板欺负、被同乡欺骗等等。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农民继续外出打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经济困难，家中生活难以为继。但是，对很多农民来说，并不是物质生活改善了，他们就愿意留在农村，就愿意接受被赋予的农民身份；换言之，农民们潮水般地涌向城市打工并非仅为谋生，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这个角度出发，似乎更容易理解农村年轻一代外出打工的动机。

对于一些打工妹来说，外出打工生活确实为她们提供了另一种人生选择。外出打工可以帮助她们逃避原有的社会控制、繁重的农村劳动和单调的农村生活，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也满足了她们对城市的好奇，增长了她们的见识，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为她们彻底脱离农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这种选择在改变她们的家庭地位时，也会加深其家庭关系中的摩擦及冲突。

不管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原因如何，在各个打工妹的身上，我们亦看到一种能动性。她们是有思想的行动者，在不断的决策和行动中再次定义了其个人的角色，并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积极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通过交涉与种种环境结构(包括就业环境、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相抗争。虽然这个过程中有

很多无奈，例如在个人、家庭、事业和婚姻之间的协调与取舍，但是，她们仍然会在有限的空间狭缝之间找寻自己生存的机会。

她们要面对的太多，但她们还是一步步地走来，最后构成打工妹自己独特的人生历程，并展现给读者。







离乡背井

壹



人潮中幼小的身影，隐藏着少女不应有的疲惫，不应有的忧愁……



我们来自天南地北，交汇成工业区黄昏的一道风景线。



## I. 脱离家庭才能得以“逍遥”

来自江西萍乡市的慧今年19岁。出来打工已经三年多的她,已经由电子厂流水线上的打工妹转变成了酒店的服务员。她并不太喜欢打工生涯,出来打工是为了逃避紧张的家庭关系。

她是家中的老大,有一个弟弟,一家4口住在江西的一个以产煤为主的山区。父亲一直是国营煤矿企业的工人,母亲年轻时身体很差,16岁时曾经摔过一跤而导致脑血管发炎,原本学习成绩不错的母亲因此被迫放弃读书,嫁给了慧



小小离家,下班的路上,是否思念着远方的家人?



的父亲，开始了传统农村妇女的生活。慧的父母感情不好，每天都会吵架，所以慧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家庭。

## 只有脱离家庭

慧以前曾被父亲打过。“那时候很不争气，再加上本来就有些蠢，肯定免不了挨打，弟弟和我情况差不多。爸爸和妈妈三天一小吵，十天一大吵，还打架。去年我看见他们打架，很恐怖，我一直哭了很久，我常想妈妈的日子怎么过得那么苦啊！……他们吵架时也有人来调解过，但从来没见过他们讲和过。有些事情是因我而引起的，还记得有一次父母打架是因为我不小心倒了一点水在爸爸的背上，他就大骂起来，还骂了妈妈一句，妈妈一听就很生气，想报复一下，就拿东西撞了爸爸一下。其实只是撞一下，没什么的，就是平平常常的事。但爸爸却大骂她‘没教养’，然后就开始打我。因为妈妈的父母过世早，所以爸爸骂妈妈时，妈妈非常反感，这样一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后来越吵越厉害，接着打了起来，而且打得很厉害。那时，我躲在楼梯后面看着爸爸狠狠地打妈妈，感到很难过。所以，我出来是不想每天面对他们俩，不想面对这样不平静的家庭。”

慧的父亲在煤矿倒闭后就下岗了，每个月只有119元的补偿金和生活费，而且常常一整年不发工资。慧的父亲下岗后在家里种田，也没有出外干活。他脾气很暴躁，不是打人，就是骂人，没事也找出一些事情来骂。“我爸爸脾气太差了，他向来就是这样子。以前我爸爸一下班回来就吼妈妈，一直吼到现在，直到妈妈病倒了，他才对我妈妈体贴一点，他现在只是骂，很少吵，很少打架，不像以前那样了。我不喜欢这样的家庭，那时候我感觉到外面就没有父亲的打骂了，外

面的日子肯定比在家里好过一点，至少没有人对我动手，没有人打我。”

慧的父亲脾气暴烈也跟她母亲的病有关。家里经济一向拮据，母亲生病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而慧的弟弟还要上学。“妈妈看病化疗一次就是几百块，除了脑血管有问题外，还有好多病，如肾结石、肝炎、子宫肌瘤和胃病等。”于是，家里的钱都花在了慧的母亲身上。

“告诉你，爸爸脾气之所以那么暴躁，我想是因为妈妈的病，我妈妈总是生病，肯定要花好多钱！她身体本来就很差，又因为穷，吃不到饭，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妈妈给我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她说：‘如果不是你和你弟弟活在这个世上，我早就去死了！’她跟我爸爸关系很差，经常吵架、打架，她说她受不了，想去死，但一想到我和弟弟没有妈妈会很苦，就打消了念头。”说起母亲的时候，慧忍不住掉下泪来。

性格倔强的慧，对父亲的压迫非常反感，她竟有十多年没有叫过他“爸爸”。“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叫过爸爸了，因为我和我爸关系不好，天天跟他吵架，所以好多年没有叫他了，从八九岁开始就没有再叫他爸爸了。我叔叔曾经打过我，说爸爸是亲生的，是长辈，哪有女儿不叫爸爸的，后来我就叫了。当时爸爸的脾气真的使我很反感，慢慢地就不叫他了，现在觉得叫他我都会脸红。其实，我很后悔的。我已两年没回家了，回去时也没叫他，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还没找个机会叫爸爸呢？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没叫过一声爸爸。我舅舅和叔叔他们知道了，就开家庭会议。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叫爸爸，说实在的，我也很想叫，但很多年没叫了，再叫就觉得不自在。”

初中毕业时，年仅15岁的慧就很想出来打工，觉得没有

父母管束的日子会很逍遥。虽然她不确定前途如何，但很想试一下没有父亲管束的生活。

慧说她的性格跟妈妈有点相似，喜欢冒险，她认为妈妈的书念得比较多，素质比较高，所以胆子很大。那时候慧的叔叔在外面打工，慧就一个人南下深圳投靠叔叔。当时她刚初中毕业，只有15岁。她觉得，唯有出来才能逃离家庭的枷锁，脱离家庭才得以“逍遥”。慧跟我聊天时，总爱说在外打工的逍遥，在不被父亲管束的条件下可以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令她极为向往。然而，在那种“逍遥”的背后是她反叛父亲的痛苦。很多时候，她喜欢一个人独自在宿舍里对着外面



女工生活剪影

大叫大喊，唯有在大声叫出来的时候，她才会觉得心情舒畅，好像心里面的什么东西都随着叫声一起飞出去。

### 初次打工

1998年，慧初次出来打工，在同乡的介绍下，她去了深圳某工业镇一家电子厂工作，负责做录音带外壳，才9毛钱一个，每月工资450元。可是第一份工作并不顺利，她只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

慧解释说：“那家厂效益不好，听说厂方打算要工人放

女工休息的时候，工业区街道两旁的电话亭总是最忙碌的。



假，还要卖厂、换老板，没人给我们饭吃，没饭吃怎么办，觉得挺恐怖的。那时，我们又没钱，2月份进厂要5月份才发工资，也就是说，工资要押3个月。我有一个月一分钱也没花，也没钱寄回家，只跟别人借了100块钱买衣服。家人劝我辞工回家。”

“那时虽然很想家，却不大想回去，老想留在这里。”毕竟，慧是为了逃离父亲才走出来的。她借了同乡的身份证去了一家玩具厂应聘，交了10块钱的面试费，怎知那家厂要求员工懂白话（粤语），结果应聘不成功，最后，她还是跟老乡一起回家了。

慧打工3个月就回家了，家人没有给她热情的迎接，只有很冷淡的反应。她还记得：“那天下雨，没人接我，弟弟他们站在门外看着我提着几个包，都没有来接我。我当时就想哭，吃饭的时候桌子上连菜都没有，他们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该死回来的不死回来，不该死回来的却死回来了。’我说：‘难道我真的不该回来？’家对我还有开门关门的时候！想想很不公平。我饭没吃完就跑到楼上哭了，我很心酸，很痛苦。”慧并没有告诉父母在外打工的艰难，所以被他们责怪不应丢掉这份工作。

她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帮助家人种田，后来在深圳松岗的老乡打电话回来，告诉她那里有工厂招工，她又一次出来了。

### 徘徊在工厂之间的日子

在松岗她进过两家电子厂，但每份工作都只干了两三个月。慧表示，她是因为无法忍受那些工厂的劳动条件才频繁换厂的，其中一家台资的电子厂使她更受不了。

“那家厂对我们非常苛刻，晚上11点才关门，我们加班加得又很晚，一般都到晚上十一二点。平时我们只有半小时在外自由活动的时间，中午也不可以出来。厂规很严格，比如说不准穿拖鞋上班、不准打指甲油、不准留指甲、上洗手间不能超过3分钟，超过要罚多少，迟到一分钟要扣除勤工奖……”由于受不了那家厂严格的管理制度，结果她只做了两个多月又辞职了。

不久她转去宝安另一家中型塑料工厂做模塑机工人，大约有三四百工人，老板是内地人，但工厂劳动条件的恶劣使她难以忘却。

慧告诉我：“车间的温度很高，在外面穿棉衣，在里面可以穿短袖。因为是注塑，需要先用高温把材料熔得软软的，然后倒入模塑机成型，因此，整个车间的温度很高，大概有三十多度，而且通风条件很差劲。”

除了温度高之外，在熔塑过程中释放的一些气味令她很不舒服。

“有时有一层白白的烟，刺得眼睛睁不开，味道很臭很刺激，感觉肺很痛，但不管怎样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很辛苦的。我的鼻炎就在那里得的，一开始没发觉，后来一进车间我的鼻子就不舒服。此外还要把料打碎，料灰使我们的鼻子里时常黑黑的。”那时，慧也不懂什么是职业病，并不了解那些化学物品会影响她的身体，更不可能去劳动部门投诉厂方。

此外，啤工在操作机器时也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工人要把手伸到机器内的模具里，把门关掉之后，那个模具才能合起来。厂内其他老员工告诉她，数年前有个女孩子不小心被机器轧掉5个手指。“当时安全栓掉了，她好像晕晕地没有注

意，结果5个手指全部被轧断了，后来老板赔给她五六万元。”

她在那家工厂做了两年，那时候天天加班，起初她还是很喜欢加班的，因为加班愈多，任务工资也愈高。但后来觉得太累了，每天她在日记上只写着“好累好累”。2000年6月，那家工厂因接不到订单而倒闭。可是，当时老板没有给工人赔偿金就跑掉了。慧当时不懂《劳动法》，没有告老板。

### 被厂方拘禁

后来，慧找到了另外一家工厂，却想不到进了一家黑厂，还被厂方禁锢了一天，差点出不来。

“那家工厂是生产VCD的电子厂，我们有10个工友一起去应聘，全部考上了。进厂还交了30块钱作工服的押金，接着去培训，讲些电子知识，如电阻、电容等，然后就去生产线上工作。一个星期后，由于那些返工的产品(即因质量不合格返回来的产品)最后成了废品，就没有订单了。上午上班，下午放假，上一天放两天，我们做得没兴趣，大家都要走。”那时，不少女工都走了，慧准备离厂时向厂方去要30元的押金，怎知厂方说那30元算作伙食费，不肯退还给慧，还扣押了慧的行李、身份证等。当时另外两个同乡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慧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厂方竟把她关在宿舍不让出来。

“当时我想把衣服拿出来，但是他们死也不肯，我拿不到衣服，觉得吃了很大亏，后来难过了三四天就回家了。”

### 对家的思念

从塑料工厂出来后她再次回家，这一次，慧跟父母的关系逐渐改善了。

离开家乡一年多，慧不知该如何面对家庭，与父亲紧张的关系始终令她耿耿于怀，毕竟，出来打工能够逃离家庭的束缚。慧说在外打工的日子她有写日记和写家书的习惯，内容都是讲自己对家人的心情，也有些打工的感受，可是，一封家书也没有寄回去，她说那时很自卑、自伤、自怜，曾经想到寻死，有一次回家妈妈看到了她的日记，还骂了她一顿。她很生气，跟妈妈吵起来，后来再出去打工的一段时间里就不愿写信回家。说起这件事，慧泪如雨下，她懊悔自己不能成熟地面对家人。

尽管最初慧是为了逃避家庭而出来打工，但打工生活的

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数字水印

PDG



躁动不安，使她非常想家，也慢慢地化解了她对父亲的怨恨。

“那时真的好想回去，每封信都说家是怎样怎样的好。他们知道我喜欢小动物和花草，写信告诉我家里的那盆月季花很漂亮。虽然爸爸表面上对我们挺凶，但其实是喜欢我们的。我写信告诉爸爸妈妈，你们要爱护好那盆月季花，就像爱护我一样，见到那盆月季花就像见到我一样。我爸爸每天给花浇水，上次邻居小孩摘了两枝月季花被爸爸骂得要死。我一看到这里就哭了。”

那时，慧打算在秋天回家。她说：“我喜欢秋天，打算秋天回家，秋天格外浪漫，带着丰收的果实回家。本来我都计算好要赚多少钱，身上要带多少钱，怎样回家，那时我打个电话回家，在电话里面哭了半个小时。妈妈听了很难过，也哭了。那一次真的受不了，很想回家。打电话花了十多块钱。”

回家后，她只在家住了20天，然后去了深圳西乡一家电子厂做了3个月，后来又去了宝安的电子厂上班。不久，又遇上了工人罢工事件。

### 伙食太差 工人罢工

当时那家工厂每月扣工人150元的伙食费，但伙食却很差，都是一些烂菜。“最便宜的菜才给我们吃，大饭堂里面菜很脏，像猪吃的一样，而且是青菜炒虫，菜里全部都是虫子。”当时，有工人找老板娘要求改善伙食，但由于当时不赶货，竟有一百多个员工被炒掉，慧就是其中的一个。

慧也不满意伙食，她草拟了一封信，要求厂方改善伙食，并且在宿舍内发动其他工人签名，结果反应不好。不少女工因担心被炒，所以那封信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工人的不满仍是存在的。当时，原本有一个官员来访要参观工厂，工

人想趁机反映意见，厂方担心工人会起哄，最后取消了参观活动。后来，新员工忍不住发起罢工，老工人因担心被解雇没有参与。“有的人认为被炒也无所谓，因为辞退也要扣钱，而且还要等那么久。有一条新拉（生产线），工人是同时进厂的，比较好说话。最初罢工的只有她们一条拉，全部工人都站起来了；对面那条拉看见这种情况也借声势起来罢工。后来我们这条拉被关掉了。其实，关拉是一种错误的行动，有人怕工位没有，拖下去又会挨骂，要关就关了。我们这边的人也全都站起来了，但是对面没有人站起来。一个科长看见工人罢工，就带着保安马上来镇压，保安的架势很吓人，那个科长说谁要再罢工就马上把她拉出去。那个科长是我老乡，他指着我的头说‘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据慧讲，老板娘要炒掉工人时非常嚣张，表示工人走后就别再想回那家厂，当时参与罢工的慧认为那家厂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当下就离厂了。

### 转来转去的打工生涯

慧在几家工厂转来转去的打工生涯，使她不想在流水线上过日子。可是个人资历浅、工作经验少、文化水平又不高的她，不知道一个打工妹可以做些什么。她说自己在外流浪了二十多天后幸运地在宝安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当传菜员的工作。

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当酒店的传菜员，只知道自己已厌倦流水线的枯燥。在服务行业中工作要开朗，愿意跟别人聊天，她觉得这很适合自己。虽然她不懂白话（粤语），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工作经验，却很幸运地应聘成功，作了酒店的传菜员。

到酒店后，培训一个月上岗，底薪500元，小费是员工

平均分配的。这里的工资要比流水线女工高，算是不错了，但工作时间则是从早7:30到凌晨1:00，下午2:00—5:00是中场休息时间。慧比较满意目前的工作，她觉得在工厂里没有事做会很烦，而在这里每天可以说笑。由于慧为人比较开朗，所以她十分喜欢这份工作。

“在工厂里太死板了，限制人的走动，死气沉沉的。我们在酒店可以说说笑笑，可以走动，可以学点做菜什么的。”她非常满意目前的工作，只是当父亲知道她在酒店工作后很生气。慧勇敢地面对父亲，向他解释工作的性质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差，相信终有一天父亲会明白的。

### 感觉很累

出来打工数年，慧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学会了独立。与其他同乡相比，她自言爱冒险的性格使她增长了见识，即使自己出厂也不大担心没有地方落脚。不过，回想刚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段艰难和不开心的日子。

与其他打工妹不同，慧很少跟同乡一起。她最要好的朋友都不是她的同乡，觉得自己跟同乡的关系反而比较紧张。有时，生活小节中的摩擦使她烦恼不堪。在工厂里实行轮班制度，即日班及晚班的制度，所以女工的作息也会不同。那时同房的女孩子都是上日班，只有她一个上晚班，于是，她跟其他女工起了冲突。

“她们不尊重我，放录音机、吵闹、打门推门，影响我，好像故意整我一样。”慧也不是好惹的女孩子，早上她下班时就故意大力地关门，惊醒正在睡觉的女孩们。问到为什么她跟同屋的关系那么差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一起逛街时遇上抢劫，我们被吓

得不知所措，跑也跑不动，后来还被打了一顿，我们去报案了，也没什么作用，当时自己很惊慌。第二天我还是正常上班，在别人面前强装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因为不想将前晚不安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去。那时同房的女孩子不但没有安慰我，还在背后议论我，觉得我有问题，以后的关系就不是很好了。”提起那件事慧仍心有余悸，忍不住哭起来，她伏在我的肩膀上哭得很伤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人独处，不开心的时候，慧喜欢画画，喜欢写日记，甚至喜欢在宿舍内大声叫喊。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但是遇到了困难我的依赖性也很强。有时觉得尖叫也是一种解脱，好像心里面的东西都随着叫声飞出去了。有时逼得没办法，用这种方法解脱一下，感觉很好玩。旁人觉得闷，也会跟我一起叫，不过我只是很闷的时候才叫的。”

现在，解闷的方式已不再是叫了，而是打电话聊天解闷，即使没钱吃饭，慧也借钱买电话卡，跟朋友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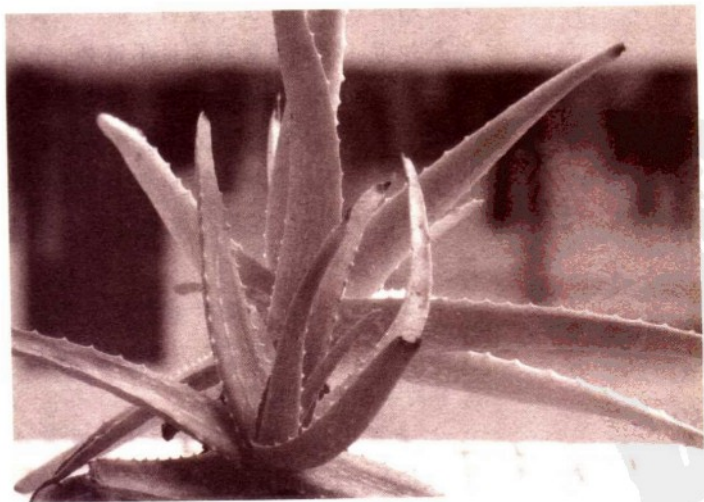
说到是否想在深圳这个城市落地生根，慧自言没有考虑过，城市的生活对她来说仍是遥远的。

“也许有人认为，打工妹出来就是希望将来留在城市。其实，我们还是觉得乡下好，乡下的日子好过一点。打个比方，那些吃皇粮的下岗了，饭都没得吃，不像我们可以种田、聊天、串门，乡亲之间可以沟通，日子过得也挺精彩的！”

## 2. 钱是一回事，尊严是另外一回事

阿芳，贵州人，今年20岁。1999年独自出来打工。

2001年，当我们第一次采访阿芳的时候，她刚下班，身穿蓝色工服，脚穿高跟鞋，还涂着色彩艳丽的指甲油——许多南方的打工妹都是这样打扮的。她的宿舍在工厂附近，守卫森严，我们难以进入。有一次，约了她却不见她，我们就走到宿舍的楼下大声地叫了她一声，她探头出来看着我们。这样，我们接触到了阿芳——这个成长经历与一般的打工妹不同的女孩。



拥挤杂乱的宿舍窗台上，一株芦荟生机勃勃。

## 独立性格的养成

阿芳家有4个兄弟姊妹，她排行第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姐姐自小不住在家中，被外婆养大。父母整天在镇上忙着菜市场的小买卖，照顾家庭的责任就全落在了阿芳的身上。她俨如家中的老大，从小就看管着弟妹。她觉得自己失去童年的快乐，压力很大。正如她所说的，上学时还要成天惦记着弟妹，担心他们会去河边玩水出意外。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感觉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那时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但现在想起来却有很苦的感觉。”

1996年，15岁的阿芳初中毕业。在班主任的介绍下，她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到湖南一家武术学校学习。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觉得到外地学习武术是件有意思的事，二是想摆脱家庭的担子，老大的角色让她觉得很累。

“那时是班主任介绍我去那所学校的。她对我很好，对我的期望也很高。快中考时，她问我要报考什么，我说自己也不知道，好多事情我都说不清楚。于是，她向我推荐了这个学校。她跟这个学校的主任关系很好，就把我介绍到这所学校去了。当时她把学校的条件、环境、出路等都和我说了。我考虑了一下，觉得武校毕业算中专文化程度，高中3年也不过如此，何况，在那个学校还能得到多方面的发展，所以就选择去那里了。”

那时，父母并不反对她去那所学校，但伯父觉得那学校是骗人的，学费太贵（一万多元）。但是，阿芳性格倔强，决定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

“我很固执，想做的事情不会反复地考虑，更不会依照别人的意见去做。人家的意见我会考虑，如果我们的意见差

不多的话，我会综合考虑。”

“我们那里是军事化管理。”在武术学校上学时，阿芳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锻炼，一直到晚上9点，还要学习一般的文理科知识。虽然很辛苦，但性格独立的阿芳没有很严重的思乡病。

武术学校的生涯使她养成了好斗的习惯。年少时阿芳很喜欢打架，她觉得跟别人吵架浪费时间，宁愿速战速决，以打架的方式处理问题，甚至看见同学互砍也不害怕，她说有些同学互砍后成为了好友。

武术学校还培养了她独立勇敢的性格，使得她面对困难时毫无畏惧。

## 不想依赖家人

1998年，阿芳在武术学校中专毕业。那时，她选择的专业是电子计算机。她觉得社会上人人都在学这个，不懂会比不上人家。

“计算机也是学校里开的一门课程。那时对计算机都感到好奇，挺先进的，不像现在那么普遍。另外计算机也很实用，不学就像是半个文盲。”

毕业后，很多同学回家等学校帮忙找工作，有的去做了保安。但阿芳觉得保安没什么前途，她说：“我想做文秘类工作，但这方面的人才一大把。另外还要看长相，我长得那么差，还是实际一点的好。”

阿芳很想毕业后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她说：“每个人都想自己好一些。”

想到深圳地方大，机会必定会多一些，于是，她独自跑出来了。那时，她的父母还不知道她去了深圳。阿芳很想独

立，觉得念书时已用了父母很多钱，不想再依赖家人。

“一个人在家里玩又没事做，真的很无聊，于是，我就背着一份小报带了两本书出来了。那时我不想带家里的任何东西，父母为我读书已经付出很多了。在我们那里，读书的目的好像就是等待分配工作，没分配的就会被别人取笑：‘这样的学校也去读，结果还是一无所有。’我也有这样的思想包袱，好想在外面做出个人样再回去，所以没跟父母说就走了，说了也怕他们伤心。”

初来的时候，她很是潇洒，只带着一个手袋、几本书和向她堂哥借的200块钱，连随身的衣服日用品也没有。她说：

她们的十八岁，  
又是在怎样的天空下渡过呢？



新学网  
PDG



“也许当时我不想有什么负担，反正那些东西要买也不困难。”

打工几年了，阿芳也没有特别想家，她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想家，有时候想一会儿，但很快又不想了，好像是习惯了离家的生活。”

### 逃出龙蛇混杂的广州车站

阿芳是坐火车到广州的。一个女孩子，没有老乡，没有朋友，一个人在火车站附近走来走去找去深圳的汽车。她并不害怕。反正来了广东，这曾经是她的梦想，她没有想到要赚大钱，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要好好地玩味一下。不过，在广州车站她连续遇到了不同的骗子。

第一天到广州火车站，就有很多接客的车把民工接去旅社。阿芳没住过那种地方，就跟着去了。那里一个大房间住了好多人，好像都是民工。在那里，她遇到一些好心人，雪中送炭地提醒了她。

“那个大房间住了好多人，晚上我口渴，想买水，旁边那个人说去买水很烦的，不要去了。我说：‘那我渴死了怎么办？’她说：‘我这里有水，你要不要？’她们在外面跑了很久，比较有经验。她们看我那木木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刚出来的，并叫我不要出去，说广州很乱。旅社这地方也很乱，怕抢又怕房间被偷。她叫我喝她那瓶水，还有个男的拿了一瓶茶叫我喝。那时，我不善于跟人家聊天，说了谢谢之后就睡得很沉。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反正我没钱，怕什么？”

第二天，阿芳继续她的旅程，脚下虽踏着城市的水泥路，却不比乡间的泥路踏实。广州的流花客运站同样是龙蛇混杂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很惹人注意，这一天阿芳遇到了一伙骗子。

“第二天，我就找流花车站。我不知道在哪儿，就想问别人，没想到在流花车站前转了很久，还没有问到，他们都说不知道。后来，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他让我给他5元钱就把我带去。其实，进门就是了，但我没有看到，但我想5块钱，肯定不远，就没有坐他的车。我转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又不知道在哪里买车票。

“接着来了一伙骗子。一个女的先问我要不要坐车，我说要，但不知道要坐哪一辆车，她说到下面去看一下。接着一个女的拿着金项链、戒指作为诱饵，想把我引上钩，其实她们是一伙的。那个女人问第一个女孩子，要不要买金项链和金戒指，说是哪个明星最爱戴的，这是她捡到的，准备卖掉以筹足回乡的车费，卖600元。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东西竟然还有发票，还是一个大商场开出来的。那个女孩子要我看一下，还问我有没有钱，想向我借200块。我说没有，有也不会借的。”

后来，那女孩子说去筹钱。于是，拿金项链和金戒指的女人说可以50块卖给阿芳。这时，又来了一个男人，硬要阿芳用50块买这些项链和戒指，而且还对她动手动脚，很不尊重。最后，阿芳遇到了一个好人，那人是帮别人拉东西的，实在看不过，就跑来帮她。

“他说话很凶，问我是不是要坐车，我答是。他告诉我这儿有什么车可以等，又告诉我坐什么车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不知道地方，他说只要给他5块钱就可以带我去。他带我走到上面，就没有那么凶了。他说：‘那些人是骗人的，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他带阿芳买了车票，阿芳给了他5块钱就走了。

多少打工妹像阿芳一样有过受骗的经历。她们出来闯世

界，这个世界给她们“最精彩”的开幕却是凶险。

## 靠双手打拼

刚到深圳，阿芳没能立即找到工作，她白天找工作，晚上在电影院内过夜。当问她，一个女孩子在那些地方不怕危险吗？她说不怕，也许是学过武术的原因，她对于黑暗陌生的地方并不害怕，但不要忘记她只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的那份释然让我们很佩服，并使我想起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里的阿云，她真得有点像电影里的阿云，单纯、勇敢和坚强。

阿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车间打螺丝，工资很低，也很枯燥无味。后来，姐姐带她来到宝安找工作，她找到一家制造学习机的工厂。

在这个厂，阿芳的工作是质量检查。工资还可以，每个月大概有一千五六百元，但工作很累，早上8点上班，白天工作8个小时，赶货时一般加班到晚上11点。于是，阿芳做了3个月就出来了。

此后，她又转到另一家厂，也是做学习机的工厂，还是做质量检查工作，这里的工资比第一个厂还高，但她也只是做了3个月，主要是因为工厂效益不好，老板不会再给那么高的工资了。

后来，她又找另外一家厂。

“那家电子厂在71区那里。我觉得那厂还可以，也是做普工。我不是说做普工不好，只是对做的那些东西不感兴趣。那家厂不要面试，但要考我们的文化知识和动作反应能力。我考试通过了，厂方就给我安排宿舍住下了。”但第二天阿芳就不做了。于是，继续她的寻厂历程，最后，她找到

了现在的这家厂。

对自己不断换工的做法，阿芳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对那家厂熟悉，我就没了兴趣。有时我也会想还是在一个厂做比较好，频繁转厂是很累的。虽然做好了能得到领导的提拔，但我们的机会却很少。如果没有关系，你做得再好，别人也不会提拔你。后来看淡了，如果没有提升的机会，就找工资高一点的嘛。”面对工作场所中的不公平，阿芳的做法也许是一种求生策略，那就是拼命地赚钱，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

作为积极的行动者，除不断“跳槽”外，阿芳还会积极地反抗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对于奖金的不合理，她就会主动提出抗议。尽管一开始大家说一起去谈，但最后没有一个人陪她去。即便如此，她依然独自一人去争取。

“(厂方)没给够我们应得的奖金，我们决定去找。刚开始大伙都说去，但最后没一个人去，只有我一个人去问主管。我问他工资怎么算，他说底薪600块，然后按你们做的算。我说我们做了那么多却没有给我那么多的工资呀，这样不合理。虽然他没有给我明确答复，但后来我们的工资还是多了点。”

2001年9月，再见到阿芳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的生产线最近有十多个员工罢工，因为工资太低，她是带头的一个。一向勇敢的她并不惧怕厂方，因为她自信是有技术的工人，厂方需要她。那次她们罢了两天的工，结果厂方给她们加了工资。

对于参与罢工，阿芳有自己的理解：

“老板不应该那么刻薄。不能有钱就是老大，他有钱又怎么样，大不了就走喽。”

“我觉得对《劳动法》要有大致的了解，不了解《劳动法》就说不出道理，就不能发现问题。但了解一点就够了，争取权益主要靠的是人齐心，人多大家就不怕，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不齐心，你一个人是挡不了的。”

“要有自己的尊严，钱是一回事，尊严是另外一回事，尊严是比钱更重要的。”



### 3. 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

今年20岁的阿春是广西南宁人，是我的访问者中第一个对我说很想做一个“当家”的女孩子。

她来自农村，家有8亩地，种的是水稻和玉米。因为叔叔进城工作将农田给了她的父亲，所以她家里的农田很多，经济状况也较其他农民好一些。

她身处大家庭，家中有7口人，父母及5兄弟姐妹，她排第二，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 无忧的童年

人家去玩的时候，作为家中较大女儿的她却要帮父母做农活：排水、养猪、种菜、浇水等。

“那时好辛苦啦！对于这些农活，我有些朋友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去玩。而我就不同了，我是迫不得已去做的，根本就别想玩。所以，我好羡慕别人。别人都去玩了，我却还得在那里干活。”

阿春说过，她自幼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性格比较独立，也比较开朗。那时的她很活泼，也很爱说话，而且学习成绩也好。所以，她的童年很快乐。上五年级时，她家中发生一件不开心的事，此后，她性情变得很内向，并开始沉默寡言了。当她提起这件事时，声音哽咽。所以，我没有勉强她说出来。

“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家里发生了突变，变穷了很多。于是，妈妈不再让我读书。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不吃不喝，哭了几天几夜。”阿春家中的经济状况骤变使他们成为了村中的特困户，每月接受村中的补助，因此，她不至于立即辍学，勉强地继续她的初中学业。

## 辍学——痛苦的抉择

经过一番周折，阿春上了初中。虽然她很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读书机会，并力争取得好成绩，但也许是期望越高压力越大，她的初中成绩很一般。家庭环境的压力是阿春必须面对的。

“那时家里穷，读书好辛苦。寒冷的天气，我连一件像样儿的衣服都没有，感觉自己生活得很惨，很自卑。虽然我

很努力，但成绩平平，加上家中兄弟姊妹多，弟弟比我小，家里都供不起了，能供我读书吗？这样一想，我就放弃了。”说到这里，阿春的泪水一直在眼眶中打转。

另外，母亲反对她读书也对她造成很大压力。“她常说女孩子不要读书，反正长大了就嫁人。我的母亲五十多岁，不识字，是个文盲。”愚昧的母亲困守在保守的观念中，竟又将套住自己的套子套在女儿身上。

阿春觉得母亲不认识字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许多生活琐事都要依赖女儿。可是，母亲又不让女儿读书，这一点令阿春很气恼。

“家里生活困难，做什么事都是先计划，再考虑，最后出资。由于妈妈不识字，每当计划时她都要我帮她写，家里搞些什么也要我去或跟着她去。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但她应该知道，不识字会遇到很多困难。”

更加让阿春反感的是母亲让她嫁人的话。

“一听她这样说，我就很反感。怎么能这样说呢？你看现在，好多出来打工的女孩子都是当家的，我以前工作的印刷厂的老板就是一个女孩子。在那里，男的只不过是给他一个位置罢了，全部的操作过程都是由女的来决定。”

14岁那年，阿春辍学了。那时候家人觉得她年纪小，不放心让她出来打工，于是，阿春一直待在家里做农活。直至15岁她才出来打工。起初，她在表姐的淀粉厂里帮忙搞卫生、干杂活，每月有160元的收入。同时，她还帮表姐、表哥看卖录音带和杂货的摊位，所以很少在家。

### 果园打工 差点嫁人

淀粉厂没有任何发展机会，阿春做了一年多以后去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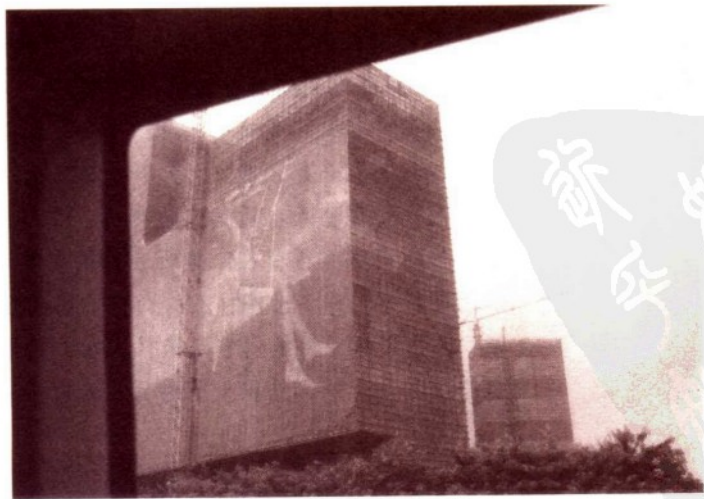


家果园打工。那份工作是同乡介绍的，当时同村其他女孩叫她不要去做，因为那份工作太辛苦，身材瘦小的阿春是承受不了的。不过，性格倔强的阿春认为别人越说她不行，她越要挑战自己的能力。

“她们都叫我不要去，说是好辛苦，我这么弱小做不来，到时还得哭着回来。就是因为她们这么说我才非去不可。你说我做不到，我偏偏要做给你们看！后来一做就做了一年。”

那时她才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

果园的工作包括采摘果园内的金橘、芒果、荔枝，还要修草和挑水果担去市场卖。每天8小时中不断要爬树、挑担，



真的是很辛苦。每月工资300元，只包住宿不包伙食。

身高只有1.56米的小阿春力气还是很大的。

“我的力气很大，十多岁就能挑起一百多斤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挑得起的，可能是被生活磨炼出来的。”

做了一年多，勤奋朴实的阿春深得果园老板的欢心，老板打算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娶她。有一天，老板将这个想法告诉了阿春，本以为阿春二话不说就会答应，没想到她干脆地拒绝了。

阿春表示她还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对她来说，人生还有许多事情要去体验，要去发掘，她不甘于这么快就走进婚姻生活。

“想想自己年纪这么小，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做，谁愿意这么小就嫁人呢？那时我还小，一想到这么多事就觉得怕，所以立刻跑掉了。”于是，阿春骗老板说家里有事，要立即回家。她回家后，那个老板还到她家去过几次，叫她再回果园帮忙。

虽然阿春回家了，但事情并没有立即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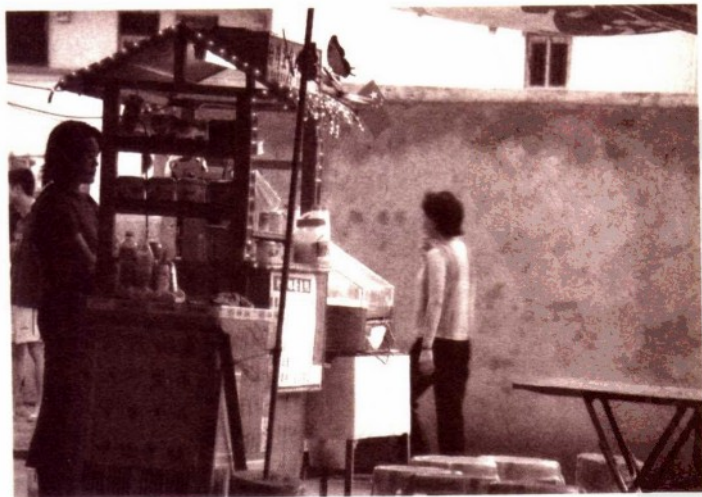
“同村的人回来对我妈说，他们家里一年收入几十万元，如果我同意了这门婚事会有很多好处，如此等等。妈妈回到家后就和爸爸一起说我，这么小先不要想这些事。我是什么都没想，是那些人自己编造出来的，纯属造谣。不是吗？”

当时阿春觉得留在家里听各种闲言碎语实在没有意思，加上那时家乡许多出外打工的女孩子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回家，这让阿春觉得她们看起来很成功，很开心，所以自己也很想出去闯一闯，见识一下世界，开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 第一次出来打工

1996年，同乡带她到深圳南山区打工。刚来一星期，她就入了一家电子工厂。那时，进厂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有未婚证、身份证及边防证就可以了。当时她做装配，每天工资12元。对于一个新进厂的农村女孩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从此，阿春的打工妹生涯正式开始了。

“那时，我很好奇，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想玩，什么都想做。由于工厂区附近很荒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所以，我下班休息时很少外出。有时间常看《佛山文艺》



一类的杂志，那些杂志有很多打工妹的故事，尤其是爱情故事之类。”回忆当时的情景阿春还是有点兴奋。

不过，她只做了两个月就不做了，因为她遇上一个很凶的主管。那时阿春被骂做是做工不够积极。“那个主管是新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却偏偏叫我们跟着他做。等知道该怎么做的管工看过后又骂我们：‘谁叫你们这样那样做的！’”

当时阿春负责剪灯脚。“不是有些录音机有花灯的吗？那些花灯脚都是铁的。工作时没有手套，剪十几个花灯脚，手就起了水泡，水泡烂掉时很痛的。后来，我的手全都起了泡，并且肿了起来，所以就不想做了。”

那时正值春节前夕，阿春回家了。因为打工时间不长，没赚到什么钱，所以她没有买东西，而是难为情地“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这使她的母亲很惊奇，她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呢？

## 二次出来打工

阿春在家的半年里，要么干农活，要么去朋友家串门儿。渐渐地，她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聊。

“当时想在家里没什么做的，还是出去打工好一点儿。这么大个人想买点儿东西，还得跟老爸、老妈伸手要钱，真的很过意不去。所以，即使帮不了家里什么，我也想出去赚些钱。”

那时，刚好老乡往家里打电话告诉她某加工厂招工，于是阿春又一个人出来了。

老乡介绍她进了一家生产VCD的电子厂，工位是补锡铁、执锡拉，每天工作8小时，工资15元，比以前的工厂好一些。可是，焊锡线的工位释放出很难闻的气味，而厂方却

没有给工人派发口罩。

“那些烟熏得脸很痒，毛孔都大了。”那时，她还不清楚焊锡线释放出来的气体对工人身体是否有害，更不懂得向厂方反映。当时，工厂为了赶货，竟然不批准工人辞工，阿春受不了那些焊烟，辞工又不批，结果舍弃了一个月的工资自己离厂了。

## 自己开店

她之所以这么快离开工厂，是因为她的一个旧工友想和她合伙开店，那个旧工友告诉她在蛇口开间小店可以赚大钱。虽然阿春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但经不起朋友的游说。于是，她心动了，二话不说向朋友借了2000元去圆开小店的梦。

那时，她离开工厂只有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一出工厂她就马上开店了。

“跟我合伙的那个女人是我以前工厂的拉长，广东人，那时她对我很好，所以我很信任她。她说我现在为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去开个店铺，不用受气。后来，我就借钱和她一起开店了。”

她们在蛇口赤湾旅游区开了一间小店。

“那个女人说那里生意很好，说那里旅游的人多，便宜的东西可以卖得贵一点儿。如果我们自己去进货，肯定会赚钱的。于是，我就跟她去了。其实，我很天真，什么都不知道，觉得自己开个店铺就不用打工了，没想过这样行不行得通。

“我们开一个很小的店铺，用不了多少钱，几千块就够了。我有个好心的朋友，把冰箱和其他东西借给了我，所以算起来用钱不多。我自己出了两千多块钱，拍档只出了500的租金。

当时我没想过做生意，没想过开店，没想到，说做就做了。想到两次打工所受的气，我就不想再进厂打工了。”

她们签了一年的租约租了店铺，阿春认为，如果生意好的话，就继续签，不好就不签了。起初小店的生意不错，每天也有一百多元的收入，每月就足有数千元的收入。可是，她的拍档在账目上很混乱，大家开始为了钱而发生争执。

“货是拍档去买的，我不清楚货源和单价，她也没告诉我，只告诉我该卖多少钱。我们的商品都是快餐面、冷冻品等，成本是多少我也不知道。由于账目很不清楚，我们整天吵架。”

城市与农村，生产与消费，丰富与单调。



新子如学  
PDG

“后来生意不是很好，两个人也合不来，成天为了钱吵架。比如说进了这么多的货，也没有赚回那么多的钱，那些钱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就这样两个人成天吵架啦！搞到最后我只好走了。”

当时阿春什么也拿不到，连2000元的本钱也亏了。

“这2000元我一分也没拿到，只是拿2000块钱买了一个教训。以后的我不会那么幼稚了，开店最好自己开，最好一个人去承担一切，出了问题自己明白，什么都清清楚楚的。”

拆伙后，她没再联络她的拍档。据阿春说，当时离开时她有一部录音机留在了店铺内，她想回去取回自己的录音机，竟被她的拍档说成是偷钱，还警告她再回来就找人打她。阿春觉得很委屈，也不再回去。

对于拍档的欺骗，她感到很愤怒，同时后悔自己太冲动。

“我是太信任她了。我只是想大家互相支持合作一点，没有想到那么复杂，到后来变成那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好多事越想越不敢做，所以干脆不想那么多就去做了。”

由1997年10月下旬至1998年3月中，5个月小店的梦就结束了，她觉得自己最后是“两手空空地出来”。

### 重返生产线做工

结束了开店经历，1998年3月朋友介绍阿春进了深圳南油一家印刷厂做工。厂内有两百多人，每月底薪600元，包吃包住，若在高温的工位工资还多100元。因为她负责高温工位，所以每月有700元的工资，表面看来还算不错的，但事实上这700元的工资来之不易。她主要负责将纸放在烘干机内“过胶”，因为烘干机温度很高，工作岗位非常热。此外，印刷工序中还使用化学品，如天拿水，用来调配胶水。

由于厂里没有安装空调，工作非常辛苦。

那时厂方要求工人每月上班至少有210个小时，即每星期要上班五十多个小时，这与《劳动法》规定每星期40小时工作有着相当的距离。阿春说那时她不懂《劳动法》，根本不会认为厂方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工作有时是计时的，有时是计件的。

她喜欢计时工作，因为对工人而言计时工作没那么辛苦，而计件就不同了，如果遇上一些很难的工序，计件工作对工人是很不利的。

“计时有时没固定数量，可以做慢点，让时间过去；而计

绿阴下的午后，难得的倾诉时间。



新学如学  
PDG



件是自己做多少得多少，多劳多得，不过有的产品好做就做得快，有的产品很难做，我们就向主管反映要计时，否则就不做。比如说，有的纸好就很容易放，但有的纸不好，我们就要放得很整齐，不能超了线；有的纸很薄就很难放，超过了过胶的线就会报废，如果放不整齐，机器就会转掉那些纸，这样纸就报废了。”据阿春讲，计件时厂方会下达生产指标。工人往往想多劳多得，于是不停地将产量加大，而厂方见产量增加，又会提高生产指标，最后导致工人没法休息。

工人为了避免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以致太劳累的情况，会协议当天的生产量，以免厂方不停增加生产量的指标。

“有些人确实做得很快，并且，一天超过十几个小时地做，这样产量就会增加。刚开始，（厂方）产量定得很低，我们加班费每小时三块多，本来大家都讲好不要做得太多，太多（厂方）会加产量，但有些人太贪心啦，每天做得超出很多，这样厂方就会增加产量。以前本来慢慢做就可以达到产量，现在没时间玩了。最开始，我们是计时工作，生产经理问我们平均一天做多少，我们会报个低的产量，计时就是可以慢慢做。”

## 再次回家

工作中有时要调胶水的比例，所以阿春要接触化学品（如天拿水），要闻这些化学品的味道。她说自从接触这些天拿水后，和其他女工一样，自己也变得有时会出冷汗，经期也不准了。但她不知道这一切与接触天拿水是否有关。后来她听说有个女孩在厂内工作了6年，因为每天重复放纸的动作，手没了力气，不能运用自如，最后竟不能动了。当时工人们还没有职业病的概念，那个女工只有自动离厂。



阿春在这家厂做了一年多以后又回到了家里。

其实，阿春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回家。流水线的苦闷生活使她想去开小店，却被朋友骗了；重回生产线又被工厂制度严格地控制着。她实在不能忍受了，对她而言，回家也许是暂时休息。

回家之后，阿春要做小商人的梦再次驱使她开店。

“我比较喜欢自由，不喜欢受别人管。在工厂不自由，天天有人管，自己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不需要受人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时，她的家附近有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她去那到处看看有没有办法取些货，转行卖服装。后来就开了一个小店卖服装，不过只做了几个月生意就不行了。

### 转做服务业

1999年底，阿春再次出来，重新回到1997年出来打工时进的那家电子厂。

这次她还是做普工，待遇和以前的差不多。不过，流水线的组长对她们很凶，整天都骂人。

“组长每天都骂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骂的话很过分。我写过投诉信但是不敢投，怕连累其他人，她(组长)会查的，后来我就走了。好像很多人都麻木了，很多人都被骂但不敢出声。她骂我，我也骂她。”

辗转于多家工厂的阿春已经非常厌倦流水线的工作。这时，朋友介绍她去了宝安的一家糕饼店做店员，每天工作九个小时，上午6:00上班，下午3:30下班，每月工资500元，包吃包住。阿春觉得不错，只是吃饭时间不大正常，有客人买东西就不可以吃饭。

她认为服务业轻松一些：“店里不像在流水线天天对着零件和机器，还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不过，做店员要成天站着，不可以坐，也很累，我还要主动向客人介绍哪些食品好吃。起初很不习惯，例如主动对客人说‘欢迎光临’就说不出来，想说时好像有什么堵住了口，即使说出来也不习惯。但是，我最后还是逐渐适应了。”

原本，阿春很想安安稳稳地把这份工作做下去，可是做了3个月后，老板却要调她去东莞的分店，她很不愿意去。一个人出来到城市打工的感觉是很孤独的，来了深圳几年，朋友老乡都在这里，她不想离开，因此，只好另寻工作。

有了做糕饼店的经验，她很快在南山找到一家面包店的工作，原本老板只愿给她400元的工资，但她要求至少500元才做。没想到，实际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间与上班前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老板讲话不算数，包吃包住400元，但之后就扣水电费，还这里扣点，那里扣点。那个老板真的很讨厌，对工人一点都不好，没一个人喜欢他，每天工作10小时，早上6:00至下午4:00，还要我们加班，但又没有加班费。他的店开到凌晨2:00，一般的店是不会开这么晚的。明明说是下午4:00下班，可经常连晚饭都吃不上。”

“我们住的地方很远，老板一直不给我们房间的钥匙，有时候没人开门我们就进不去。男男女女住一起，厅里住男孩，房里住女孩。我真的不想做了。”结果，一个多月后阿春就结束了这份工作。

在这个人浮于事的社会里，没有学历和资历的打工妹找工作很难。虽然阿春懂得白话（粤语），但服务业的老板往往选择那些标致且懂得打扮的女孩子当服务员。

“老板也挑人，一般要靓点儿、年轻点儿并且会打扮的女孩子。”虽然不少农村女孩子对化妆品和时尚服装感兴趣，但阿春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些东西，她仍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农村女孩。

“我不喜欢口红的味道，对它的气味很敏感。有人说不涂口红老板发现了要扣钱，可我就是不想涂。服务态度好，面包做得好吃点客人就会多了，人家又不是看到有靓妹才去买。即使打扮也要适当点儿、自然点儿。”

### 劳动力的价值

虽然阿春在深圳发展并不顺利，但她仍然喜欢在那里的生活。她觉得在外面总有一片广阔的天空，尽管生活有许多苦涩，但生性乐观的阿春却很少怨天尤人。她觉得这几年的磨炼让自己见了世面，多了社会经验。然而，她对于打工妹这个被人看低的身份，总是愤愤不平。

“比如在街上买东西，若是看了不要，他们（摊主）就会说：‘你这样的死打工妹，没有钱就不要来看。’打工怎么了？打工就打工嘛，反正我出力你出钱，我又不是白拿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呢？好像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其实我们的劳动很珍贵，不要以为给了我们一点钱就很了不起了。”

“没有我们的贡献，就没有这么繁荣的经济和社会！”

阿春找了两个多月的工作仍未成功，她说很想回家休息一下。

2002年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早上，我送她去公路旁的汽车站等候长途汽车，身材瘦小的她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叮嘱阿春路上要小心，她说：“每次回家都是一个人，习惯

了就不怕了。遇上陌生人的搭讪，不要理睬就是了。”

车来了，她跟我挥手说再见，大家当时都很平静。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真的再见。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我突然感到一阵阵的心酸，与其他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孩子一样，她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呢？

阿春离开我们回家时曾说打算回家养鸭子，希望在养殖业上干一番事业。差不多近半年后，我收到她的来信。她说家乡前阵子发大水，田地里的稻谷和其他农作物都被淹死了，所以今年收成很不好，村里各农户都很困难，但还要向村里和政府上交“提留”及各种税项杂费。她在考虑什么时候再出来打工。此后的几个月，一直都没有阿春的消息。

2003年5月，正在想她的时候，我们又接到了阿春的来信。阿春说现在家里正在农忙，每天大清早都要卷起裤脚，头戴草帽，顶着太阳在田地干活，可惜家中没有照相机，不能为自己照一张相片，让我们看看她作为一个农家女儿的模样。她还说在家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始终不知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

在家乡，她成天买彩票，并等待周二、周四的来临。本以为彩票能给她带来一些希望，但彩票中不了，她还花掉了很多钱。以前在外打工挣的钱花光了，心情很郁闷。她说，也许过了这次农忙她就考虑再次出来，看看这个城市还有没有她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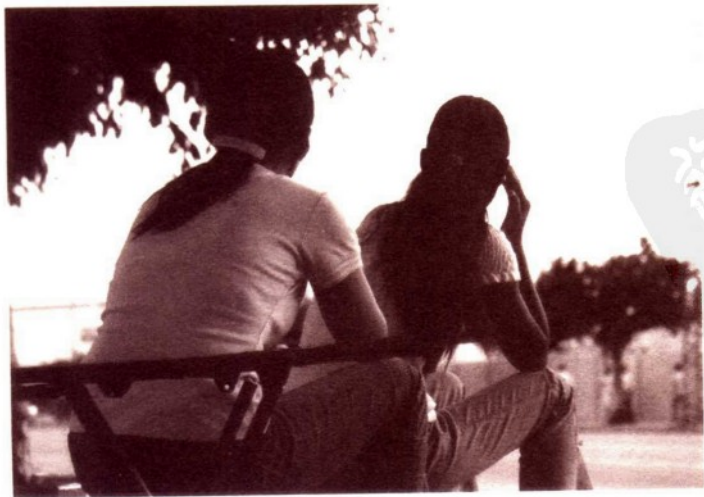
看着她的信，想起她说：“回去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再想回去，回去之后又想出来，就是这种心态。”

#### 4. 两手空空想回家

26岁的小燕来自陕西农村，曾经性格开朗的她，由于相信同学而参加传销，被骗取大量钱财后变得很孤僻，不愿意和其他人交往。在她看来，那次被骗失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人际间的信任。她在信中曾这样对我说：

“去年6月底，在一位同学的唆使下，我加入了一家所谓的连锁加盟推销公司，其实就是传销。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传销集团就被查封了，我因此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务。这些钱是我从家里骗出来的，我谎称在广州学习需要钱，尽

暮色渐阑，  
临街远眺，  
是抹不去的乡愁。



数字水印  
PDG

管当时父亲因手术也欠下了债，但是为了我能出人头地，他们还是把钱寄来了。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找到一份可以还债的工作，而且身无分文，没有钱给家里打电话，我也不敢和家里说我现在的情况，怕他们担心。现在的我真是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却骗了他们，今生今世我也无法偿还这笔情债，真不知压在心头上的这块石头何时才能除去。”

### 幸福的成长环境

小燕在家排行最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家里人都很疼爱她，她是在一个幸福的环境中长大的。家里种四五亩地，由于用机械耕作，干农活不算太累，父母也不用她做任何家务。

“小时候，我不喜欢干家务活。做事时，哥哥和姐姐就会帮忙，父母也会依着我的意思，从不责备我。可惜，在家时从未体会到父母的爱，出来打工后才知道父母对自己的爱有多深，也明白了父母为儿女付出了多少心血。”

小燕毕业后，就和村里另一个女孩一起到广东南海打工。在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中，她俩走得最远。临走时，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她们。至今，小燕想起来都觉得很感动。

“我们要在西安坐火车，在西安打工的很多村里人都来送我们，还带了很多东西，说不放心我们两个女孩子到这么远的地方打工，一直把我们送上火车，弄得列车员问到底是谁走，车上的人也说我们很幸福。当时我没什么感觉，可火车的汽笛一响，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只有一种感觉：我马上就要离开家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 出外打工遇上的善良人

由于一个同学的关系，小燕很顺利地进入一家表厂做仓库管理员。工作很轻松，每个星期都有双休，和同事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对于工作方面，小燕没有做太多的描述，只说打工生活中的一件事让她无法忘记：

“我每个星期都会出去玩。那天正好发了工资，我一个人就去买衣服了，然后去买米，可从米店出来的时候把钱包忘在那里了，买菜时才发现钱包没有了。当时我很急，也想不起来忘在哪里了，过了一阵子想到可能是落在米店了。可我听说广东人很凶，不敢回去找，但是钱包里有一千二百多块，那可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到米店。我问老板娘钱包的事，她说没有捡到。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连回厂的两元钱车费都没有，后来我就在那里等，想遇见熟人求救。等了很久，那个老板娘突然站在我面前，让我跟她走。我当时非常害怕，以为得罪了她，她要报复我。但没有办法，只得跟着她。到了米店后，她又和我确认了一下钱包里的钱数，然后把钱包递给我说：‘小妹妹，对不起。你第一次来我店里时说有一千多元钱，我不敢相信，因为我看过里面只有十来块钱，但你走了之后，我发现原来钱包里面还有一层，的确如你所说是那么多钱，所以我到处去找你。以后小心点，别再这么粗心大意了，还是早点回厂去吧，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我当时很感动，除了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下一个双休日，我买了些东西去谢谢那个老板娘，可她怎么也不肯接受，说那个钱包本来就是我的，她应该还给我，在我一再恳求下她才收下了礼物。这件事让我对广东人的印象完全改变了，我觉得广东人并不像人们所形容的那么冷漠，世上还有很多好心人。”



在表厂这一年多的打工生活中，小燕没有遇到大的挫折，在有些事情上还能遇到好人，让她逢凶化吉，因此，她对别人非常信任。但是，家人非常担心她在外的生活，她也很想家，所以她请假回家了。回家后，妈妈以没有老乡陪同为由，不让小燕再去南海打工。于是，她去镇上帮开中巴的舅舅卖了一年多的车票。

### 被传销害得很惨

2000年，同学邀请小燕到肇庆做传销，并在信中“承诺”让她在一家公司做工作轻松、工资高的科室人员。小燕



对传销了解很少，就和回家探亲的表哥一起来到广东。她本来可以在表嫂所在的工厂工作，但考虑到同学介绍的工作可能会更好些，于是，她去了肇庆。

让小燕感动的是同学居然请假到车站去接她。到了同学的住处，她发现屋里有很多老乡。她们的热情款待使小燕感到很温暖，一点疑心都没有。

“我刚去的时候，她们对我很好，我本来就性格开朗，喜欢这种热闹气氛，于是住下来，根本就没想到同学会骗我。”

第二天同学就带小燕去见主任，也许是同学感到心虚，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反而另一个老乡说公司需要业务员，他去和主任讲一下就可以让小燕做。小燕虽担心自己做不下来，但想到同学也不容易，就什么也没说。

到了公司，主任和其他人为小燕介绍了公司情况，这些人将这个所谓的“连锁加盟公司”（实际上就是传销）说得很好，消除了她心中曾有过的一丝疑虑。于是，小燕决定相信她们，并逐步接受了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

“在前面加入公司的，确实如他们所说的每介绍一个人加入就可以得到580元。我去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一共介绍了四十多个人，所以他每月就有几千元的收入。可能是故意诱惑我们，他们每次都在我们面前给员工发工资。他们还找了一个男孩子跟我说以前在家里被传销骗过，但这个公司不一样，绝不是那种传销。我慢慢地解除了思想戒备，相信了他们，并接受了他们的方式。”

后来，同学让小燕筹集7000元，其中3800元是上缴给总部的风险抵押金，其他的是自己所需的通讯费和生活费等。没有多少钱的小燕有些犹豫，但同学告诉她每介绍一个人加入就可以获得580元的回扣，没多久就可以把那笔钱赚

回来。小燕觉得有道理，也就去除了所有的戒心。

同学让小燕打电话向家人要钱，理由是在广东学习需要交学费。犹豫不决的小燕还是给家人打了电话，父亲担心小燕上当，询问了很多问题，但小燕肯定地告诉父亲没问题。于是，刚刚做完眼科手术并欠债的父亲去银行为小燕贷款，还向她的舅舅借了2000元。就这样，小燕凑够了7000元。

“没几天，家里就将钱打进了我的账号里，我赶紧取了出来，拿着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先去了肇庆的西江边，那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坐在那里我心里很难受。从那以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压抑，不敢给家人打电话，我欺骗



工业区天空的最后一抹霞光，吃完饭的人群已经渐渐散去，剩下一些人仍围在档主的电视机前不舍得离去。

了家人，对不起他们。”

小燕交钱后的一个月，那家公司就被查封了，负责人和秘书早就带着骗取的四十多万元钱跑掉了。

“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谁都没心情吃饭，不知该怎么办。多数人的钱已经用光，没钱交房租，我和同学只好去深圳的另外一个同学那里落脚。我不敢回家，没脸见任何人，父母的血汗钱没有了，那种滋味真是难受极了。”

### 打工收获空空

后来，小燕和同学进了深圳龙华的一家工厂，几个月后工厂因效益不好而倒闭。两人又转到西乡上班，厂方几个月都不给工人发工资，身无分文的小燕只有靠同学接济生活。

唆使小燕参加传销的同学一直很愧疚，但小燕是个善良的女孩，她原谅了那个同学，毕竟两人都是受害者。

“我没有太多地怨恨这位同学，怨她也没用。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不能因为几千元钱影响了宝贵的同学感情，再说她也是受害者。钱是身外之物，感情才最重要。”

最令小燕为难的是不知该如何面对家人。虽然她从未向家人吐露半句有关传销受骗的事，但家人通过她的表哥已经了解了她受骗的情况。但是，他们因为疼爱小燕，只字不提那事，反而问寒问暖。这无疑增添了小燕的心理压力。

“一年以来，我一直不能放下心中的包袱，觉得自己没有脸面见父母。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更不敢说那笔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家人和我都心照不宣，但他们怕我伤心而绝口不提那件事。我曾经承诺半年后会还上父亲的贷款，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被骗之后，有一次给妈妈打电话，她问到我的学习情况，我只能违心地流着眼泪说‘好’。现

在，我很少写信或者打电话回家。”

说到这里，小燕原本平静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了。

没多久，小燕和同学进了一家有两千多人的台资厂。工厂的条件还不错，包吃包住，月工资平均六七百元，有时会超过一千元。不过，厂里的制度很严，有很多罚款的规定，由于小燕一直在小型工厂做事，松懈惯了，刚开始不太适应。

家庭的幸福生活和打工及被骗经历之间的强大落差，使小燕日趋成熟和沉稳。

“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以前想事、做事都很幼稚，现在打工要比在学校读书时成熟多了。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思想简单，把所有的人都想得和书本一样——只有好人，没有坏人。现在我知道了，好人是有的，但坏人也一样存在，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社会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自己也比以前稳重了很多，不再盲目做事了。”

但是，对于未来的打算，小燕感到很无奈。

“目前，就是这样上班下班，没有什么好的感觉，总是想着回家。毕竟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再说打工并不是最终目标，继续下去，回到家里仍然是一无所有。我觉得自己在生活上没有什么收获，虽然在这里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依旧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切仿佛都是空的。”

忽然一阵沉默，她茫然若失的眼神告诉我们她想努力寻找自己的目标。

26岁的小燕在年轻的打工妹群体中被视为大龄女工，和同龄女孩一样面对着婚姻的压力。她在深圳时和一个打工的男孩子交往，但彼此见面的机会很少，对男友了解不多。最近，母亲时常催她回家结婚，但小燕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她不能确定那个人就是她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



寻找婚姻自主的空间

贰



打工时代的爱情。





爱情故事中的一个。



知  
能  
PDG

## 1. 只为逃脱自我封闭的世界

19岁的华比其他同龄女孩都早熟。当许多女孩沉浸在青春烂漫之中时，她却异常地内向，沉默寡言，时常忧郁。这是因为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一直捆绑着她，使她封闭在了自我的世界里，既不让别人走进去，也不让自己走出来。

华是广东人，家中有6个兄弟姊妹，她排行第五，下面有一个弟弟。父母在城镇开了一家小吃店，家里的经济还算宽裕。父母平时在店铺里忙，很少照顾儿女，所以，华觉得自己从小就被父母忽略了。记忆中的童年是很自由的，念书时，她的姐姐都已在外打工了，家中只剩下她和弟弟。自小喜欢读书的华，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看书，很少出去玩，她的学习成绩也不错。

### 从小定亲

华6岁时，父亲突然得了胃病，要进医院做手术。想不到父母因没钱开刀而将华许配给人，此事直至今日还令华终日烦恼。

“那次我爸的胃病很严重，要开刀。那时我家里穷，没钱开刀动手术，我妈妈和他妈妈家里关系很好，爸爸在医院开刀手术的钱全部由她交了，差不多五千多块钱。”

父亲康复之后，父母为了报恩，将当时只有6岁的女儿华许配给她的儿子。两家人的儿女自小一起玩，华只当她的儿子是哥哥，一直都不知道那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直至华上初中二年级，妈妈才告诉她这件事，那时她已17岁，已出落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华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她对那个男孩子只有兄妹之情；另一方面，她

在学校认识了另一个男生，两人感情很好，那应该是华的初恋吧。

有一次华不小心在路上被车撞倒送入医院。住院的一个星期里，那个男同学天天去医院探望她，还和她一起复习功课。所以，华对那个男同学很有好感，两人的感情也从此开始了。可是，家人极力反对两人交往，华只能痛苦地跟心爱的男孩分手。

“分手时他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他问我话我也不回答，我只告诉他说我们性格不同。他说：‘我们以前不是很好吗？是不是我哪里对不起你？’我说：‘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



问题，不是你对不起我。’当时他很生气地走了。回到家后的两天，我没有吃任何东西。”

那时，华的父母威胁她要顺从他们的安排。华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父亲）给我两条路走，如果我不跟那个订婚的男孩结婚，他就要自杀。这是威胁我，如果选择那条父母为我选的路，我的幸福就全毁了；如果我选择自己的幸福不遵从父母，那我就失去了父母。两条路都很难走。”

当时，华对于父母的安排怀着很大的怨恨。

“都什么年代了，还要你们帮我订婚？我当时好恨他们，好伤心。我说：‘你们帮我订下来，但有没有问过我的感受，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那个人？’那时我是不接受那个男孩子的。”虽然华极力反对父母给她安排的婚事，但是，父母还是很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做法，不理睬华的苦苦哀求，还时常接她的未婚夫到家里玩。

华很讨厌她的未婚夫，觉得是他令她走投无路的。后来，华跟他达成一个协议：“有一天我跟他谈，对他说：‘我一直都没有喜欢过你，为什么你要一直缠着我呢？’他说：‘我不知道，你和别人不同，无论如何你也要和我结婚。’我说不可能，他却说不可能的事也可能发生，还说要给我两年时间，如果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谈得来就结婚。我提议说：‘你给我两年时间可以，如果我们能培养起感情就结婚，如果培养不起感情就再说。你不答应，我就离家出走。’那时我也不想读书了，读到初二就出来了。”

华觉得自己留在家实在别无选择，只有离家出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那时候我想出来散散心，不想面对所有的问题，想逃脱出来，找一个空间放松自己。”于

是，华带着忧伤和怨恨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深圳这块陌生的土地。

## 初来深圳

1999年，华跟着姐姐一起来到深圳某工业镇打工，很顺利地进了一家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作重复不断，每天的上班、下班、加班，沉闷的打工生活消耗着人的生命。当不少打工妹为那年复一年而没有出路的打工生涯叫苦时，华对这种生活却毫无感觉，没有兴奋，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她将自己完全埋在机械式重复的生活中，企图让生活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忘掉在家乡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可是，那段经历像驱不散的阴云，愈想逃避它，愈被它所笼罩。没有人能理解这种感觉，因此，华将自己封锁在一个自我的世界中。

刚来深圳时，紧张的打工生活令她暂时忘记了未婚夫，那时的她感觉很轻松，觉得不需要再面对那件事了。可是，未婚夫的一封信让她再次坠入黑暗的深渊之中，久久不能自拔。

## 得不到解脱

“那几个月很开心，没有想过什么。过了半年，他写信来，提起婚事，要求我不要交朋友，更不要乱来，就当让我在这里玩两年，还说有人在那里监视我。看到那些信，我气愤地一下子就撕掉了。我好害怕，打电话叫他不要找人监视我，他也没说什么，挂掉电话不再听我说话了。”华放下电话后很害怕，她的脑海总是回荡着未婚夫的话，担心他真的找人来监视她，整天诚惶诚恐的。“我觉得他控制着我的人生，我跳不出来。那时我很悲观，想了许多问题，也想办法

解决这些问题，想得我头好痛。”

由于被婚事纠缠，她对工作也失去了信心。

“我对工作没有什么希望，有个岗位做就行了。我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想过转厂，更没有想过工作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那么，出来打工是否能让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呢？华这样告诉我们：“其实我没有找到什么，心里很难受，为了那件事，我失去了快乐，我什么都没有了，活着和死了一样。我的心很痛，其他一切事情就像和自己没有关系一样，觉得世界只是黑漆漆的一片。原本想出来打工散散心，

车窗外是城市灯火辉煌的夜晚，而她只有上班、下班、加班。



新子如  
船

PDG

但是，我还是不能摆脱那件事，我不知道什么方法能够改变我，换取我的自由。”

华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别人帮忙。“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那件事，也没有人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我常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我，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我，所以我不想对别人说什么，但我心里是很痛苦的。”

华是个能够独处的人，平时也不喜欢跟其他姐妹相处，更不喜欢拉帮结派。在她的眼中，其他打工妹都是些思想单纯的小女生，她们不会明白她的处境。这种孤傲的性格使她在3年的打工生活中没有遇到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

## 掌握自己的命运

华这种完全封闭自己的状态维持了两年，直至遇上我们，才使她逐渐打开了心扉，将压抑在心里已久的事情说出来。

后来，华终于鼓起勇气，当着未婚夫及其父母的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想，生命是自己的，就不要被人控制，我坚决地面对面跟他谈，可他死都不答应。就在前两个月，我又与他的父母谈，我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他父母没说什么，只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儿子，我们也不勉强你，你跟他谈吧。行就好，如果不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对华来说，迈出这一步是极其重要的，至少结束了那种封闭自己、自怨自艾的生活。

“那件事改变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不应该被别人掌控，出现问题要学着去解决。这都是我以前从没意识到的。”她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是很开心了，我发现自己以前好笨啊。”她所说的“笨”，是指自己在苦恼和忧郁中白白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我出来打工也是在浪费时间，这期间也没有去哪里玩过。深圳那么好的地方没有玩过什么，我觉得不甘心，所以，我要去玩一下才回家。”华终于跳出了忧郁和苦闷。

现在，虽然未婚夫仍坚持不肯解除婚约，但她的心情很轻松，因为她已经可以勇敢地面对他了。她决定，从此后要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不再被别人操控。

访问华的时候已临近春节，她要回家过年了。她说，去年春节时仍未解决那件事，因此，回家时情绪很低落，很不开心；这一次，一定会好好处理她跟未婚夫的关系。我们期待着她的好消息。





## 2. 打工邂逅爱情

33岁的阿红来自重庆，数年前她被拐卖到安徽农村，嫁给了一个农村的贫困户。历经沧桑的阿红对生活有太多的无奈，她不求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只求一份真正的感情，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只要自己过得开心。

### 不幸的童年

8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和大嫂吵架，一气之下上吊自尽。小小年纪的阿红只能与二哥一起寄居在已婚的大哥



家里。大嫂经常打骂他们，大哥毫无办法。一旦大哥责备大嫂，大嫂就以死相逼，所以，大哥只能作罢，睁只眼闭只眼。

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温暖，阿红的二哥12岁就去江西宜春打工了。留在大哥家的阿红除了上学，还要替大嫂干家务、带小孩、干农活等。

“若不是父母去世早，我会多读一些书。当时，我的成绩很好，老师允许我不交学费，可是我要做完家务才能去上学。早上起来要放羊、打猪草，然后要给家人做饭、刮土豆、推磨，另外还要带小孩。那时，我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根本受不了这些，没办法只能放弃读书。当时并没有觉得怎样，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后悔了。”

14岁时，很多人开始给阿红提亲，其中有个提亲的男孩很有诚意，大哥和她都同意了这桩亲事。阿红很喜欢那个男孩子，两个人的感情也很好。

“我当时还不太懂事，也没想太多。看那个男孩长得还可以，家里条件也还不错；而我家很穷，都没有什么衣服可穿。如果找了婆家，他们就会给我买衣服、买东西。”

17岁时，年仅33岁的大哥去世了。阿红一方面为失去疼爱自己的大哥难过，另一方面担心大嫂对她更差，于是，寄居到了叔叔家。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很不好过。

“叔叔家毕竟不是自己家，在他家我要干很多活，而且日子久了，叔叔对我也不好。那时我性格倔强，也不想依赖他，索性还是回到自己的家。”

也许算是阿红幸运吧，她的大嫂接纳了她，还给了她一头小猪和一些地，让她一个人生活。不久，大嫂改嫁，家里的一切就由阿红做主了。这时，男友想和她结婚，但她觉得自己年纪小，不想结婚，于是，两个人分手了。

第二年，在堂哥、堂姐的帮助下，阿红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面馆，卖馒头和面条之类的小吃。不过生意也不好做，每天只有十元左右的纯收入，而且越来越差，又没有营业执照。做了一年多，阿红就不再做了。

## 被人拐卖

后来，阿红同二哥一起在宜昌过了一段打工生活。初到宜昌，阿红在一家餐厅里做服务员，月薪40元，后来因阿红做得好，老板给她加到每月50元，就这样做了两年多。由于二哥用情不专，还经常出去赌钱，阿红很是看不惯，总和他吵架，最后阿红辞工回了老家。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依靠了，加之长年在外打工，阿红已不习惯家中的生活，于是，住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重回宜昌打工。

在去往宜昌的路上，阿红遇到了那个毁了她一生幸福的人贩子。

“他说能帮我在安徽找工作。我跟他到了安徽之后，他用自行车带我到乡下，同行的几个女孩都分开了，没想到那人竟以2400元把我卖给了一个比我大十多岁的男人，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当时我很讨厌他，但没办法逃脱，连上厕所都被人监视着。”说到这里，阿红的泪水夺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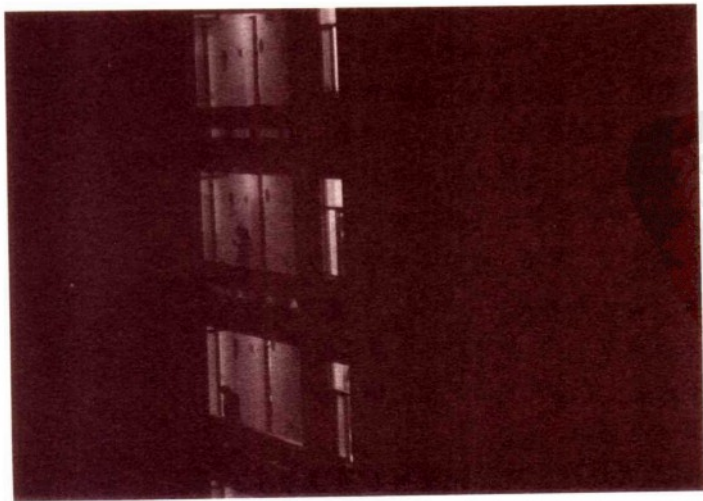
“他家里很穷，除了两间茅屋什么都没有，而且又脏又乱，当天晚上我就不想活了。可是，他们一直看得很严，我连寻死的机会都没有。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我真想逃跑，可是我没有钱，根本就跑不了。”面对着一个陌生而毫无感情的男人，阿红痛不欲生。丈夫及婆家人担心阿红跑掉，白天看着她，晚上婆婆从外面把门锁上。

被卖到那个偏僻的农村后，阿红并没有和家里联系。

“家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也没有写信告诉他们，更没有打电话。就算回到老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无法面对现实，阿红整天不吃东西，还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她经常和丈夫吵架，丈夫不让着她，她就以死相逼。

“他比我大12岁，没读过书，但他从不打我。他曾经买过一个四川女孩子做老婆，可是那个女孩子3个月后就吃农药自杀死了，他害怕我也这样。当我求他放我回去，并答应把买我的钱如数寄还给他时，他同意了，甚至还借钱帮我回家。可是他买我的钱就是借的，现在又身无分文，所以根本借不到钱。”

宿舍——没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数字水印  
PDG

就这样，阿红只能被迫与这个陌生且没有感情的男人一起生活，她觉得日子很难过。

“自己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就想如果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心甘情愿和他在一起，生活将会多么美好！半夜做梦也总是梦见自己回家，梦见和以前订过婚的那个男孩结婚。”

### 想以死寻求解脱

1990年10月，阿红怀孕了，可她不想生下这个男人的孩子，所以，她为了让自己生病就整天不吃饭。丈夫到处借钱为她治病，医生告诉他们，阿红是因心情不好才生病的，要好好照顾她。

有一次，夫妻吵架，丈夫想对阿红动粗，这让阿红非常生气，一心想打掉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生活真没意思，我去跳河，却被人家救了起来；后来，我又用剪刀割血管……可每次都被人救，想死都死不了。”提起这段沉重的往事，阿红却异常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我们能感受到她当时所承受的压力和对生活的绝望。

自杀不成，绝望中的她忽然感觉到了生命的可贵。“后来我突然想通了，觉得小孩子是无辜的，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做打算。”

丈夫也知道阿红对他没有感情，因此答应生完孩子就让她回家。当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她又舍不得走了。

“老公对我很好，再说我从小就没有父母，不忍心让孩子跟我一样从小就没有妈妈，所以我决定不走了。”

1994年，阿红再次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孩。由于很想家人，并且到安徽后从未和家人联系过，所以她想回家看看。

这时，丈夫家里已逐渐信任阿红，但仍不同意她将小孩带回家。于是，阿红独自回到了重庆。

在离开家的这些年，家人曾经到处寻找她，但一点消息都没有，家人都以为她已过世，所以，再见到她时都异常惊喜。阿红担心自己被人笑话，没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在家住了几个月后就回安徽了。

1996年，阿红再次怀孕并生下一个男孩。这次生育后，医生为她做了结扎手术。

“我生了第一个小孩之后就打算离开安徽，可是看见孩子还需要吃奶，就想等孩子一岁之后再走。可是，他家里太穷了，连我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就这样一直待下去了。后来，想到自己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家对我还不错，就打算和他过一辈子了，还又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虽然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但也不想回去重新找个男人，尤其是还要再给他生孩子。”

1997年，阿红再次回重庆老家。那时，丈夫家里已经完全信任她了，还让她带了最小的男孩回家。这次，阿红向家人说了被拐卖嫁人的实情，并向二哥借了钱。回到安徽后，她和老公买了拖拉机，盖了新房子，欠下了将近四万元的债。阿红跟老公商量外出打工，因害怕老公不让她出来，就谎称是去宜昌的二哥那里打工。

### 邂逅爱情

阿红和村里的老乡一起来到深圳，在一家纸品厂上班，每月大约有六七百元，厂里包住不包吃，工作还算轻松。只是厂里没有给工人办理暂住证，大家都不敢轻易出去，害怕查证件时被警察带走。老乡们知道阿红家里欠了很多钱，就帮她出主意赚钱还债。

说到这里，阿红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从钱包里掏出一些相片。其中，有她的全家福，3个小孩都很漂亮、可爱，她的老公则是一副典型农村人的模样，憨厚老实；还有她年轻时的稍带少女气息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阿红跟另一个陌生男子的合照，那人不是她的老公，但从相片中可以看出两个人都充满了幸福感。阿红很快就向我们解释：“那是在深圳的男友阿同。”接着她慢慢地告诉我们她和阿同的故事。

刚开始，阿红和阿同只是朋友关系，那时，阿同已婚并有一个儿子。也许在外打工的生活太寂寞了，也许阿同很同情阿红的遭遇，他们慢慢地好了起来。



打工邂逅爱情。

“起初我并不喜欢他，我知道他有文化，而我没有读过书，不敢高攀。我把所有的遭遇都和他说了，他很同情我，经常来看我。时间久了，发现他对我真的很好，也就喜欢上他了，想和他在一起。”这样相处了几年，阿红对阿同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

认识阿同不久，阿红就辞掉了工作，一切开支都由男友支付，包括她家里的债务和孩子的学费。丈夫知道阿红不喜欢他，也知道她在深圳有个男朋友，但他没给阿红任何压力，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阿红。

“我在外面这么久了，想离婚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离婚会伤害小孩子。我从8岁就没有了父母，童年很不幸，不想孩子和我一样。就算付出很大代价和阿同结婚了，我也不能保证他真心爱我一辈子，毕竟自己一年年地在变老。”

“我不爱丈夫，但他有事我一定会帮他，我对家庭还是很有责任感的。我对他说过，只要不让我和他在一起，我帮他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不想离婚，如果真的离了，孩子怎么办呢？上次他脑血管破裂，昏迷了几个小时，送了3个医院都说不能治，我都急哭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孩子的父亲，虽说没什么本事，却是真心照顾孩子。男朋友对我很好，我们也是真心相爱，但我们都不会离婚和对方结婚。”

2001年，阿红和男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广州，阿同的工地上有很多阿红的老乡，阿红又一直在深圳，因此阿同就在广州又找了一个女孩。为此，阿红很痛苦，经常和他吵架，几次想和他分开，但阿红清楚离开他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

“我接受不了他的改变，虽然我不想让他离婚和我结婚，



但一直觉得两个人感情很好，他不应该再去找另外的女孩。也许我比较自私，我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自己喜欢的人。我想和他分手，但他总给我打电话，还经常来看我，他说他不喜欢那个女孩，只喜欢我。我觉得自己真的离不开他了。”

“其实，我很想自己独立地生活，比如说做服装生意。但没人帮我，我怕赚不到钱；另外，我也担心他不停地来找我。虽然他背叛了我，伤害了我，但我们毕竟是有感情的，我不忍心不理他。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能回安徽，回去后他肯定不会再给我钱了，而我自己没什么手艺，也不能挣钱。我希望即使我们分开了，他也能帮我做很多事情，尤其是经济上的帮助；但从另一角度来讲，他给我的帮助越多，我就越离不开他。我特别矛盾。”

在访问过程中，阿红不断地问我们她应该怎么办。但是，感情这种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错。虽然阿红找到了“真爱”，但由于许多现实的束缚，他们不能结合。阿同不爱他的太太，却担心离婚会伤害妻儿，至少维持现状可以让他有个体面的家庭；阿红也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宁愿维持自己无爱的婚姻。

阿红说，为了孩子她宁愿这样下去，她希望孩子能够理解她。

“为了孩子我可以放弃爱情，我不会让他们和我一样从小就过苦日子。但是，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看我，以后有机会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如果这个故事能够被收录，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去读我的故事，如果他们能够理解那个女主人公的话，我会告诉他们那就是我——他们的母亲。”

从访问阿红到现在已有两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她一直没有离开她的男朋友阿同，也没有去做生意，更没有找其他的工作，她的生活费用依旧由阿同支付，正如阿红所说的，她离不开阿同。她不求得到更多，只希望能和阿同一起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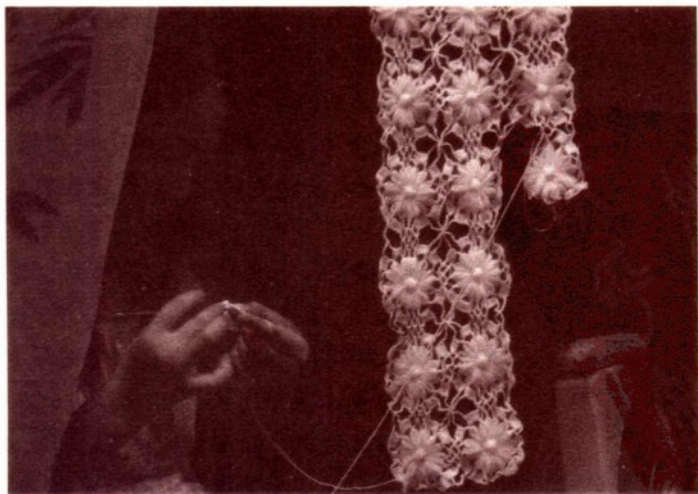
但愿有一天阿红能够从感情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



### 3.为了找个避风港

芬是在工厂宿舍认识的一个女工，比起其他打工妹，她比较成熟沉静。第一次和她接触时，她就将埋藏在心底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告诉我们她在感情上的种种问题与外出打工的关系，她的无限信任让我们十分感动。

她说：“我到广东已经5次了，几乎每次都与感情有关。别看我外表活泼开朗，其实心里有很多的苦衷，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而眼前的问题最让我头痛。我必须把我的故事说出来，否则憋在心里太难受了！”



在芬辞工准备回家的当天下午，我们约芬进行访谈，虽然时间很匆忙，但芬仍然完整地讲述了她的故事。

我们一到，芬就对我们说：“哎！刚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家人问我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回家后是到丈夫家住还是回父母家住？我只能开玩笑说自己租一间房子住，这就是最令我头痛的事情了。我这次辞工回家一是把病治好，再就是解决我和丈夫之间的问题。”

性格活泼开朗的芬在提及自己的婚姻时充满了太多的无奈，或许是因为自己虽然已结婚两年，却仍然面临着许多外界的压力，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家人一直都反对她自己选择的这桩婚事。

### 周而复始的打工生涯

28岁的芬是重庆人，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是地道的农村妇女，主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务，家里的经济状况属中等偏上。芬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全家除芬以外，都已转为城市户口。母亲身体不好，哥哥、姐姐都在上班，弟弟又在上学。芬因成绩太差而不想上学，初中毕业之后就在家干农活，负责种全家人的土地。

“成绩越差越不想读，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自己没有多读书，成绩那么差，怎样读都读不出什么名堂来，还不如做点农活，锻炼一下自己呢。”芬边说边笑。

1992年，父亲看她干农活太辛苦，就给她在家乡找了一份工作，在药化厂上班。大概过了两年左右，药化厂经济不景气，芬便不再做下去了。就在这时芬认识了第一个男朋友，这个男孩在深圳横岗做建筑。两人交往了两个月之后，芬就随他一起来到了横岗，这也是芬第一次外出打工。

当问到芬那次外出打工的期望时，她说没有什么期望，当时只是被动的。

“那时候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出来，是男朋友叫我出来的。他去工地打工，我每天负责买菜、记账之类的事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也没有心去找工作。”芬和男朋友相处得并不好，两人经常吵架。芬只在那里呆了3个月就回家了，同时结束了第一次恋爱。

1995年，芬的姐姐下岗了，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东莞的一家生产面包机的电子厂打工。芬和姐姐的工作都是用酒精擦机器的外壳，每天加班到很晚，上班的时间通常是早上7点至晚上12点，中间的休息时间也很少，工作很辛苦。

“那时候生活很不习惯，我们姐妹俩的身上都长满了疮，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打电话告诉了爸爸。爸爸觉得两个女儿在外面的生活很不如意，身体也不好，就让我们回家。”于是她们做了4个月就回家了。

芬原本在家里订了亲事，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回家之后芬发现男方既懒惰又没有恒心，不是可以付托终身的对象，所以提出分手，没想到男友态度强硬，说什么也不退婚。没办法，为了逃避这种情况，芬不得不再次出来打工。

“那时候，我只想到要逃避，如果我呆在家里的话，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后来刚好有劳动局招人去潮州打工，我就应聘去了潮州。”

1996年，芬随着“劳务输出部”一起来到潮州海丰的一家伞厂打工。不过打工的日子一点都不好受。

工厂实行计件工资，每月大约有五六百元，但厂方一直拖欠工人工资，许多人需要钱还得让家里寄过来，而且每天的伙食都很差，生活非常艰苦。

“每天只吃白菜，既没有油也没有味道，还总是做不熟，吃了总拉肚子。我们一同招来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芬和其他几个老乡受不了如此恶劣的条件，做了二十多天还没有拿到工资就决定一起离开这家厂。可是厂里规定要厂方开“放行条”后才能把东西拿走。当然她们是开不到“放行条”的，保安看管得又很严，在无奈的情况下，芬她们只好一次穿好几件衣服出来，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厂门口的小店里，接着进去把剩下的衣服穿出来，就这样，芬她们终于“逃”出了这家厂。

紧接着她和几个老乡一起坐车到了东莞长安镇，进了一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PDG

家电子厂。这家厂的条件还不错，但是管得太严。

芬这样感叹道：“也许真的是以前轻松、懒散惯了吧！那家厂管理得很严，进厂房就要换两次拖鞋，上班穿工衣就不用说啦，还要喊一些口号，诸如‘质量第一、以厂为家’之类的，觉得很麻烦，饭又不合口味，所以就不想做了。”

结果她在这家厂只做了几天就回家了。

### 学一门手艺比较可靠

芬过去几年都是打工几个月甚至几天就回家了，这样短暂的出外打工经历，不能为芬累积任何工作经验或技术。她的父母也开始抱怨起来，认为芬做事情没毅力，不能有始有终。

芬觉得自己老是这样出外打工也不是办法，所以决定学习一门手艺——开车。

“我当时就想学门开车的手艺，另外也考虑到长久利益吧。我学开车的时候才二十多岁，等我到三四十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开啊，在我们市里面帮别人当司机也是很容易的。虽然我父母不是很有钱，但我的一些朋友很支持我，为我凑钱，所以我就学上开车了。当时，我父亲并不赞成我学开车，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开车太危险了，可当我拿到驾照的时候，他也就不再反对了，还给我买了一辆‘长安’车，车虽然不是很好，但总可以让我熟悉一下，以后就可以自己在家跑车了。”

芬开车时一个月差不多能挣两千多元，而且比较自由，比在工厂里强多了。

她说：“自己开车肯定要好些，收的是现金，不像在工厂里，一个月才能领一次工资，有时还会拖欠。再说开车的

时间是自己定，不像工厂里管理那么严。”

### 赌气掉进了“爱情的漩涡”

在家乡当女司机毕竟是稳定的职业，一个单身女性月收入两千多元也算是不错了，芬不再需要到南方城市打工赚钱。若不是她遇上现任丈夫的一段情缘以及以后的波折，她没有想过会再出来打工。

在芬跑车的两年里，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海，他和芬是同行。认识他时，他是有家庭的，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海的前妻是天主教徒，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经常到别处开会、学习，很少在家中。而海要跑车还要照顾小孩，感觉很辛苦，于是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芬一直视海为朋友，很同情他的处境，不时主动帮助他跑车，芬很自然的成为海倾诉的对象，但这却引来了其他人及海前妻的误会。

“那时海的前妻找到我家，对我说了很难听的话，又让别人打电话给我爸爸，要他管好我。那时爸爸十分生气，觉得我丢了他的脸。还打了我一顿。”芬说到这里时感到莫大的委屈。

芬当时非常生气，觉得海的妻子让她很难堪，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偏要和海在一起。

芬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心情：“其实我并不想和海一起生活，毕竟他还有两个孩子，而我没有结过婚，而且他的孩子以后也不会对我好。但是听到那么多的传言，心里特别生气，要么她（海的前妻）给我名誉损失费，要么我就和海结婚。接着海的前妻开始给我介绍男朋友，最让人气愤的是她居然给我介绍了一个四十来岁并且离过3次婚的男人。所



以，我就决定非要她的丈夫不可，一定好好气气她。”

海的妻子这样伤害芬，反而激起了海与妻子离婚的念头。当海和妻子正式离婚后，海就开始追求芬，两个人便开始正式交往了。

芬的家人坚决反对他们结合，认为芬不该嫁给一个离过婚又有两个小孩的男人，芬的父亲甚至威胁芬要在家人与海之间做出选择。

“一方是养育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父母，一边是自己真心相爱的人，两者对我都很重要，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海，我不忍心看着海的两个小孩没人照顾，也不忍海难过。也许，时间可以让父亲理解我的选择。”为此芬感到很难过。

“我们结婚那天没有请客，只是简单地领取结婚证，父母也不知道，我不想给本来就伤心的他们带来更多的伤痛。”

### 不想面对现实，只能选择逃避

婚后一年多，芬的父母仍是很生气，一直不承认他们，也不见他们。芬也没有与家人来往，她在慢慢等待父母改变态度，但海却为此深感不平。

2001年春节，在姑姑的劝说下，芬独自回了娘家。这时，刚好芬的姐姐去深圳打工，父母就让芬和姐姐同去，不要再回家了，甚至不准她和丈夫商量。

可芬仍悄悄地“溜”回家告诉了海，让芬难过的是，海一点也不理解芬的难处，就在当晚和芬为此事大吵一架。海生气地对芬说：“要么你和父母断绝来往，要么我们两个解除关系！”芬顿时失声痛哭。

爱人无法理解她的难处，父母态度又如此强硬，芬决定和姐姐一起走，暂时远离这些现实。

到了深圳后，芬找了一家电子厂上班，虽然工作不是很累，每天加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工资不高，每月连加班费才五百元左右，而且厂方不包吃饭。这样，一个月除掉开支后所剩无几，差不多半年芬都没有寄钱回家。

“在我出外打工的半年里，海面对很大的压力，家里很多人都说我可能不会回去了，他自尊心很强，希望我回去，却不直接跟我说。不过这段时间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因为我有妇科病，他有时会寄药给我。”说起丈夫的体贴，芬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不过令芬很烦恼的是，家人一再要求芬离婚。可是两人毕竟是有感情的，而且她也放心不下两个孩子，所以她不想那么轻易地离婚。这一次，芬要回家医治妇科病，她想把病治好后再解决与海之间的问题。

芬说：“这次回家，父母非常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住，可是我和丈夫并没有离婚，再加上他的压力又很大，所以我不能那样做。虽然我无法预料回家后会是什么结局，但我觉得我会选择和海在一起的，当然父母能够接受他是再好不过的了。”

最后我们问及芬数次出来打工的感受是什么，芬这样回答：“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只觉得新鲜、好玩，第二、三次就已经麻木了，不知道什么感觉；这次来深圳是想找个避风港，可避不了风，总觉得打工还是要落叶归根。”

看来，芬还是十分想念着家里的人。她接受我们采访后，当晚就回家了。

不久，我们接到芬的来电，说海在她出来打工期间，和他的前妻重归于好了。后来又接到芬的来信，详细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

你好！真对不起，回家一直忙着自己的婚姻而没能给你们写信，对此深表歉意。希望你能代我向所有女职工服务中心的朋友们问好，同时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

我已经和海离婚了。要了解这件事就要从我们的过去谈起。我当时认识海时他有家庭，因为种种原因他才和妻子离婚的。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才走到一起，所以即使我们离婚了，我也依旧爱他，甚至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正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才不会和他离婚。第一，他

的大女儿已经15岁了，是将要懂事的年纪，由于别人的唆使，她不尊重自己的父亲，经常和父亲顶嘴，还讲些不干净的话。第二，我父母长期不理睬海，有时说话让他很没面子，影响他的自尊。第三，他的前妻以前经常在外面忙天主教的事情，让海长时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放弃了她，现在儿女都已经长大了，她也想挽回以前的婚姻。第四，每天都能听到关于我们的传言，压力太多了。以上4点是造成我们离婚的主要原因。

也许我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我不会从此消沉下去，我要为我和海共同的诺言而奋斗，两个真心相爱的人，即使分开了，心也将永远在一起。我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许我会重新开车，但是这条路的风险太大，所以我也在考虑别的工作。其实我内心很脆弱，我和海3年的婚姻使我痛苦悲伤，很多时候我都想着逃避。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在这段时间里，有很多人给我介绍男朋友，由于和海之间的感情太深太真，我的心无法容纳别人，但我父母希望我能重新选择一次。你能告诉我该怎样做吗？

祝你们全体幸福、健康！

想你们的芬

2001年11月26日

我们对芬的婚变感到愕然。我们原以为她回家后可以说服父母接受海，不再为这桩婚事烦恼。谁知短短半年竟有这些变化，令善良的芬受到如此的伤害。但愿她不要再这样悲伤下去，重新选择美好的生活，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我们期待着芬能很快找到属于她的幸福，迎接美好的明天。

## 50岁女人的自主

今年五十多岁的翠姨来自重庆，是我们访谈中最年长的打工者，也是最肯定自己打工生活的人。

翠姨性格和善，虽然年纪很大，但与年轻人没有代沟，和很多打工妹都相处得很好。翠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使她在家乡和家庭的地位大大提高，所以翠姨十分喜欢打工生活。她微笑着说：“如果有可能，我愿意一直打工，这样的生活很好。”



## 饥荒年代下的童年

翠姨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那时正好是60年代，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艰苦。

“以前的日子好苦啊，小时候很穷，连菜根都炒来吃。大跃进时土地属于集体还没有分配给个人，大家一起种田，然后在年底分粮食，每人分到的很少。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没有吃的，饿死了很多人。有些人不得不吃生的豌豆、胡豆，吃后全身都肿了，又病死了不少。”

她不喜欢农村的生活，总是慨叹那时期农民生活的艰苦。“我觉得那时候生活真的是太苦、太难了，一年都很难吃到肉、吃到油。生产队虽然养猪、鸡和鱼，但只有发瘟死了的才分给大家吃，两个人一小盘，不然就什么都没得吃。”

由于那时生活的艰难，加上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盛行，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

翠姨家有姐弟3人，她是老大，还有一妹和一弟。生产大队原本要求她们三姊弟一起上学的，可是父母重男轻女，不让翠姨和妹妹去学校念书，甚至连生产队的扫盲班也不准她们参加，要她留在家里帮忙做事，为此翠姨很生气，直到现在仍感到不满。

“我没有读过书，连学校的门槛都没有跨进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不能读书，看见别的女孩子去扫盲班，我很难过，趴在地上不肯干活，妈妈就过来打我。每天早上看见学生在做早操，我就偷偷地跟着做，我好羡慕他们。我做梦都梦到自己去读书，可醒来发现原来只是梦。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落泪，妈妈不让我读书，真是很伤我的心，让我很生气。”翠姨为自己不能读书而感到不平 and 遗憾。

翠姨在十一二岁时就得跟村里的其他女孩一起到生产队干

活挣工分，她回忆说：“那时男人一天计10分，女人和少年计8分。因为分得很少，年底的粮食不够吃，还是要吃公粮。”

## 丈夫的封建思想

翠姨一直在农村干活，当她17岁时，父母为她安排了婚事。当时不能自由恋爱，所有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翠姨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嫁给了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男人。

“那时家里都是这样子，没什么不好的。但是丈夫的脾气不好，说话让人很生气，我们偶尔会吵架。”

她婚后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小孩。不过丈夫重男轻女的思想令翠姨受不了。

“婚后我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我生3个女儿时他一点都不高兴，甚至当第三个女儿只有半岁时因生病去世，他也不伤心。那时我正好怀孕，因为他想要个儿子，就让医生给我检查，如果是男孩就要，是女孩就不要了。”

打老婆在农村是常有的事情，翠姨的丈夫又是个脾气暴烈的人，因此翠姨被打也是在所难免的。“有一次我叫他帮忙将玉米磨成粉，他却不肯，我说了他一句，他就来打我。好在婆婆和公公对我都很好，我公公就出来挡住他，还给他一个耳光。”

幸好婆婆对翠姨特别好，总是顺着翠姨的意思，也会出面制止儿子在家里的粗暴行为。

对于3个孩子的教育问题，翠姨感到十分遗憾，她小时候想读书却没条件读，而3个孩子有条件读书却自己不愿意读。

“大女儿初三没毕业就不读了，我劝她把初中读完，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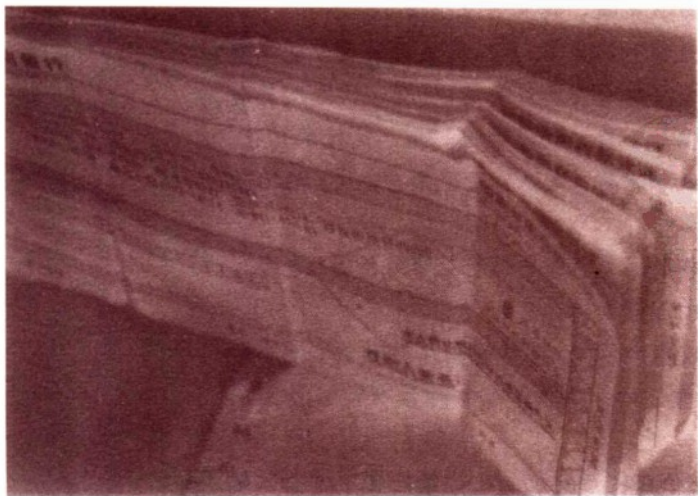
都不肯；二女儿成绩不好也不想读，小学毕业；那时希望小儿子读下去，我跟他说就是卖粮食也要供他读书，但他想去学一门技术，所以就让他去学电器维修了。”

### 当家的日子很辛苦

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大批农民拥往广东省沿海城市打工。

1988年，翠姨的老公去海南打工了。当时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儿子又在学习电器维修，家中只剩下翠姨一人种地，还要养猪、养鸡等等。在访谈中，翠姨不止一次感叹种田的

整整齐齐地挂在宿舍床头的一叠汇款单。





日子很辛苦。

“我一个人在家里很辛苦，有时一个人做不了的活就先帮别人干，然后别人再帮我干。很累的，所以现在我想在外面打工，不想回去。”

1994年，翠姨的老公回家用了10000元建房子，儿子也在同年结婚，欠下了4000元的债。为了还债，翠姨的儿子、儿媳及老公再次出来打工。但是，儿子夫妇在广东打工大半年只寄回去了七八百元，主要是因为翠姨的儿子在广东时常转工，没挣到什么钱。而翠姨的老公在海南做建筑，也帮人家种地，他寄了1500元回家。

### 我也要出外“玩”

1995年，翠姨让回到家的老公留下来做家务，而自己要出来打工。翠姨告诉我们当初打工的目的：“我想出来赚点钱，我挣的钱大部分都寄回家了，5年的时间寄了一万多，自己只留了一点点，是觉得以后老了，自己有钱会比较方便。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情况，每年都能寄回去三千多元，在这里我一个月能挣四百多元，要是在家连40元都挣不到的。而且我这么大年纪，在家里挣钱就更不容易了。虽然我可以养猪，但是养猪也很累，而且除去所有的费用，也挣不了多少的。”

除了想赚钱，翠姨也有别的想法。

“我老公在广州做了4年，海南做了两年，他从海南回来我就出来了，在家里做农活太累，他出去玩了6年，我也要出去玩6年。”翠姨口中所说的“玩”，就是指在外面见识一下。

## 打工不及家里劳累

由于翠姨的弟弟在东莞一家厂的包装部做了8年组长，所以她很顺利地进了这家厂，先在包装部做普工，又转做了清洁工，负责打扫两个车间，后来经理又让翠姨打扫喷油部的车间。由于员工乱扔垃圾，那个车间很脏，翠姨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月的工资是五百元左右（但每月还要扣食宿费用90元）。

“在工厂上班不自由，开始有点不习惯，不过时间长了就好了。做清洁工还是比员工稍稍自由一些，员工只有下班后才可以走动、休息，而我们一般打扫完可以在车间找个地方躲下来休息一下；而且员工上班不可以讲话，我们这些清洁工说话是不受限制的。”

翠姨在东莞上班的时候（现在搬到深圳了），有时财务会少算工资给她。有一次，翠姨发现少发了60元，就去找主管，但是主管不愿意帮她查，她又直接去找办公室工作人员，他们核实后说第二个月补给她，但等到第二个月却又少发了20元。

翠姨很无奈地说：“有一回过年的加班费好像是83元，但是厂里一直拖着不给。我去找过办公室两次，后来差十到二十元或加了班却不给加班费，我也不说什么了，说了也没用，劳动局不会管这些小事，再说我这么大年纪找厂也不容易。”

这家厂从东莞搬到深圳时，厂里本来不想让翠姨到深圳的，理由就是她的年纪太大。翠姨对此很不满，就找经理谈，“虽然我的年纪有些大，但是我工作做得很好，也没有错过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做？我们这些老年人做事还是很吃苦耐劳的。后来，因为新招的清洁工干得不好，厂里

又让我来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这边，所有的车间都由翠姨一个人打扫，每天都很辛苦。翠姨向主管提议，不让员工们随地扔垃圾，主管同意了，以后工作才相对轻松一些。车间里没有空调，通风系统也不好，开始翠姨很不舒服，但还是慢慢习惯了。此外，厂里不发给工人任何保护用品，由于翠姨在洗厕所时需要接触硫酸，不得已向老板要手套。有一次翠姨还是在工作中受了点轻伤。

“我的手在机器上碰伤了，流了很多血，把整个手都染红了，厂里没给我消毒，只是上了点药，老板让我以后小心



工业区街头流动的音符

工业

PDG

点，我自己也没有要求上医院，这是我自己不小心弄伤的，再说他们能让我到深圳来上班，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

翠姨每天都要将垃圾拉到垃圾站去，由于天气炎热，有一次翠姨中暑了。

“我当时眼睛全红了，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走路都走不了。我向主管请了一天假去看医生，这里的医疗费太贵，我不敢到大医院去看，只是去了私人诊所，打吊针花了我85元钱，第二天继续上班。但是，我仍然没有一点力气，不能工作，只好又请了两天假去看医生。我没有按照医生说的用什么好药，只是打了点儿青霉素和葡萄糖，第二天就好了。”

翠姨在这家厂算是老员工，她从来没有想过转厂。

“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有一份工作已经不错了，另外如果转厂被人家当成新员工，待遇方面会少一些，再说我和厂内的其他姐妹关系很好。有些女孩子叫我干妈或阿姨，我和她们在一起学会了织毛衣，以后我就能给孙子织了。”翠姨很珍惜这份工作，工作时也很尽责。

翠姨在外打工5年了，她向我们说了家人对她的看法。

“老公很支持我在外打工，我也希望打工到60岁才回家。但是他们很想我，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6岁的孙子在电话里就说‘奶奶你快回来嘛！’可我自己不想回去。以前在家里因为农活太多、太辛苦，经常会生病，但是现在就很好，很少生病。我外孙已上高中了，他经常写信给我，会关心我的身体等等。”翠姨提到她的家人，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访问当天，她刚巧收到外孙的信，她将信给我们看，信内字写得很漂亮工整，外孙说自己很努力读书，希望她早点儿回家。写得很有感情，看得出他们心中很尊敬翠姨。

## 为自己感到自豪

有意思的是，翠姨出外打工几年后家庭角色发生了转换，丈夫负责起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家务，甚至是照顾孙子。

“我在5年时间里给家里寄了一万七千多元钱。我们村里的妇女看到我回去了，都来看我，整个村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女人在外打工的就只有我一个，而且还给家里寄钱。由于我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见的世面多了，胆子也就大了，她们觉得我很大气，很羡慕我。老公对我也比以前好很多，他是个老实人，不爱说话，不会关心人，很粗心，以前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什么都交给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委屈，他骂我我也不敢说什么。现在我出来打工，可以挣钱寄回家，又没有什么负担，他对我就很好，回到家什么事情也不让我干，家里有客人来也是老公做饭。我跟他讲：‘你出去打工，我在家里做家务、养猪，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你做了。’”

丈夫的改变让翠姨很开心，同时村里妇女的羡慕也令翠姨感到很自豪，所以她希望一直在外面打工。

现在她除了把钱寄回家外，自己也存一点，翠姨觉得：“自己存一点钱方便一些，儿子、媳妇都不是很靠得住，如果以后自己要用钱，儿子有，会给你一点，如果没有也没办法，所以自己得存一些钱。”

虽然翠姨不想回家，但是儿媳怀孕了，希望翠姨能回家照顾她，所以翠姨决定春节后辞工回家。

说到这里，翠姨的脸上写满了对打工生活的不舍，然而她又不得不回家照顾儿媳。她无奈地说：“回家还得种地。不种怎么办呢？这次回家之后，可能就不会再有机会出来了。”

告别了，打工生活！再见了，打工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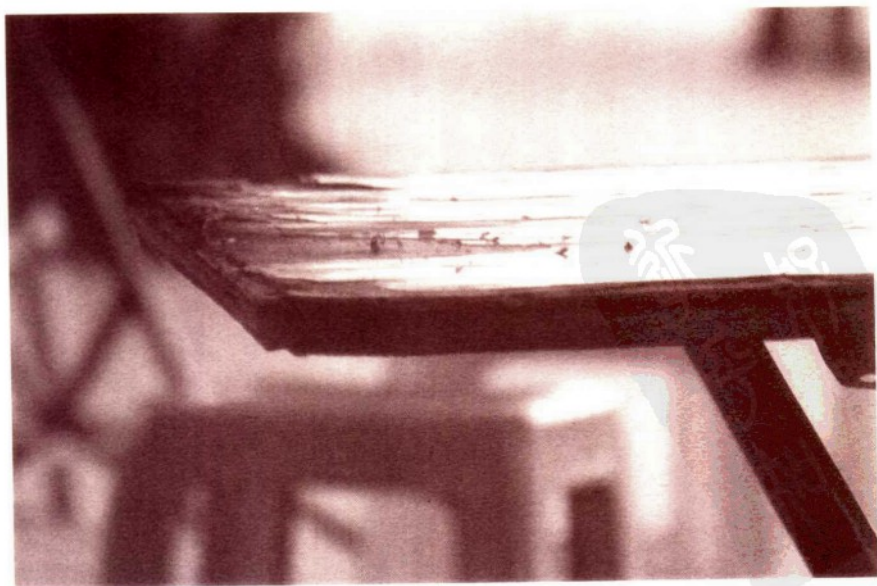


打工路上的苦澀

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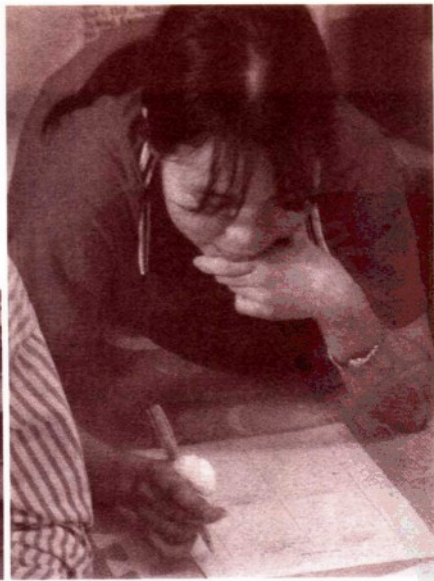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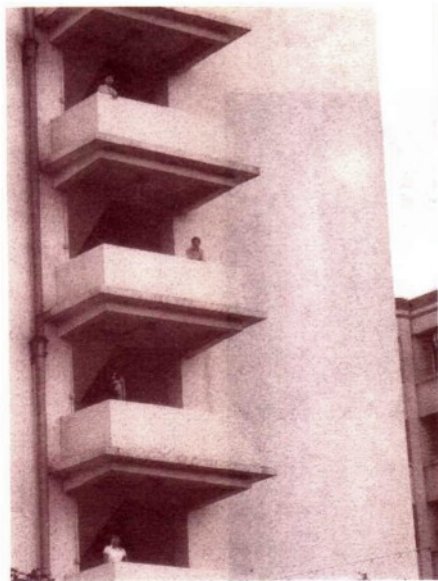
一路风雨，一路苦涩。





走廊尽头，是宿舍楼最清静的地方。

受伤的我期望的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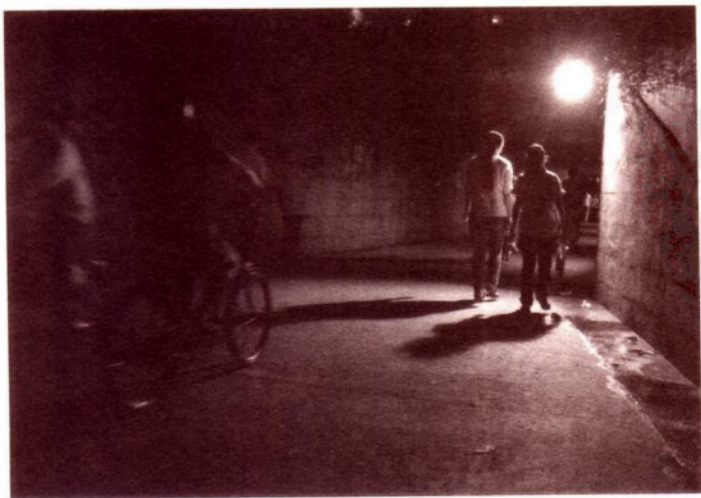
## I. 都是胶水惹的祸

### 为儿子去广东打工

近四十岁的阿兰来自四川农村。家乡地处山区，农民靠种田生活。阿兰有两个儿子，都在读书，丈夫上半年在家里种田，下半年到外面做猪毛生意，但收入很少。为了能让儿子继续接受教育，已经36岁的她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

2001年1月19日，阿兰和嫂子逛街，看到东莞“安加鞋厂”招28岁以下女工的广告。虽然阿兰已经过了年龄，但她还是办了一个临时身份证，回家收拾好东西就走了。

夜路……



新学网  
PDG

“那时候嫂子替我照顾孩子，我借了400元车费便和弟弟一起踏上了去往广州的火车，在车上我想起了孩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这家厂，她患上了职业病，以致在医院治疗长达两年之久。

到东莞后，阿兰交了50元介绍费就上班了，两天后就开始通宵加班。

刚到陌生的地方，既想念家人，又不习惯艰苦的打工生活，加班后回到宿舍，她忍不住哭了。

“我29日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就哭了。打工太辛苦，又特别想孩子，可是没有钱打电话，写信又不知道怎么写，心里非常难受。信纸在东莞是很贵的，一元钱才十多张，我2月18日以后才开始给家里写信。好在我侄女也在东莞打工，2月15日她来看我时，给了我150元钱，我才能买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每次和家人通话我都会哭得很伤心，家人要寄路费给我让我回家，可我是自愿出来打工的，怎么也要做满一年才能回去。”

为了家庭和儿子，阿兰一直忍受着恶劣的劳动条件。5月初，她被调到泡棉组工作，负责将胶水涂在鞋底的工序。想不到这个工作为她带来无尽的痛苦。“我的工作就是用刷子在鞋底刷胶，每次胶弄在手上，都会撕掉一块皮。刚开始催货催得很厉害，可是胶不黏，每天都要补胶，最后就给胶水厂打电话，到了11月份来的胶水就黏了。自从换了这种高浓度的胶水，工人就开始发病了。”

## 为了应付客户

据阿兰介绍，刚调到这个工位时，没有人告诉她们会使

用哪些化学品以及哪些化学品对人体有害,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岗前培训和防护措施,谁都不知道如何防止直接接触这些胶水。有时接国外的订单,偶尔会有些客户来生产线上看看,只有那时厂方才给工人发一些保护用具。

“(厂方)没有做岗前培训,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有客户来检查时,才发给一个围裙、一个口罩,只要客户一走,就马上把这些东西收上去。检查就发,不查不发。”

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多,2002年1月,阿兰突然病倒了。

“有一天我去洗衣服,感到手像触电一样,一下子麻麻的。我当时问同事有没有这种感觉,还猜想水里有电,她们都笑我,说水里面怎么会有电呢。后来好多人都有这种手脚麻木的感觉,可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家里打电话,那时老公也从云南回来了,他以为我得了风湿病,像我这种年龄很容易得风湿病的。在3月初的时候我请假回家治病,医生问我工作的地方是不是很潮湿,我告诉他只是打扫卫生的时候洒一点水。他问那怎么会手脚麻木呢,我说不知道。于是,家里的医生就按风湿病给我治疗。3月7日我回到厂里,到3月20日,我的脚怎么也走不动了。”

“后来,丈夫怀疑我是胶水中毒,写信要求厂方发口罩、手套,厂方发了些棉的,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四五月天气开始热了,加上厂房上是铁盖,而排风扇只有两扇,所以厂房内热得不得了。另外,空气不好,戴着口罩很不舒服。那时,我的手脚都肿了,心想反正都得病了,戴口罩也没用了,何况戴上也不舒服。就这样,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因不舒服而不戴口罩。”

虽然得了病,但阿兰没有立即要求厂方给她治疗,反而想到辞工回家。

“5月2日早上大集合，我突然觉得天昏地暗，一下子就摔倒了。当时正下着雨，全身衣服都透了。我心里很难受，怎么一下子走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啊？我向领导提出辞工，可当时我们生产线上已经有一个女孩请假了，领导说不能有两个人同时离开，我只好等到6月份。”

### 都是胶水惹的祸

“我老公一向很关注新闻，并从新闻中得知鞋厂一般都会使用胶水。由于刷胶的姐妹都病了，所以，他怀疑我的病不是风湿，而是和工作使用的胶水有关。他想直接到厂里跟



领导反映，我没让他来，因为厂里管理很严，保安不会让他进来的。他让我和领导反映现在的情况，可是安加厂十多年以来都没有人反映过胶水中毒的问题，以前得病的姐妹只是由家属带回去，厂里没有给一分钱，所以，我不敢向上反映。老公当时非常气愤。”

当时，安加厂的女工不知道胶水的成分，也不知道清洁水有毒，生产线的打工姐妹竟把胶水和清洁水混起来洗手。“胶水粘在手上弄不掉，很多人都把手伸到清洁水里，很凉快，很舒服。我是刷鞋面的，只能直接用清洁水洗手上的胶水，而不用白水洗。”

当时，有二十多个姐妹出现了相同的病症，她们向厂方反映了一下情况，厂方非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而变本加厉地要员工加班。阿兰她们要从早上七点多工作到下午5点30分，吃过晚饭后还要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钟，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长达21小时之久。有些女工受不了，不得不辞工，而阿兰却为了那每月800元的工资而苦苦坚持，尽管那时她已经发病了。

“我每天依旧上班，管工不在时，就在车间里熬中药吃。我们根本吃不下饭，又舍不得买零食，日子过得很辛苦，有几个年纪小的姐妹在流水线上哭了。我那时病得很严重，但想到每个月可以领到800元的工资，还是继续坚持着，直到实在坚持不了了，才给老公打电话说我想回家。老公说：‘不行啊，你是胶水中毒，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治不好你的病。这种情况必须找厂方，你不说，我替你说。’”

“他问我安加厂总经理的名字，可我不知道，他就直接写安加厂总经理收，他还写信到广东省妇联、劳动厅、广东省卫生监督所……一共写了二十多封信。”

总经理收到信后，就派主管找阿兰问话。“主管是我老乡，可他凶巴巴地问我：‘你哪里不舒服？’我把脚伸出来给他看，告诉他我已经走不了路了，他又说：‘你怎么知道是胶水中毒？’我说凡是流水线上刷胶的姐妹都有同样的病，她们有的请假，有的辞工，有一个已经瘫在床上了，我想应该是胶水中毒吧。”

6月25日，广东省妇联联系阿兰，想了解她们的情况。第一天没有找到，第二天就打电话给阿兰，让她找那些流水线上手脚麻木的姐妹们出来。

“我瞒着领导悄悄地对那些姐妹说了，她们不太相信，



开始还答应得挺好的，可后来都说害怕而不去，最后只有一个老乡阿梅陪我一起去见妇联的人。一个男的（后来才知道是省妇联的陈律师）把我们带到了酒楼，在那里省职防院的医生为我们做了检查。每只手都扎了许多针，但我们什么感觉也没有，血流出来了都不知道痛。”

第二天（即6月27日）省职防院、省妇联、镇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就到安加厂进行检查及向女工询问情况。阿兰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时厂里正停电，保安把所有安加厂的员工赶到了厂门外。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用仪器检测我们刷胶的工位，后来妇联的黄部长问我每晚加班到几点，我说昨天打卡是凌晨2:45，而由主任安排的员工却说加班到晚上9:00。黄部长看出有些人在说假话，并告诉大家说假话是没有好处的，他们只是想了解实际情况，大家没有必要弄虚作假，是怎样就怎样。”

最后，妇联的人拿出了阿兰丈夫的来信，让她证明是否是她丈夫的笔迹，并要求她确认来信内容的真实性。

“我看完信后，告诉他们‘死在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厂方都不负责任’这一条可能是我老公听错了，其他的都是事实。我走出写字楼的时候，有位小姐记下了我的厂牌。”

当天下午回厂工作的时候，主管责问阿兰是否认识来检查的人，还骂了她一顿，其他的工人也被调到别的部门。卫生监督所在车间呆了一整天，检查化学药品是否合格以及车间空气是否流通等问题。结果发现，安加鞋厂的车间完全没有通风管道和抽风机，加温隔层处也没有排气管道，有毒、无毒作业场所混在同一车间内，员工所戴的胶手套和棉手套也都不符合要求。



自从有关部门检查之后，主管就给阿兰脸色看。

“25日到27日3天的日子很不好过，领导的脸色不好，员工的态度也变了很多。晚上11点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在黑暗的流水线上坐着，主管让我们到二厂门口，他走到我面前，狠狠地说：‘你怎么了？’我说自己手脚麻木无力，主管接着说：‘我不早就要你辞工回家吗？’我反驳道：‘你哪里有叫我辞工回家，我早就提出要辞工的，可是你们不批，如果早批下来，我早就走了，病也不会这么严重。’”

“我很想快些离开工厂，并打电话告诉老公自己闯祸了，领导对我很凶，今天厂里又停电了，员工不准进宿舍。”

事实上，除阿兰及她的老乡阿梅以外，主任安排见检查组的其他的6个人并不做刷胶的工作。女工们还向检查组反映，刷胶组现有8名女工，已经有6人出现了手脚麻木的症状，此前还有4名女工因患此病而返乡。检查组要求厂方除了将厂里中毒的工人送去治疗外，还要尽快找回已返乡的女工，以便检查、治疗。

根据内地媒体的报道，厂方负责人周佑俊辩解说，他并不知道2001年10月颁布的《职业病防治法》，也不知道胶水里含有有毒物质以及16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不能从事有毒有害工作。没有人相信，一家在东莞运营十余年，通过国际ISO9000认证的台资厂却不知道相关法律。据报道，安加厂理应拿出100万支付中毒女工的医疗费，但最后却只付了18万。有些女工至今仍住在医院。

## 住院的日子里

“我们厂中毒的姐妹一共有二十多人，有些人四肢不能灵活运转，手指无法抓紧筷子，严重的甚至瘫痪。入院时，

我的腿已经肿到膝盖。老板为了分散社会注意力，把生病的工人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治疗。在女工的强烈要求下，我们才住到了省职业病防治院。”

有13名女工先后被广东省妇联的干部从贵州、四川、河南、湖北等地接到省职业病防治院来治疗，有些女工只有十六七岁。她们都是因患病而辞工回乡的，回乡后病情却不断加重，当地的诊所都不能确定病因，也无法治疗，原本就贫困的家庭因昂贵的医疗费用而变得一贫如洗。

“有些姐妹是坐着轮椅来的，那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是正己烷中毒<sup>①</sup>，当初手脚发麻，就是中毒的临床表现。”

“两年的住院生活使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经常会为此不知不觉地落泪。家乡的人会怀疑我们得了什么怪病，要住院那么长时间。我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别人说什么也无所谓了，可还有很多二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她们要怎样面对以后的人生呢？”

“安加厂集体中毒事件被曝光后，迫于媒体的压力，老板在过节时会给我们红包，中秋还会发月饼，说不会忘记我们。当时还有记者拍照、采访。记得刚进医院时，老板的‘眼线’一直紧紧地盯着我，中央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我就实话实说，但老板的‘眼线’对我说：‘你今天不该这样说。’”

2003年9月中旬，阿兰和其他4个姐妹一起出院了，结束了她们长达两年的枯燥的住院生活，但厂方始终不肯主动来接她们。阿兰说：“我会和其他姐妹一起，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经历了这件事，阿兰体会到多懂一些职业病知识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厂方要给工人提供一个安全作业的环境。

“在中毒事件中，厂方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工厂运营

了那么多年，他们肯定知道胶水有毒，那就应该进行岗前培训和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果我们知道胶水有毒，肯定会向厂方要防护工具；如果早知道这种病是胶水中毒，我就可以早申请享受职业病待遇，不用等到我丈夫写信了。”

阿兰的不幸经历并没有打消她出来打工的念头，因为她要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就必须出来赚钱，反而是丈夫不想她再打工了。“老公不想我再出来打工，可是孩子要读书，家中还有老人需要赡养，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是想出来。”阿兰有些亲戚在浙江，她可能会到那里去。

## 后记

阿兰就是轰动全国的“台资企业安加鞋厂事件”受害者之一，这家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建厂已有10年，在东莞有两个分厂，有两千多名工人，七成以上是女工。该厂生产过程分为裁断、针车、成型3道工序，后两道都要接触胶水。

内地媒体曾报道：安加鞋厂的台籍老板周佑俊直言不讳地说：“为工人治病，70%为自己，30%为女工。”由此可见，老板这么做更多地是为了挽回企业的信誉。他还问过一个年纪很小的女工：“你治好了病，还会回到我的工厂里工作吗？”那个女工说，死也不去了，一次打工就怕了，再也不出来打工了……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安加厂很多中毒的姐妹，她们的答案是一致的。

阿兰发病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拖着病重的身体继续工作，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病会和“胶水”扯上关系，而工厂的管理人员居然也不知晓。如果不是阿兰老公的二十多封信，还不知有多少姐妹会在穷乡僻壤的家乡过着度日如年

的生活，有多少姐妹会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据相关资料显示：1989年至2001年，广东省共报告职业病4848例，其中新发现尘肺病2486例，死亡1160例，急性慢性职业中毒1656例，死亡107例。另据调查，全省的职业病漏报率为120%，因此，1989至2001年职业病实际发病总数为10666例，死亡人数为2787例。2001年报告发病总数是1997年的2.78倍，平均每年递升69.2%。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院长黄汉林表示：20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的职业病70%为重金属中毒，1989年有机溶剂中毒占职业病的比例只有2.5%，2001年上升到80%，整体情况与发达国家相似。伴随着工业生产高速发展，新职业病种类也迅速增加，去年新发现了11种，今年又发现了13种，如正己烷、三氯乙烯、二甲基甲脞氨等溶剂中毒；中毒行业也在扩展，电子、五金电镀、制鞋、印刷、宝石加工等行业都发现了职业病，连以前较少发生职业病的制衣业也因化学品的使用而引发职业病，珠江三角洲发现的职业病也愈来愈严重。国家早在2002年5月1日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突出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关键是预防。

注：① 正己烷中毒主要透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进入人体。中毒类型可分急、慢性两种。高浓度正己烷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咳嗽、气急、气喘等呼吸道刺激症状和中枢神经系统麻醉性抑制。慢性中毒主要表现为四肢远端指、趾对称性麻木感、触痛觉反应迟钝，四肢疲软无力，脚踝部疼痛，手腕、足可出现下垂。重者下肢可瘫痪，肌肉萎缩，体重减轻，痛觉消失。中毒者在脱离接触正己烷后3个月内病情仍可继续恶化。一般病程为6—30个月，恢复缓慢，但治疗及时也能恢复如常人。

## 2. 彷徨于打工路上

26岁的晓是我们女工关怀的义工，平时积极参加我们的妇健快车活动，为其他打工妹服务。17岁时晓就出来打工了，东莞、深圳和珠海都有她打工的足迹。现在，她在深圳宝安区某一外资五金厂做流水线的普工。

她性格内向，很少说话，直到因工伤找我们帮忙后，我们才渐渐地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在成长中受到的挫折，才造成了她现在的自卑性格。



## 失去母爱的童年

晓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偏僻穷困的山区，交通非常不方便。农民只能靠种水稻和编织篮子为生，晓从小就与同村的妇女编织篮子并拿到市场上卖，以此赚取生活费。

9岁时，母亲因不满丈夫重男轻女的思想，带着只有几个月的妹妹离家出走了。母亲出走后，家庭的重担就压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

晓是家中最大的女孩，自然要料理一切家务和照顾妹妹们，这使得晓从小就很独立。她一边上学一边忙家务，断断续续地读完四年级后，她不得不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当时，只有13岁的她没有抱怨。

“妈妈一连生了4个女儿，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子，父母感情不好，经常吵架，妈妈心里很难过。爸爸还因迷信，被抓去坐了7个月的牢。自从爸爸出狱后，妈妈就有了离开我们的念头。没多久，她就带着最小的妹妹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没有想到妈妈真的会走。那时我们还小，需要照顾，爸爸为了把妈妈找回来，变卖了家中所有能卖的东西和准备盖房用的砖、瓦、木材，但还是没有找到。”说到这段往事，晓泪流满面。也许晓很渴望找到自己的母亲，毕竟她那么小就失去了母爱，但她知道，对母亲来讲，勉强与感情不和的父亲生活在一起是不幸福的。

## 艰辛的打工生活

1993年，在家干了4年农活的晓，遇到出外打工的表姐，抱着可以在外打工赚钱的希望，晓请求表姐将她带出来打

工。可是，父亲不大同意她外出打工，她们三姐妹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不放心她那么小年纪就打工。不过晓决心很大，她向同乡借了身份证，又向堂姑借了路费，与表姐妹一行3人出来打工，当时的期望就是：“我想多挣一点钱回家，这样就可以减轻爸爸的负担。”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很苦，表姐带着我们，还没到终点站几十块钱就差不多用光了，我们还曾经露宿街头。”说起刚出来的那段经历，晓长叹一声，这可能是每个初来者在美好憧憬背后的无奈，也可能是她们最难忘记的往事。

“虽然表姐来过深圳一次，可她不太熟悉路，我们只到松岗就下车了。那天下了很大的雨，路上满是积水，而我们身上又没有什么钱，只好在桥底下过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雨小了，表姐要先回到厂里借钱，再过来把我们接过去。”

一个初来深圳的农村姑娘，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一场倾盆大雨和夜宿街头的狼狈，而冰冷陌生的工业区让她更加畏惧。因为年纪小，身份证又不是自己的，晓一个人不敢贸然找厂，所以她迟迟未找到工作。

“在龙华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厂，表姐没办法，就把我送到东莞的一位姑妈那里，但我们没有办法进姑妈做工的电子厂。当时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找厂，而她又很忙，没时间带我们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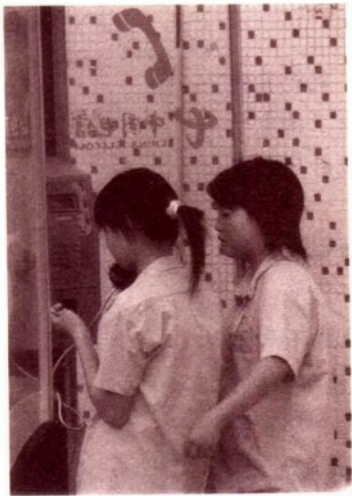
在东莞待了一段时间仍不能如愿，晓只好又回到表姐那里，在布吉进了一家纸品厂。那家工厂有一二百个工人，生产纸袋、彩盒之类，工资只有二百多元。晓因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没管条件是否理想就跟厂方签了两年的劳动合同。后来这家工厂订单不足，工人时常没事可做，晓两个月后就辞工了。经老乡介绍，晓转到一家首饰厂工作，每天八九元，

一月大约二百多元，晓负责加工工作，非常辛苦。

“我在加工部工作，那些产品都是带油的，很不好拿。如果赶货，每天就要加班5个小时，而且周末不能休息。工作很辛苦，总是拿钳子，手都肿了。”

由于工厂实行计件工资，为了多拿点工资，工人们会不停地做。但是，工厂的伙食不好，工厂吃的都是炒黄的青菜。

孤单内向的晓很少向其他人倾吐心事，她不习惯这种打工生活，非常想家，也不时地向爸爸诉苦，但因为回家的路费不够，晓外出打工的第一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回家的车费很贵，而那时我也没有什么钱，只让表姐回家时带了200





元钱给我爸爸，其实挣钱真的很难。”

父亲知道女儿在外面打工艰难，也替女儿操心。刚好春节时晓的一个远房叔叔从珠海打工回去，爸爸就托他带晓一起去珠海找工作，并要求晓辞工回家。晓回家的第二天就和村里其他十几位姐妹一起随着她的叔叔来到珠海。

晓的那个叔叔在珠海某厂当保安，专门替厂方回家招人，从中收取厂方中介费，200元的介绍费以及100元的路费。晓气愤地说：“虽然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但他太黑了，从我们身上赚了那么多钱，那些暂住证、路费、边防证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钱的。”

## 珠海的工厂

在珠海，晓进了一家有一千多人的塑料花厂，每天工作12小时，计件工资每天约有十到二十元，晓在一个操作机器的部门工作。车间的工作环境很差，由于做塑料材料要不时地烧熔塑料，再加工成不同类型的成品，因此车间里的温度很高，冬天穿一件夏天的衬衣还勉强可以，到了夏天，就热得受不了，每隔几分钟就要去洗一次脸。

“工作经常会有危险，比如熔融的塑料落下来会把人烫伤，或者是在加工花叶时将手粘住。厂方没有安装空调，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我们十分辛苦，但是这个车间的工资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多苦我们也要撑下去。”

## 工伤事故频发

工作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晓4月份进了那家工厂，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两名工人被机器轧伤手。

“我们车间里经常发生工伤事故，他们的工作都是要用

手把模具放进啤机内，有时工人没装好就按下按钮，手被轧到了；有时模具和机器也会失控，轧到工人的手。我刚去的一个月就有两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个女孩刚上班不久，手就残废了。后来，一个老乡做了二十多天就被轧到了小手指，只好拿着一个月的工资回家了。”

面对厂内艰苦的劳动条件，不懂《劳动法》的女孩子不知如何解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辞工回家。结果，晓与其他一起出来的姐妹做了半年左右就回家了。

那时父亲已经到上海打工，晓回家照顾两个妹妹，渐渐地感到无事可做。春节过后，晓和她的同学再次到广东打工，仍在念书的两个妹妹互相照顾，生活费由父亲和晓共同承担。

晓和她的同学来到东莞厚街镇，同学进了一家电子厂。由于晓小学未毕业，没有文凭，只能进一家手袋厂工作。那家厂每天工资只有8.5元，而且工厂管理很严。晓在这家厂做了3个月就辞工转去了深圳一家电子厂。

对许多打工妹来说，辞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晓辞工时，工厂不但不发给她那个月的工资，连她的行李也不准拿走。

“我虽出厂了几天，但一下班我就去宿舍穿衣服，拿不出来只能穿出来，那时宿舍内其他的东西也不要了，好在那时是夏天，没有被子。”回想当时辞工的狼狈，晓仍有些气愤。

晓刚进那家电子厂时是做普工，包吃包住，工资每月只有180元。后来被提升为质量检查员，工资加至270元。不过厂方经常拖欠工资，通常两个月发一次工资，工人曾向有关部门投诉过，但没有什么改变。晓在这家厂做了近两年，工资也增至四五百元。

后来有位经理跳槽到别的工厂，晓就随他一起离厂了。

不过晓跳槽到的那家厂在1998年2月就倒闭了，厂方本不想给工人工资，但车间领导带着所有的工人去劳动局投诉，最后拿到了工资。

离厂之后的一段日子，晓投靠一位在龙华工地上干活的老乡，晓说那是她在打工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

“他们两个男孩子的床位合起来给我们5个人住，我们白天出去找厂，其他时间就与老乡们一起打牌、聊天。下雨时工地不用开工，他就跟我们一起出去玩，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工作，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平日忧郁的晓，说到那段美好的时光，神情也不自觉地



工厂下班铃响起之后。

带着兴奋。

### 不堪回首的工伤

在龙华，晓曾经去过一些电子厂工作，但工作条件都很差。当时，25岁的晓在成千上万的打工妹中算是大龄女工了，一般的电子厂不聘用大龄女工。对一个打工妹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无落脚之处，身上又没有暂住证，非常危险。晓回想那段彷徨的日子仍然很忧伤。

2001年初，晓进了宝安区一家韩资的五金厂。想不到在这里，晓受了工伤，给她心理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当时听说这家厂的工资很低，但是找工作找得太累了，晓就打算先在这里干着，然后再说。不幸的是，晓的3个月试用期还没满，就受了工伤。回想当时的情况，晓非常难受，她神色黯然，声音低沉地说：“我们厂里两班倒，早班要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多，我们晚班从9点开始，当时一个白班的女孩子过来和我聊天，我一边说话一边干活。可是，当我还没有把产品装好时，她却帮我按了一下机器的开关，在这种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我的手指被机器打碎了。当时没流什么血，只是看见手指被打掉一截，我们两个人都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好组长过来，我告诉她我的手被打到了，组长就找人拿钱送我去了医院。”

### 厂方为省钱不让她入院治疗

“厂方的负责人在晚上9:30都已经下班了。到宝安医院的时候，医生问我要怎样治疗，组长也拿不定主意，只说要等厂里送钱。她找来一个人陪我，自己回厂里上班了。我的手缝了6针，止住血，打完点滴已经凌晨三点多了，人事部的人

没有让我住院，而是把我带回了宿舍。麻药过后手开始疼，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厂里的人仍带我去打针，我问厂方为什么不让我住院，她们解释说住院也是打点滴，和现在一样，但花钱就多了。当时我觉得最难受的那个晚上都过去了，现在住院也没什么意义了，也就算了。”

晓打了3次吊针之后，她的手仍是很痛，厂方勉强给她多打了两天的吊针，后来就只是换药了。不过，厂方拖延敷衍的态度令晓很气愤。“有时候医院说好是两天换药一次，可厂方总是拖成3天。后来到了拆线的时间，厂方也不领我去医院，我到办公室找她们，她们都推说自己有工作，使我



过了拆线期。”

别小看少了一截小指头，晓除要忍受身体的痛苦外，还有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由于拖的时间太长了，刚长出的肉都粘在线上，拆线的时候特别疼，我好想哭啊。我对护士说剪到我的肉了，可护士却凶巴巴地叫我别喊得那么严重。那时真是感觉比动手术还要痛，真是心里痛啊。回来的那个晚上，心里想的都是医生动手术的动作，仿佛在割我的肉、割我的骨头。”

“我当时想，我打工那么长时间都很顺利，想不到在这里受了伤，感觉自己残废了，也许我的手会让我遗憾一生。”晓说她很恨那个让她受伤的女孩子，“我很恨她，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掉我的手指，而且我受伤后，她一直没有来探望过我，真是没有良心，当组长问是不是她打到我的手的，她都没敢承认。”

后来，厂方知道真相后把那个女孩开除了，对此，晓还有点不安，觉得是自己让那个女孩丢掉了工作。然而，这家五金厂时常发生工伤事故，绝大多数不是个别工人的责任。

“我入厂时曾上过安全课，一楼的工伤最多，今年就有十多个，大的工伤是不见了一只手或是五个手指都不全，小的工伤是不见一节手指。听一楼的工人说，到处都是危险。”

更令人气愤的是：受到工伤的工人被厂方视为其工伤是个人不小心造成的，在加工资时会受到歧视：“组长说，这些受伤的人是表现最不好的，加工资也是加得最少的。这样对谁的压力都很大。”

在晓的手康复期间，她的日子非常难过：“那段时间我心里很慌，不知道可以休息多久，看到别人上班，而我呆在宿舍里很烦，想去上班。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那时还上什

么班啊。等我好了可以上班时，又感到很害怕，不敢去。过了好长时间，厂方也没有跟我说起赔偿的事，那时我还以为手指受伤起码有3个月的医疗期，担心过了医疗期就不能做鉴定，所以心理压力很大。”

性格内向沉默的晓，平时很少与其他工友聊天，但受伤后同住一室的打工姐妹还是非常愿意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只是被晓婉言拒绝了。

“我手坏了，洗不了衣服，她们要帮我洗，但我没让她们洗，她们加班也很累，我天天在宿舍里算是轻闲的了，怎好麻烦她们？我尽量穿些简便的衣服，洗起来也方便一些。”

晓的伤势痊愈之后，厂方和她去做了工伤鉴定，评定为十级伤残。根据当时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除获得社会保险局给予的6个月工资作为伤残补偿金之外，如果不回原厂工作，那么原厂方还应该支付工伤辞退费（大约4个月的工资）。

晓不想再在这家工厂工作了，要求厂方给她工伤辞退费，可是厂方一再拖延，从9月份到12月底，她差不多每天都去厂方那里要求赔偿。“我每天都去总务部，保安总是很凶地说老板不在深圳，还说厂方负责人不能随便见工人。”

后来，总务部向晓表明如果她肯接受3个月工资的补偿金，他们可以立即支付给她，但若要4个月工资的补偿金，就必须等韩国老板回来。由于晓一直坚持，直到2002年1月厂方才答应给予全数的赔偿，拿到钱后晓就离厂了。

## 向往家庭生活

离厂以后，晓想回家找一个对象结婚。26岁的她觉得还没结婚的压力很大，而且自小失去母爱的她，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时候，晓带点苦涩地说：

“我性格内向，又很自卑，这可能是家里的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也没法乐观。我每天想的东西很多，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小时候我家里太苦了，苦得令我害怕，所以我不会找一个比我家里更穷的人。以前曾交往过一个男孩，他人很不错，但考虑到他的家庭负担也很重，就拒绝了。我希望找一个值得信赖的、成熟一点的男孩子。”

虽然晓在成长的挫折与打工的压力下很坚强地挺过来，但在“坚强”的背后，晓却把一切都结潜藏在内心深处，封闭在一个自我的世界里。

晓盼望的婚姻生活可以为她的人生带来幸福吗？我们不敢想象，做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村媳妇会面对怎样的生活状态。外出打工多年，在习惯了城市生活和文化后重返农村，她会适应吗？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

## 后记

访问结束半年后，当我们想象着应该已在家中的晓，正处于何种生活状况时，却意外地看见她瘦小的身影又出现在匆匆忙忙的打工群体之中，在匆忙中与我们寒暄了几句后，她又回到流水线上工作了。我们不知道她可否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只有默默地祝福她。





### 3. 机器轧掉了我的手指

26岁的阿秀来自四川山区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以种田和养猪为生，每年收入两千多元，算是温饱之家。她是家里的大女儿，还有两个妹妹。由于学习成绩不好，阿秀自动放弃了学业。1992年，16岁的阿秀和堂弟及同乡一起出来打工。

当初，阿秀抱着好玩的态度出来打工，没想到却遇上了一件让她难过至今的意外。

“这是……”阿秀欲言又止，后来她慢慢地伸出自己的



乘坐小巴搬「家」。

右手，原来右手无名指少了一节，在我们的询问下，她说出了打工受伤的经过。

### 决定弃学务工

阿秀承认自己受堂弟的影响很大，出来打工并不全是为了赚钱。其实，家中并不需要阿秀负担什么，临行时爸爸对她说：“我不需要你给家里寄多少钱，你挣的钱自己存起来吧，留着出嫁的时候用。”同时，阿秀听很多打工回来的人说外面很好，像天堂一样，工作不是很累，挣钱比较容易。于是，学习成绩不好的阿秀主动放弃学业，决定到外面“好好玩一玩”。

“堂弟和我同岁，小学没毕业就到广州打工，两兄弟一次就能寄1000元回家，这让我很羡慕。当时，我的学习成绩不好，觉得即使考上高中也没有发展，还不如多赚一些钱。于是，我决定放弃读书，并把书都背回了家。妈妈非常生气，哭着对我说：‘你会后悔的。’我说不会后悔，自己要出去打工。爸爸看我那个样子也没什么办法，就让我出来了。”

当时，听一位想出来打工的老师说，有家厂只要有毕业证就能进去，于是，阿秀为自己办了假毕业证。

### 真正的打工生活

1992年，16岁的阿秀和其他几个女孩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去深圳石岩投靠阿秀的堂哥，同行的还有她的姑姑、堂弟和表姐。第一次走出山区农村，阿秀非常兴奋，幻想着外面世界的美好。

从四川到广州，有5天5夜的行程，包括汽车、火车和轮船，而从未出过远门的阿秀又有点晕车，所以忍不住哭

了。到了深圳石岩才知道老师说的那家工厂根本没有招工，原来的计划落空了。

堂哥在深圳以捡垃圾为生，家里成了垃圾的分类场，根本没有地方让他们住，他们6人只好到山上睡。“山上有很多死人岗，非常吓人，还要躲避查户口的人，好在有几个男孩子陪着，胆子还大些。”

后来在堂姐的介绍下，他们进入一家陶瓷厂做普工。那家厂有二百多人，早上8:00上班，下午5:30下班，有时加班到晚上9:00-10:00。阿秀进厂刚做一个月就被炒掉了，原因是她参加了工人罢工。



在杂乱简陋的小食摊旁，是另外一种艰苦与无奈。

“工厂现在的要求很高，有些陶具上面的线条要画得很直，制作非常精致，像雕刻一样，而以前的要求没有这样严格。那些老员工觉得要求太高，很难做好，就组织了一百多人罢工。我们刚进来的女孩子不懂事，也跟着罢工。老板生气地说：‘刚进来就敢罢工，干脆炒掉。’就这样，我们4个人全部被炒掉了，而那些老员工反而没什么事。后来才知道，老员工有技术，而且很熟练，老板不会轻易炒他们的。”

阿秀不知道罢工的结局会是怎样，被炒时不仅没有发当月的工资，还被扣了50元的押金。她觉得自己很惨。

“我找第二份工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期间，我只有在外面流浪。堂姐所在电子厂的宿舍不经常查户口，我就和她一起睡，有时去姐夫那里吃。姐夫告诉我要进就进一个好一点儿的厂，差的不要进。于是，我听说哪个厂好就往哪个厂跑，结果发现每个厂都有很多人应聘，根本挤不进去。找了二十多天，终于进了一家塑料花厂，进厂押金36元。那家工厂条件很差，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多元。”在那里做了3个月，阿秀又转去附近一家电器厂了。

几个月的打工经历让阿秀感到失望和后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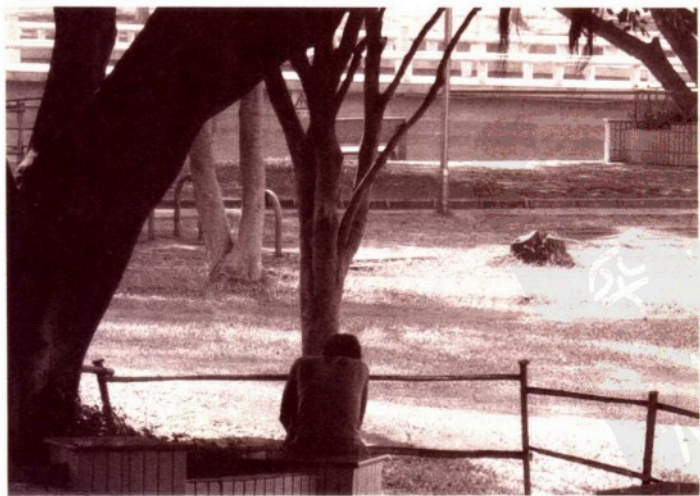
“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了！以前想着打工很好玩，工资也很高，可是苦苦地找了那么久，也没找到一个理想的厂，身上的钱也快用完了。我时常躲起来哭，后悔不该出来，但是已经这样了，只能忍受下去。我给家里写信说找不到厂，父母担心得直哭。我真是让他们操心啊！”

1992年底，阿秀进了一家生产电动马达的台资工厂。这家厂只有星期天放假，每天加班到晚上9:30，每月底薪240元，加上奖金、勤工奖、效率奖等，一个月大概有四五百元。阿秀觉得这家厂很不错，没想到这家厂给她带来了一生抹不

去的阴影。

“刚开始，我还不想进那家厂，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感觉无依无靠。为此，姐夫骂了我一顿，说别人想进还进不去，我不应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后来，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厂，我也就进去了。

“进厂时要面试，我骗保安说自己在很多地方干过，保安就让我进来了，还告诉我参加副总经理面试时，要说自己是刚从家乡出来的，目的是想赚点钱，在厂里会好好做的。面试时，副总经理果真问我出来多久，打工的目的是什么。我按照保安的嘱咐回答，轻松地过关了。



永远的创伤

“我的工作负责装配马达的零件。厂里的管理并不严格，我做得很轻松，也很高兴。厂里的生活条件也不错，12个人一个宿舍，每个宿舍都有热水、冲凉房，每个人还有一个衣柜，厂方还给工人发被子、碗、筷等。但是，床上不准乱贴乱放东西，只准放一床被子，连蚊帐也不准挂。饭堂的管理相对严格些。每个人在饭堂都有一个装碗筷的小柜子，吃饭时4个人一组，三菜一汤，一般有两个荤菜，伙食很好，打饭时要有秩序，边打饭边吃会被罚款5元。”

### 受伤的经过

阿秀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即将零件送入台钻钻孔，然后用手和脚踏着开动机器。早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机器就已被西方国家淘汰，生产前厂方也没有好好地检查，但阿秀却不知道操作机器的危险。

“马达里面的那个零件上面本来有一个小孔，只要在机器上钻大一点就行了，好像不是很危险。事先厂方没有对工人进行任何安全培训，只是告诉我们怎样操作。那天我把零件放进去，可是机器失灵了，砸掉了我的手指。”

“我刚到那个岗位才两天就出了事，组长很害怕。那时我差一点昏倒，但我知道手指没有掉下来，一直在流血，整个手已经麻木了，没什么感觉。坐车到了医院，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就听厂方的安排，截掉了手指。”

当时，厂方之所以同意医院截掉她的一节手指的原因竟然是为了节省医疗费用。“那时医生没有跟我说，是厂方在医疗单上签的名，打麻醉针时医生不让我看，怕我害怕，我只知道哭。”

没有亲人在身边，她觉得太孤独了。

失去一节手指的阿秀很难过。

“我想这下可完了，手指都断了还有什么用？以前在家里父母邻居都很喜欢我，村里只有3个女孩子和我学历一样，找男孩子也可以挑别人；现在变成这样子，还说什么去挑人家，不知道能不能嫁出去。当时我很委屈，天天哭，好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受伤后，厂方为了省钱而没有让她住院，只是每天送她到医院换药、打点滴。

“厂方也没有通知我的家人，受伤当晚缝了线就送我回宿舍去了，连续两个晚上我都痛得无法入睡。”



幼小的沧桑

受伤之后，阿秀才知道那家厂每年总有一两个工人受伤，但厂方仍然不重视工人的生产安全。前一阵子，轧伤阿秀的那台机器曾轧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手，后来就没有人敢用它了。因为阿秀是新来的，好说话，又不了解情况，所以，组长就让她去用那台机器。

在受伤休息期间，厂方只负责阿秀的生活费并每月支付给她240元的底薪。由于厂方没为她买社会保险，所以她得不到任何社会赔偿；后来，她去医院做了工伤鉴定，并被鉴定为十级工伤，但厂方却不给她赔偿。

阿秀不懂法，也不知如何申诉，整日在彷徨和忧虑中度过。

两个月后，她的手逐渐康复了，厂方要她上班，可她只希望领取赔偿，而不想再在那家工厂工作了。出事之后，她不清楚厂方是否仍使用那台机器，但对返回车间上班有很大的心理障碍。

“主管要我上班，可是我一看到那些转动的机器心里就害怕，担心和上次一样，这种不安全感太强烈了。我天天去办公室找他们要求赔钱，可是主管只叫我上班，根本不提赔钱的事。虽然每天都去找老板赔偿，但我心里十分害怕，担心被厂方责骂。那时，我只有17岁，没有人陪我，一切都得自己办。”

当时，堂姐和姐夫都知道她受了工伤，但一直都没看过她。直到第5个月，她在深圳做包工头的叔叔要到东莞办事，顺便到石岩看她。当他得知阿秀受了工伤，就帮她去工厂找负责人。

“也许是老板见我们人多，有点害怕了，一边倒咖啡招呼我们，一边推说不是不赔钱给我，还说想让我在这里继续



做下去。我说我不想做了，只想要赔偿。老板让我当时就写了申请书，并向我叔叔承诺给我应得的赔偿。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拿到了3600元的赔偿金。”

叔叔替她要回赔偿，她给了叔叔300元的火车费，但叔叔对此非常不满。

“我婶婶说，叔叔为这件事出了很大力，我却给他那么少的钱。可我自己只有那3300块钱。另外，叔叔是为了做工而顺便来的，我给他300元，已经不少了。”

当时，如果厂方不赔偿，她也没什么办法。

“那时如果厂方不赔的话，我一个弱女子该怎么办，去



劳动局，要怎样告，从何说起，需要什么手续证件，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一想到这里自己都觉得害怕。”

虽然厂方根本不维修机器，不进行安全培训，虽然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也没有负起工业安全监督的责任，但善良的阿秀没有怪罪任何一方。

“我没有怪厂方和劳动部门。俗话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好像那一年命中注定要出意外，叔叔给我算命也说，要不是工伤的话，我在马路边也会被车撞到的。”

### 厂方的冷漠

“解决之后，我心里觉得踏实多了，好像一块石头落了下来，最后在赔款单上签名时觉得好伤心，自己好好一个人来到这里，竟然断了节手指！于是，不知不觉哭了出来。那个主管很凶地说：‘哭什么哭，又不是死人了！’我生气地对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如果我拿10000元钱让你把手指弄断，你愿意吗？’他们不吭声了。”

说到激动处，阿秀的眼泛着泪花。谈起那个主管，阿秀很是愤怒。

“他的心非常狠毒，工人都说出去后要打他。有一次，他在石岩一家医院门外被打了一顿，后来就不敢出门了。我每次去写字楼都要说好话求他，跟在他的身后转，真的好惨！”

面对这样的主管，宿舍的工友一直鼓励她，这才使阿秀有勇气去争取赔偿。

“她们都让我去要钱，还教我怎样做，那些年纪大的教我怎样写申请。女工们都很好，比我的亲戚还要好。我当时很害怕，那些领导个个趾高气昂，瞧不起我们，我担心会被他们骂。他们就鼓励我，叫我勇敢一点，不要害怕。”

拿到赔偿之后，阿秀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了。她只想着呆在家里做家务，不想再到流水线上工作，她害怕那个悲剧重演。那时她才19岁。按照农村的传统，19岁的姑娘要订亲了。

“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赞成或反对，刚开始大家都是没有感情的，但感情可以在订亲之后慢慢培养。”后来，姑姑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孩子，也是同乡四川人，彼此的家相隔20里路。

虽然订了亲，阿秀并没有想过一辈子呆在农村，她觉得农村生活太贫穷、太无聊，还想出来打工，还想在外面闯一闯。1995年春节后，她在家呆了半年，渐渐地又想出外打工了，父母没有反对，于是在1995年春节后与堂姐一起来到了东莞立新镇。

## 永远的创伤

阿秀很少向别人提起自己的工伤，觉得那是件不光彩的事。平时，她会将手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

“这只手让我在进每一家厂时的压力都很大，我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记得在东莞的一家厂工作时，一个女孩看见我的手，就和另外的女孩谈论我，还笑话我，这让我心里非常难受，甚至哭了出来。”自卑而脆弱的阿秀根本无法克服断指的创伤。

事隔多年，阿秀仍很在意别人留意她的手指。

“现在一起工作的人还合得来，已没有人笑话我了，只是每进一家新厂我都很担心。”

辗转数年，阿秀在深圳和东莞的数家工厂里做过普工。这期间，她结了婚，但因农村生活条件始终不好，加上为修

房子的事跟丈夫有些不愉快，所以，阿秀又跑出来打工了。

对阿秀而言，打工妹的生活只是一种“过渡”，她计划打工到明年就回家与家人团聚。她现在有一个女儿，更希望生一个儿子。

“在外面单身是好玩一点，但是很想丈夫和孩子，开心的时候还好一点，不开心的时候就更想了……”



#### 4. 我的妹妹就这样没有了

这是一个有关女工“过劳死”的悲剧。

当我们知道春梅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已经沉睡在冰冷的停尸间等待火化。一个哀怨求助的声音将我们带到深圳松岗某个工业区，与春梅的姐姐和父亲见面。在他们那里，我们了解了一些春梅的打工生活。我希望当这篇文章将“过劳死”公布于众的时候，春梅可以安息，也希望“过劳死”不要再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春梅的家乡地处四川的贫困山区，主要以种田为生。对这里的姑娘来说，到城市打工赚钱是一个梦想，青春活泼的春梅也不例外。当时比她大两岁的姐姐已经出外打工数年。虽然生产线上的工作很辛苦，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的确充满了吸引力，家乡里能跑出来打工的人都出来了。

才18岁的春梅，不理睬父母的反对，决意到深圳打工。没有想到，这次打工居然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父亲不同意她出来打工，因为家里其他的妹妹年纪小做不了农活，而做农活也非常辛苦，她走了就没人帮忙了。但她并没有告诉父母，偷偷地跑出来了。”姐姐回忆妹妹出来打工的初衷时说。

#### 我很累，想回家

经姐姐介绍，春梅在2000年5月进了深圳松岗的一家港资玩具厂，负责剪线头，工资只有几百元。后来，一个四川的管工在老板的指示下调走3条生产线的人开了一家分厂，春梅也被调到了新厂工作。当工人做完毛娃娃后她就去取来剪线，每天要跑来跑去十多个小时，十分劳累。

在事发前几天，春梅对姐姐说她很累，想辞工回家。那时姐妹两人都打算回家，但是厂方拖欠工人工资，春梅没有办法走，就等了一段时间，没想到在这期间却发生了悲剧。

“本来我们两姐妹这个月(11月)就可以走的，但是他们(老板)拖欠工资，没有办法走，她只好在那家厂又做了一个月。我妹妹死之前那个晚上对我说：‘姐，好累，我想回家了。’我让她辞工，然后我们一起回家，她说辞不了，上班很忙，下班睡觉，厂里的人不让她辞工。”

女工宿舍的条件很恶劣，十多个女孩子挤在一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内，楼内没有热水器，要用热水洗澡就不得



女工宿舍里唯一的桌子。

不在房内水桶中装上发热线，或是跑到宿舍楼下提热水。11月已是深秋时节，也许是太累的缘故，下班回宿舍后春梅不想梳洗只想倒头大睡，因为第二天大清早又要工作。

在打工者宿舍内没有热水是十分普遍的事，工人只顾拼命工作，却不知道向厂方反映生活需要。

“我真的没有想到妹妹会死，她临死前还到我这里洗澡呢。那时已经半夜十二点多了，她刚刚下班，跑到我这里要洗澡，她说她那里很冷，没时间打热水，已经两三天没有冲凉了，我就给她提了热水，她洗完后还吃了碗饭，玩了一会儿就走了。

“春梅回宿舍后我也休息了，不久有个女工来告诉我‘春梅出事了’，我立刻和丈夫跑向她的宿舍。当时，我的心很乱，为什么刚才还好端端的，一阵子就出事了？我拼命地跑，心中又气又急地想，春梅出事了，她们舍友应该立刻送她去医院，找我也没用啊！我也不是医生，再说到我这里来回也要二十多分钟，很有可能耽误了春梅的病啊！”

跑到妹妹的宿舍，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春梅倒卧在湿滑淌水的卫生间里，七窍流血，已经昏迷不醒。

“我丈夫立即用毛毡包着她跑去附近的医疗站，等待救护车。”春梅的姐姐说起这件事很生气。

**老板娘：有事由家人负责，我不管！**

“春梅出事的时候，老板娘没有立刻为春梅急救，还说出什么事由家人负责，她不管。我们抱着春梅赶到医院时，医生说春梅已经不行了。”

姐姐的泪水在眼中打转，她拿着妹妹的照片给我看，相片中的春梅薄薄涂着口红胭脂，留着长发，一脸秀气，微笑

地望着镜头，看得出她满怀着青春梦想。可是，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地剥夺了。

“春梅的性格很内向，我们两姐妹谈心的时间不多。平时其他工友下班喜欢逛街、唱歌消遣，而她都是留在宿舍内看书，有时会到我家玩玩，人也比较俭朴，很少买漂亮的衣服。

“我突然想起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中幸存的女工小英，10年后记者访问她时，她说：‘工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可以随便掐死。’

“那时我一片茫然，打电话告诉父亲说‘妹妹死了’，然后就说不下去了。后来春梅的工友跟父母说了春梅的事，第二天父亲就赶到了深圳。

“父亲赶来深圳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老板娘盛气凌人，我们质问她为什么要工人加班那么长时间，导致春梅过劳而死，她坚决否认，还凶巴巴地威胁说要干掉我爸爸，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向你们求助！”

### 院方：急病致死，并非工伤

当春梅的父亲赶到医院时，院方已经开出了“非工伤死亡”的证明，说春梅是急病致死，但又没有说明是什么急病。由于该证明是由院方发出的，家属再多付2000元才可要求派出所再次验尸。

“我们都是来自穷困山区的农村人，哪里来的2000元？况且春梅的尸体停在殡仪馆内，每天收费就要100元，我们哪有那么多钱？”一家人显得非常无奈。他们去了松岗劳动站投诉，负责的人二话没说，就代替厂方提出20000元的赔偿。一条人命居然只值20000元！

“我们曾去市劳动局投诉，他们说根据目前的《劳动法》



及有关的工伤法律，没有任何有关过劳死的个案，没有办法为我们出头。”

虽然《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天加班不能超过3小时，每月加班最多不能超过36小时。但实际上，企业往往自行做主，《劳动法》如同虚设，厂方根本不在乎工人的生命。

从农村出来的父亲在承受丧女之痛的同时奔走各方，受到的却是无情的漠视，这令他显得更加憔悴。我们还深刻地记得这一幕：

空旷的工业区矗立着许多灰白的厂房，隆隆的机器声旁是年轻人为之付出青春和生命的流水线，使深秋显得格外凄凉和冷酷。那天，春梅的父亲在厂门外足足站了一上午，也没有见到工厂负责人。保安一直说老板不在，让他离开。将近中午，一辆黑色房车从外面进来，他们怀疑是厂长的车，就和其他老乡追上那辆车，要它停下来。终于，从里面出来了个男人，高昂着头，表情冷漠，把苦苦等了一上午的老人骂了一顿。

### 30000元一条人命

年迈的父亲每天奔波于厂方、政府部门和医院之间，但得到的却是除了冷漠还是冷漠，他实在没有信心支撑自己和老板打一场漫长的官司。

“我们都是农村人，连住在深圳的生活费都成问题，哪里有钱打官司？再说要打官司也不知怎样打，我们还能怎么办？”

是啊，一个在深圳没有任何人际关系背景的农村老人，哪有精力和金钱与老板斗下去？最终，他还是无奈地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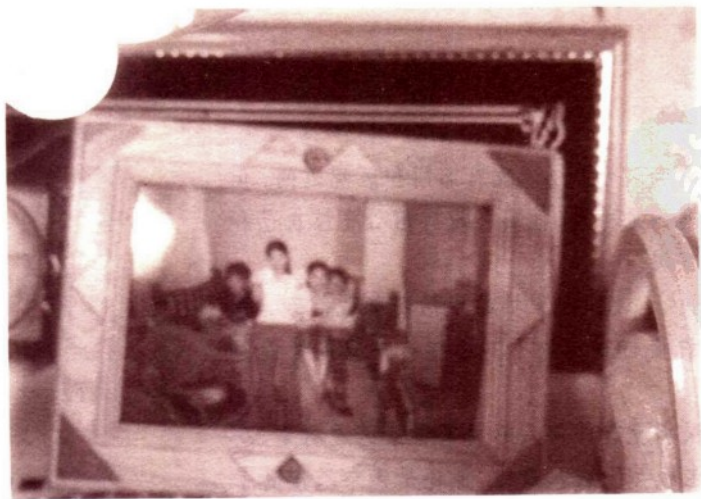
厂方30000元的赔偿。30000元一条人命！访问当天，父亲已经从殡仪馆领了春梅的尸体，准备火化。处理完春梅的后事之后，他们立即赶回老家，连工厂附近的出租屋都没敢回。

“我们担心那个老板娘会派人报复。”春梅的姐姐满脸忧虑地说。

随后我们又访问了同厂的其他工人，他们对春梅的死都感到很沉重。

“她平时身体健康，为什么会猝死？我们最近几个月都在加班赶工，每天由上午8点到下午6点，吃饭半小时，再加班到晚上11点，有时到12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天

床头小架子上摆放的照片，是想家时候的最好慰藉。



齊平如學  
PDG

天如此，没有周末休息，而且春梅还要在车间走来走去，她太需要休息了。她曾说过她受不了要回家，其他工人也挨不住了。”显然春梅的死与她过度劳累有关。

可是大家都默默忍受着这种超高强度的工作，没人出来反抗，原因就是“为了每个月三百多元的工资，没有办法”。工人不吭声，老板认为工人好欺负，就变本加厉，甚至是持续拖欠工资。工人们无法忍受了。今天是春梅，下一个不幸的人不知是谁？打工者的生命难道就这样不值钱吗？工人的沉默只会令厂方更加为所欲为。最后，春梅的工友去劳动局投诉，取回了她们应得的工资。她们都要回家，不想在深圳继续打工了，有人形容打工就像是一场噩梦。

## 后记

春梅的父亲在回家之前，告诉了我们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感受：

### 还我女儿一个公道

我是在今年11月11日接到深圳亲戚的电话，告诉我李春梅（女儿）死亡的消息。

这太突然了，女儿到深圳打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了呢？我心里非常难受，难以忍受失去女儿的悲痛。我匆忙地来到深圳想弄清女儿的死因，可万万没有想到，连看一眼女儿的尸体都不行。我找厂方负责人吴多琴询问女儿发病到死亡的经过，可她傲慢地说：“你女儿已经死了，原因和经过都不知道，要问你自己去找燕罗派出所。”我到了派出所，可那里的人告诉我：“你女儿不属于他杀或谋杀，与燕罗派出所无关。”这使我原本悲伤的心更蒙上一层阴

云，在我反复地请求下，厂方才答应验尸。可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厂方瞒着我私下弄了一个证明书。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女儿的死是有问题的。我多次找相关负责人，可他们互相推诿，不加理睬。我初来深圳，人生地不熟，但厂方连起码的吃住都不肯解决，自己身上的钱已经用光了，万般无奈之下再去找厂方，他们才给了一点生活费。

走投无路之下，我们想找劳动部门应该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可劳动部门说依据李春梅的死亡证明，只能按照非工伤死亡处理。我们要求厂方负责我们在深圳的费用以及李春梅在殡仪馆费用，可是厂方根本不予理睬。负责人吴多琴还说要找人打死我这个老头子，这更让我感到雪上加霜，受到了非常不公的对待。

李春梅是一个剪线工，每天劳动8小时只有10元钱，可是由于他们工厂人手不够，春梅就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每天在生产线上来回跑动14个小时以上，每月累计加班一百三十多个小时。由于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身体支持不住，在11月11日凌晨两点多发病。据工友们说，春梅发病时，负责人吴多琴根本不管春梅，只是睡觉。后来，李春梅病情加重，口吐鲜血，倒在地板上。直到这时，吴多琴也没有组织人员抢救春梅，而是让员工去叫春梅的姐姐和姐夫。春梅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葬送了，真是可悲啊！

我在这里没吃没住，只为给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劳动部门按非工伤死亡的处理我不服，我女儿的死完全是由于过度劳累而致，属于很严重的过劳死。我要求重新鉴定女儿的死因，给我女儿一个合理的判决，并要求厂方承担一切费用：火化费、停尸费、生活费、住宿费及误工费、抚恤金等（6万元以上）。强烈呼吁我们的政府早日制定过劳死的法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希望国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关心此事，同

时也希望老板不要再剥削工人了，工人只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不能出卖自己的生命，不要让第二个李春梅这样无辜的死去。多少钱也换不回一个年仅19岁女孩的生命，也不能减少亲人的无限哀思！

死者家属：李智明

2001年12月6日





争取中成长的女工

肆



扶子之手，与子携老。





工业区随处可见的成群宿舍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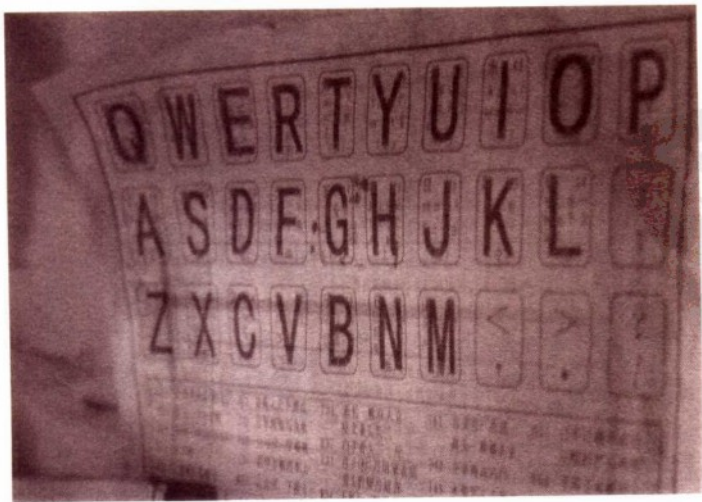


## I. 深圳只是我一个驿站

19岁的晴是第一个跟我说很想返回农村发展的打工姐妹。她从江西的家乡出来时带着美好的梦想，觉得外面是一片广阔的天空，然而，在广东两年多的打工磨练，使她感觉自己并不属于城市，城市不可能成为她永久的落脚点。

晴只有一个弟弟，弟弟自小住在外婆家中，她却一直跟母亲住在一起。在晴的眼里，母亲是个坚强而勤奋的女性，除了教书外，还要种水稻、带孩子、做鞭炮。村里的人也很敬重晴的母亲。晴曾告诉过我们：“我很敬佩母亲，她很坚

每天临睡前，都要默记一会儿的「电脑键盘」。



新子如  
舟  
PDG

强，她在乡村当小学老师，我很希望自己像她一样。”

## 出来打工

做教师的父母对晴的发展寄予了一定的期望，这给她带来了一些压力。

“他们没有明确表示要我必须考上大学或其他学校，但会经常说某家的孩子学习如何好，考上了什么学校，从而促使我向他们学习，也考上一所理想的学校。”

1996年，念完初中的晴遵从父母的安排报考了师范学校，但没有考取。虽然她很想当老师，却没有重考的打算，因为她觉得那样会给家里造成很大的负担。最后，她去了一所农业学校读书，并选修了电脑专业，主要学习一般文职工作常用的软件。她觉得学习电脑对将来的工作是很有用的。

1999年中，晴中专毕业了，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她也要进入社会工作。由于国家停止了工作分配制度，她要自己找工作。恰好东莞的劳务部门到江西招工，毕业生只要交500元的介绍费及办理外出打工的各种证件的费用，就可以去东莞工作。那时，只有17岁的晴很想出来闯一闯，父母也很支持她。

“我从小未离开过农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以想到外面去接触一些新东西，看看是否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父母也尊重我的决定。同去的还有其他相处了3年的中专同学，父母见我有这么多同伴，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那时候一起去东莞打工的同校毕业生有二十多个，主要是女孩子，只有四五个男孩。一群天真烂漫的年轻人上路了，虽然离乡背井、前途未定，但晴一点都不寂寞，也不害怕，她盼望着去接触这个不可预知的新世界。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她们到东莞的一家台资电子厂时已是中午，安排好行李后，她们就去工厂的招聘室填表。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有个人事部的职员对我们说：‘我们厂的工作很辛苦，需要站着干活，你们刚从学校毕业出来，能受得了吗？’我说看情况吧，受不了就向上司请假休息，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做下去，因为我会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对于刚进厂的农村姑娘来说，偌大的车间、工人宿舍、饭堂及工人休息打球的地方……一切都是新鲜的，组长给她们分配了厂牌、工作服和头巾。晴换上了蓝色的工作服，束起头发戴上头巾，成为了一名打工妹，开始了她的流水线生活。

#### 45 元的工资

晴被分配到生产电阻的生产线，工作前厂方对她们进行了技术培训。回想刚入厂的情况，她表示幸亏当时的组长耐心地教她们。

“电阻只有一个手指头那么大，由5个零件组合起来。刚接触那些零件时确实有些难度，有时记不住那么多的零件。好在组长耐心地教我们，我很快就适应了。”晴很快就适应了工位的要求，并且表现不错，成为了生产小组的组长，协助拉长分配工具零件等。

这家厂的工资很低，每人每天的工资为9元，即每个月底薪为270元，加班费每小时1.68元，另有70元的勤工奖和130元的生活津贴。厂方规定一般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星期日休息，因此，工人平均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四百元，加上加班费才能达到七百多元。

为了防止工人擅自离厂，工厂老板扣押工人的身份证及

一个月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这是违反《劳动法》的。“那时，我们是刚出来打工，根本不知道老板是不能扣押我们身份证的。”晴说。

在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晴竟然只有45元。

“我在厂里做了两个星期，虽然第一个星期是试用期，只有底薪没有加班费，但我也应该赚到225元。厂方说进厂要扣掉四百多元，第一个月先扣180元。那时，我不懂《劳动法》，觉得被扣也是理所当然。”虽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元，但毕竟是晴第一次靠自己赚回来的钱，她觉得自己不必再依靠父母了，所以非常高兴。发工资的当晚就和同学出外大吃了一顿。为了多给家里寄钱，她很节俭。很多农村女孩外出打工赚钱后会给自己买漂亮衣服和化妆品，而她只穿T恤衫、牛仔裤。工作3个月她就给家里寄了一千多元。

“我觉得自己亏欠家里太多。爸爸妈妈工资不高，要供我和弟弟读书，还要盖房子，家里欠了一些债。我上中专后，家里欠的钱更多了。所以，我有钱就寄回去。”

由于工作强度大、车间工作条件差、防护设施和用品缺乏，晴的很多同学做了3个月就走了。

### 累了，就躲在洗手间睡觉

进厂的第一个月，厂方没有为新工人定下生产指标，一个月后就下达了每小时做250个电阻的生产指标，3个月后的生产指标增至每小时450个。初入生产线的晴工作很努力，从不偷懒，开始的生产指标还应付得了，但3个月后晴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晚上10:30以后。实在太累时，她会和其他女工一样，躲在洗手间睡觉，一睡就是半个小时。

虽然偷着去睡觉，但女工们还是想方设法地完成生产指



标。另外，厂方对工人的控制非常严格。

“在产品方面绝对不能出错，一旦出错就要受纪律处分。尤其是开机出错，若是按错了就会造成系统错误，就要给警告处分，若是书面警告还要扣一天的工资。厂方每天都要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表扬表现出色的部门，批评表现差的部门，这就造成了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有利厂方对工人的控制。”

工人的宿舍就在工厂旁边，一个房间住16个女孩子，内有洗手间及冲凉间。厂方要求工人每天早上起床后，被子必须要整齐地折叠起来，鞋子不准乱放，否则就会在全厂通报批评。此外，工厂会给女工们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用品，但

寄钱回家的日子。



新学网  
PDG

限制女工外出。晴对此并没有不满。

“因为那里有很多同学，所以不觉得孤单，但整天呆在工厂里觉得很闷，觉得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没有机会认识东莞这个城市。我也想过报读自学课程班，边工作边学习，充实一下自己，但学费太高，一门课要几百元，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我就买些书自己看。”

得知在这家厂辞工的同学都有不错的出路，加上堂姐在另一家厂的加班费比较高，晴也想离开了。结果，在这家工厂做了5个月的她辞工了。

## 很累，想回家

拥有中专学历的晴希望找一份文职工作，但是她年纪小，又没有工作经验，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在东莞转了半个月也没有找到工作，晴有点沮丧了。“一向自信的我失去了所有的信心。在找工作的半个月里，我真正感到了自己的学历太低了。农村的女孩大多是初中毕业，我这个中专毕业生算是不错了，但出来后才发现远远不够。”

辞工后的一星期内要搬出工厂宿舍，晴只好住在老乡那里。由于没有暂住证，她整天提心吊胆，担心被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的人抓去。“由于没有暂住证，很害怕被人抓走，所以，我不敢在她那里住很久。她也担心我们被抓会给她带来不好的影响，虽然她没有直接地说要我搬走，却在某些话语中表现出来。当时真的觉得很累，身体累，精神更累。”

结果，晴在东莞待了半年就回家了。那时恰逢家中农忙插秧，她一回家就帮忙干农活、做手工鞭炮。父母照常上班，无聊时她就在房里看书，还经常和母亲谈心。“以前我从来不会跟妈妈谈心，可那次回家却不同了，只要妈妈一回家我

就跟她说话。她做饭，我就跟着去厨房和她说话。”

虽然有些无聊，但家毕竟是个温暖的地方，在家待了二十多天的晴还想在家多待一段日子。然而，父亲没有和她商量，就通过一个在工厂做主管的亲戚给她在深圳宝安安排了一份工作。晴知道家中仍然欠债，也明白父母的难处，她只能放下种种的不舍而再次出来打工。

### 再次出来打工

独自上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老





乡，晴战战兢兢的。

这次南下的过程并不顺利。那个老乡没有到约定的地点接她，她只能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在陌生的街道里乱撞，几经波折才到了那个老乡的家。

“当时觉得很累，就跟他说想冲个凉，他的态度非常不好。午饭后我准备睡觉，而他却说要出去玩。当时，我很累，心情也不好，所以不想去，而他凶巴巴的，好像我非去不可。后来，我就跟他们去了。”

晴想不到这个所谓的老乡对她如此冷漠，虽然是工厂的主管，却没有给她介绍工作，还冷言冷语地讽刺她。所以，晴在那里只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清早就走了。

晴先去西乡找堂姐，但堂姐所在的厂没有招工。后来，她找到了一家电子加工厂，每天工资只有9元，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百多元，加班费每小时才1.8元，每天加班三到五个小时，差不多要晚上十一点多下班，条件比原来那家电子厂还要差，到这家厂工作也是迫不得已。

这是一家只有二百多人的台资厂，晴在焊锡工位工作，管工对她们很严格，令她感到压力很大。

“焊锡的要求较高，不能假焊、漏焊，工厂的管理也很严格。对于一个刚进厂的人来说难免会生产出一些不良品，但管工不体谅这些，一出错就骂我，不仅骂我一个人，全拉人都被她骂。那时，我虽有所反抗，但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找到主管，要求他把我的工位调动一下。”

### 在高温的锡炉旁工作

晴的新工位是在锡炉旁。由于厂房内没有空气调节系统，因此车间很热，工人的作业环境很艰苦，时常有工人晕

倒在锡炉旁。后来，工人集体给老板写信，要求安装空调，老板没有答应。晴因受不了酷热而辞工了。

同年7月，晴去了深圳宝安的一家港资电子厂。该厂专门生产日本名牌的家用电器产品，有三千多工人，每月底薪300元，勤工奖40元，星期六、日加班费每小时3.7元。与以前的工厂相比，晴认为这家厂的工资和条件算是不错了，所以她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够长久地做下去，因为她厌倦了不停转厂的日子。



## 想不到遇上了工潮

她负责安装机板的工作，因为站着工作很累，所以女孩子昏倒在车间的现象很普遍。

做了半年左右，厂内传言厂房要迁往中山，订单也开始向中山转移。当时，厂方贴出通告：由于工厂效益不佳，因此取消年终奖及回家的车费。接近农历新年时，厂方又时常给工人放假。

“那段时间，有时天天赶货，有时天天坐在里面(车间)玩。大家都有点无奈，有些人提早离厂回家了，我也回家了。虽然厂方通知4月2日才回来上班，但我3月初就回来了。”

她返回工厂时仍然谣言满天飞，都说工厂会迁往中山。工人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厂方一直不肯向员工透露半句。

“没有不透风的墙。(厂方)切断了所有的电脑，每月的生产计划也没有了。于是，工人开始怠工，要求老板表态，到底是搬迁还是关厂。虽然谈判谈了3天，但老板一直都不肯表态，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只让我们尽快赶货。我们担心做完后还是没有答复，所以没有做那批货。”

很多工人都参与了那次怠工，虽然没有争取到老板的答复，但增强了工人争取权益的信心。

厂方要工人继续放假到4月底，期间只给平时工资的60%。晴不甘心就这样离厂，她要坚持到底，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一看资方如何对待工人。

## 厂门关闭了

4月25日清早，两千多工人打算回厂上班，却发现工厂大门紧闭，门外贴着这样一份通知：由于工厂订单减少，所

以工厂今天关闭。工人们非常愤怒，立即找当地劳动部门。当天中午，厂方再贴出另一份通知，包括以下3点：(1)所有工人的劳动合同在5月1日终止；(2)3月份工资在4月26-27日发放；(3)4月份的工资(只支付六成)及一个月待通知金在5月11-12日发放。

“当时我们觉得很愤怒，感觉老板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们。于是我们很多工人都堵在厂门外，也不让汽车进入工厂区内。”晴回忆着当时的情形。

结果，当天五百多名工人都走上街头，浩浩荡荡地走到区政府上访，要求政府部门介入处理。上访途中工人队伍被拦住，厂方管理层及区劳动部门的人员到场劝说工人回厂。当时，游行队伍中的一个男工跑出来自愿当工人代表，让工人离开。工人只有返回厂内，商讨下一步行动。当晚，工人们草拟了一封信并进行签名，要求厂方给工人发放经济补偿金。第二天早上，工人前往区政府要求处理未果，于是，再次堵塞在工厂门外，要求与厂方谈判。

“记得有位员工代表给我们开会时说：‘我们从4月25日到27日连续堵了几天公路也没有一点结果，今天(28日)是最关键的一天，因为5月1日政府机关会放假，再拖就不知拖到什么时候了。工人们从4月初工作到现在还没拿到工资，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权益是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争取!’”

工人们原以为假期完毕就可以继续上班，却没想到工厂会搬迁、关厂。晴也一样不甘心，所以一直积极地参与争取活动。在游行队伍中，晴很勇敢地站在队前。“游行时，女孩站在前面，因为公安不敢动手阻拦女孩，若是男孩带头，还没站出来就要被阻拦了。我们喊口号时很多人支持我们，也有很多人佩服我们。”

## 团结很重要

工潮过后，晴认识到工人的团结很重要，有组织地争取也很重要。

“这件事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特别是在去区政府的路上，被拦截的事激怒了我们，有的女孩甚至直接反抗说：‘你再不让我过去我就叫非礼！’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工人的团结很重要，有组织地争取也很重要。只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共同讨论，共同争取，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在这次工潮中，晴向政府人员据理力争。

“在走到区政府的路上，劳动局和区政府的职员跟我们讲法律，说我们上访不合法，请愿要提前申请。当天，有员工代表去区劳动局谈判，结果要工人5月1日后领取工资。我说5月1日我们的合同就到期了，厂都关门了，我们到哪里去领工资？于是，劳动局的人问我是不是员工代表，还说我不是代表他可以不跟我讲。他说我们不懂法，还有个女孩子被他说哭了，他分明是觉得我们没有发言权。”

我国《劳动法》规定：工厂关闭需给予工人的经济赔偿金，以年资的一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

最后，厂方答应在4月底给工人发放相当于《劳动法》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却不答应给予经济赔偿金，工人只有诉诸于劳动仲裁，继续争取自己的权益。

## 我想回家

工潮后的第二个月，晴在宝安西乡找到了一份印刷厂的工作，工资及待遇跟以前的工作差不多。她正考虑今年是否

回家。她告诉我：如果可以选择，她很想留在农村。深圳这个五光十色的城市对她并没有吸引力，她厌恶城市人的冷漠。

“城市人比较冷漠，观念里除了钱还是钱；而农村人比较淳朴，所以有很多农村人很难适应城市的环境。我想回家，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农村，为农村服务。农村人向往城市就是因为农村落后，所以我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把家乡建设好。在农村是很有发展，关键要看怎样去做。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要试一试。”

她觉得自己并不属于深圳，这里只是她人生的一个驿站。



## 2. 给工人装上一部电话机

20岁的中红是河南南阳人。1996年6月，和许多外出打工年轻的农村姑娘一样，她来到了深圳的一家现代化电子厂，成为了一名流水线上的女工。

南阳地处华北平原，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那里农民的生活并不算贫困，中红家的经济条件也算得上是中等水平。她只有一个弟弟，父母务农，种小麦、棉花和大豆等农产品，仅卖棉花的年收入就有10000元，此外，家里还养了几头猪。自她和弟弟一起出来打工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更好了。

对中红来讲，打工不是生活所迫，而是想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 选择去深圳打工

中红在乡下读书，小学时没什么压力，成绩还不错。由于是长女，当父母在农田干活时，她就承担一些家务；放学后，她还要到田里帮忙拔草，做些农活。即便如此，中红也不觉得辛苦。

“父母给我做的活都很简单，弟弟也要干活的，他负责放羊，那个活也不轻松，要跑来跑去地追羊。”中红微笑着回忆童年的琐事。

不过，中红不大喜欢农村的生活，觉得变化太少。也许“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中红很上进，这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中学毕业，对于当年的农村人来讲，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祖父年纪不大就猝然去世，十几岁的父亲作为长子，不得不承担起照顾家人的责任，于是，他辍学务农，成为了一名农民。父亲不想让女儿

和自己一样，所以鼓励她读书，并对她的期望很高。初中时，虽然从家到校只有半小时的单车路程，但父亲希望她多节省些时间来读书，就让中红寄宿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

也许是期望愈高，压力愈大，而且中红不习惯寄宿学校的生活，所以她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上学时是很苦的，早上6点上课，功课很多，有时要到晚上9点多才能完成，而且学校要求很严，考试不达标就罚钱，差几分罚几块。”中红说她小时候是很脆弱的，被罚款对自己的打击很大。中红中学时的生活并不愉快，她也不愿多谈。

初中毕业后，中红没有立即走进社会工作，而是和弟弟一起到南阳市学计算机。当时只有16岁的她，没有和父母商量，也没有考虑学计算机会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只是意识到要想在社会上立足，不懂计算机知识是不行的。

父母没有勉强中红继续升学，毕竟家里承担姐弟二人的学费比较吃力，所以也就同意了她的意见。

学了一年多的计算机，18岁的她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城里进入一家国营棉纺厂工作；二是去深圳打工。

“那时，我爸爸给我介绍了一家国营单位，我可以去那里工作的，保障还不错。但是，要先拿10000元买一个城市户口，相当于在企业里买一个工作。按当时厂里的规定，工作满3年后才能把钱退回来。当时父母要向别人借钱，可我不想他们花那么多钱，而且国企也正在改革，工人也要下岗的，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呢。”

当时父母还以为国企是铁饭碗，而在城镇生活了一年并对外界有了更多了解的中红却意识到国企并非保险柜，大量的靠下岗补贴生活的下岗工人生活得很艰苦。因此，中红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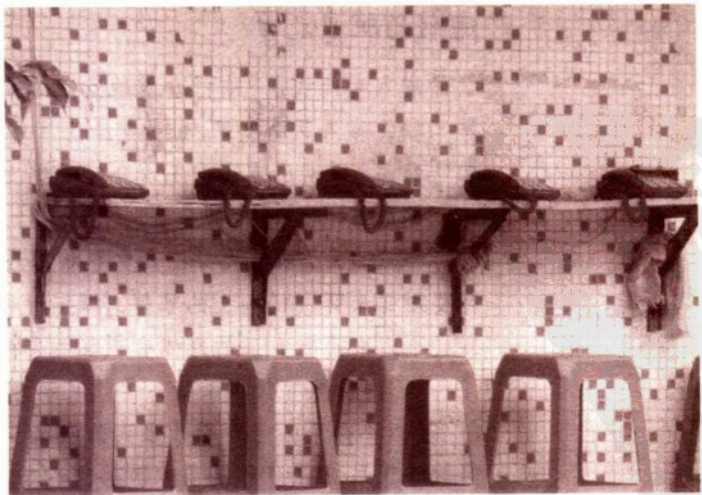


择了打工这条路。

恰在这时，深圳劳动局派人到河南南阳为一家名为亿仁的电子厂招40名合同工，中红听说深圳有很多发展的机会，便报了名。

### 通过考试 顺利进厂

“我很想出去，看看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父母很担心，不准我独自出来，好在那次是劳动局招工，很多同乡一起出来可以互相照应，他们才让我出来了。”



工人们上班的时候，电话也显得寂寞。

中红参加了劳动局的招工考试，考电子、数学、物理等知识，在应考的二百多人中，她很轻松地过关了。交了五百多元的介绍费和路费，中红背起行囊，告别父母，向着南方城市出发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波，中红来到了这家工厂。

她这样回忆进城的第一感受：“到了深圳的那天下午，天气很热，下车时我们全身是汗，又酸又臭，而且感觉自己很土，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路上的行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总的来说就像刘姥姥游大观园。”

到了工厂之后，她们先安顿行李，有两位职员检查她们的证件，再安排她们去考试，“因为产品要出口，所以我们要通过识别26个英文字母的考试，同行有3个女孩子没通过就得回去。还有面试，虽然有点紧张，不过也过关了。然后填表，交照片，领工作服……”

就这样，中红正式成为一名打工妹，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活。

### 遇到的职业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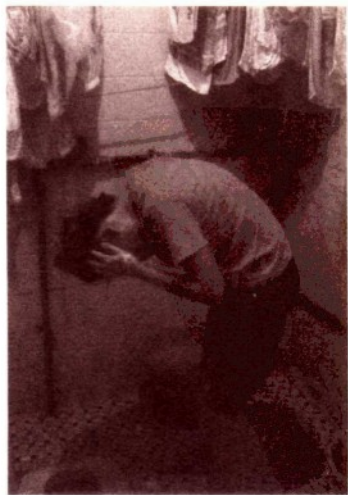
进入生产线前，中红和其他女工要接受厂方的培训，了解工厂的背景及制度等。由于电子工序中工人会不断地接触化学药品，所以厂方还向工人介绍一些安全知识，以及各种的职业危害(如对眼睛的危害)。

培训之后，中红被分配到做机板焊线的工位，这道工序需要用锡来焊实机板上的零件，焊接过程中锡释放出毒烟，挥发不出去，对女工的身体有很坏的影响。

“厂内虽然有排风系统，但效果不好，为了保护电子零件，老板不得不关上窗子开很大的空调，这却严重伤害了我们的呼吸系统。有时候喉咙很痛，烟味太重时连饭都吃不

下，有些女工甚至得了肺病。由于熟悉一种工位后生产效率很高，所以厂方不愿意给工人们换工位。那时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健康，可是却不敢要求厂方改善工作环境，有些女工实在受不了就辞工走了。我的一个好友去年7月才进厂，在焊锡工位上被烙铁烙得手指脱皮，不得已也离开了。”

女工们在清洗机板时常常使用三氯乙烯这种有毒的化学药品，她们往往因没戴手套接触机板而中毒。中红有时也要接触机板，她说工厂每星期发给工人一双手套，但手套质料很薄，根本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她自己就曾经因皮肤敏感而看过医生。



已经习惯了用这种姿势「洗头」。

工人

PDG

“我们曾和拉长说要老板多发手套，可她说这么小的问题，即使反映了老板也不会加手套的。我现在接触机板很小心的，一下班就赶紧洗手。”

工厂每月工资大约为七八百元，每天工作9小时，有时要加班，赶货时连续工作7天都不能休息。当别人轻松地欢度周末时，她们往往在生产线上加班。有些女孩子不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月经失调，在车间昏倒的情况很普遍。

### 管理人员的歧视

初到深圳的时候，中红只懂家乡话及普通话，听不懂白话（粤语），更不会说。然而，在南方城市，本地人的地位较外省人高，厂内的管理人员多是说白话的广东人，他们看不起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孩子。中红这样描述她们所受到的歧视：

“不会讲白话，会被他们瞧不起，他们喜欢讲白话，也习惯听白话，他跟我们说白话我们听不懂，他就要骂我们，虽然我们听不懂他骂什么，但看他的表情也知道又挨骂了。还是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好，知道后就更难过了。”

中红非常清楚，要想在深圳生存，不被别人看不起，就需要努力自修，于是她报了一个晚间大专的自学课程班，每星期有3个晚上上课，当轮晚班时她只能很快地赶回工厂。一向喜欢写作的她，选修了文学，学习古代文学和当代中国文学，也涉猎一些外国文学，她很希望能做些与文字有关的工作。

“我希望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自己喜欢做的同时也可以被别人肯定，流水线的工作实在没有意思，我们这样的劳动力对老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 宿舍一扇窗

几个月前，宿舍一扇窗的玻璃碎了，她便写信给宿舍管理处，要求重新装上玻璃。结果竟引来同室女工的不满，她们是担心被老板炒掉，但后来并没有什么人因为此事而丢掉工作。提起这件事，中红满腹委屈，眼睛也红了，明明是为了大家好，却被人家误会，她因为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而心里难过。

虽然那次争取对中红来说是个挫折，但并没有打击她为自己及姊妹争取权益的信心。数月后，中红再次发动其他打工姊妹，争取在宿舍内安装热水器及电话。

“工人下班后要提着水桶在楼下打水，然后提着热水上六七层的楼梯，又累又危险，有些女工就被热水烫伤了手脚。”于是，她与其他关心此事的女工，一起草拟了一封信给厂方，要求在每幢楼的每一层装上热水器，以此方便工人。

此外，宿舍没有电话，几千名工人只有到宿舍楼下的小店打电话，往往要排很长的队，若遇上过节，打电话就更困难了。

“说来真讽刺，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电话机，可是老板连给工人装一部电话也不愿意。”中红生气地说。

她同几个热心此事的女工共同草拟了一封信给厂方，再请其他工友签名，仅一个多星期就有五百多人签名，毕竟这反映了全体工人的要求，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只是以前没有人带头罢了。

对于女工的要求，厂方很快就给了回复，在宿舍每幢楼贴出通知，表示已了解工人的需要，愿意为工人装上热水器，但没有提安装电话一事。中红和其他女工很高兴厂方能够为她们安装热水器，于是再接再厉，再次去信要求安装电话。

一个黄昏，中红刚刚下班，突然被上司召见，要她见宿舍的管理员，其他一起联络签名的6名女工也去了那里。她们被教训了一顿。

“我觉得他根本不了解工人的生活，那些管理人员有手机用，我们这些低级的打工妹哪来买手机的钱？”

后来，厂方表示想要安装电话，工人必须答应几个条件：一是工人要管好自己，别弄坏电话；二是整个房间每月至少要打足一百元；三是全体室友要全部同意安装。

中红觉得这些难不倒她们。每晚下班后，她就和其他女工一起去其他宿舍，向女工解释安装电话的事，有些女工欣

画儿是我的作品，手机也是我的作品。



然签名，还帮忙劝说其他室友签名，不过，也有些人对中红的行动有所怀疑。

“有些人不理解，甚至误解我们，有人问我：‘你拿了张表格签名，是不是在搞传销？’我说没有，她说：‘那你这么那么卖力，是不是电话公司让你推销电话，你有钱拿才那样做？’我很生气，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我没有什么回报的……”中红对这些不理解很气愤，但她还是尽力解释。终于她们成功地找了一千多个女工签名。

可是，厂方并没有兑现承诺，还有传言说带头的工人是“搞事分子”，勒令部分女工代表退出争取行动。中红一直默默承受着这些压力，从不向别人透露半句。直到她们的行动被别人理解为另有目的时，她才不得和我们说出来。

中红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件事，一向坚强的她对厂方的冷淡态度也有点心灰意冷，幸亏后来有新的女工代表加入，她才稍感安慰，不至于孤军作战。

## 谁会知道我们的价值和贡献

经历了这次争取行动，中红深刻地体会到厂方与工人地位的不平等。

“老板赚很多钱，我们拿到的只是千万分之一。也许我们对社会也没有什么价值，当别人拿着电话机使用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争取使用电话的工人。我们这样的打工妹对老板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活的时候，老板就会把我们炒掉；当赶时间交货时，就请来一些临时工，交货完毕再炒掉。没有劳动合同，什么保障都没有。”

作为一个打工妹，她对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贡献充满怀疑。

“我是肯定自己的，我要活得有意义，我希望学到更多

的东西。但我们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似乎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什么价值，每天只是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每月发一点工资作一个回报……”

现在，她努力念书，她的梦想是写一些打工妹的文学作品，让其他人知道她们的价值和贡献。





### 3. 抗议中成长的秋月

“初中念书时读过一些马克思理论，老师讲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说到工人被残酷剥削。那时我都不懂，现在来到深圳打工，才逐渐明白资本家是如何压榨工人的。”

19岁的秋月是来自四川蓬溪县的农村女孩。初中一毕业她就来到了深圳，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打工仅一年多，她就遇上了生平第一次大型的工潮，这次工潮给她上了宝贵的一课。

蓄着短发的秋月是个喜欢思考问题的女孩，不少刚出来打工的农村女孩下班后喜欢逛街消费，她却喜欢跑到图书馆或文化中心看书。秋月说：很希望多学习一些知识，做个有用的人。

#### 9岁才开始上学

秋月出生在一个贫困山区，家中以务农为生，父母整天在田里干活。家中有3个孩子，她排行第二，哥哥比她大两岁，目前也在深圳打工，弟弟仍在上学，今年已升到镇里的重点中学，成绩还不错。

与其他农家孩子一样，父母在田里干活，一切家务、喂猪、照顾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秋月的身上。当时，她一边照顾只有几个月大的弟弟，一边上学，这对她来说是非常辛苦的。

“有时旷课七八天，老师就叫同村的同学带信给我，‘如果再去不上学，干脆就不用读书了’。后来我就没再去，而是留在家中一边干家务和农活，一边照顾弟弟。直到弟弟会走路了我才开始上学，那时我已经9岁了。”

秋月喜欢念书，学习成绩不错。初中时，她是班上的团支书，深得老师的喜欢。那时，她遇上了一个启蒙老师。那个老师教她人生哲理，让她多了解社会事物。20世纪90年代，当农村人对肥皂剧趋之若鹜之时，秋月却十分喜欢看新闻节目。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对新闻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她说：“我上初中之后就想多看些发生在社会上的事。”

秋月的学习成绩不错，完全有机会考上重点高中。可惜，家中的经济困难，爸爸对她讲了家中的难处，这使她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就放弃念书，把宝贵的念书机会让给了弟弟。那时，哥哥已出外打工一年多，同龄的女孩外出打工的也很普遍，所以，秋月也有了出外打工的心理准备。

对于父亲让她外出打工的提议，她没有反对。

“当时，很多同村的女孩子出去打工，出去前穿的衣服都不好看，打工回来穿的衣服却好漂亮，而且皮肤也白了，人也漂亮了，这对我真的有点诱惑哩！而且，我觉得人在家的变化不太大，见识的东西太少；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面的发展机会很多。”于是，在2001年，她跟堂姐一起来到深圳，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活。

### 初到深圳的遭遇

在盛夏的8月，秋月背着大包小包，跟着堂姐和堂姐夫，坐火车从四川奔向南方的城市。至今，秋月还清楚记得当时一路上的经历。

“从家坐汽车到重庆要一天，再坐火车到广州。从重庆买火车票到广州就用了3天，因为去广州的人很多，买票很难，最后，我们买的还是站票。上车后，给客运员塞了红包，每个人用90元才买到座位。坐了3天，真的很累呀！到深

圳时，我的两只眼睛已经深深地陷了下去，车上只有快餐面可以吃，又渴又累呀。”

到深圳的第一天，因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他们只有在电影院过夜。回忆在电影院过夜的情景，秋月还心有余悸：“那时好累，模模糊糊地看到画面上有一男一女没有穿衣服，做着一些亲热的动作，吓得我立即双手捂着脸，闭上眼睛，不敢看下去。第二天晚上很惨哩！因为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还要在电影院睡，结果我一直睡在堂姐的怀里，却不敢真正地睡着。”

不久，堂姐去了蛇口一家装手表的工厂打工，而秋月因



我们马上要开始工作啦！进车间之前，还不忘在窗口对着照相机留下美丽的笑脸。

为没有工作经验，未能入厂，只有暂住在堂姐的宿舍里。然而，其他女工并不欢迎这个新来的姑娘。“宿舍的水电费是按人头分摊的，我在那里住等于要她们多分摊水电费，所以她们都不喜欢我，如果被保安抓到要罚50元。我可每天都提心吊胆哩！”

### 成为一名电子厂的女工

半个月之后，秋月终于在西丽附近找到一家手表厂，进厂作了包装部的装表女工。当时，日薪才7元，另外伙食费补助5元，虽然工资不高，而她却非常满足，毕竟有了个落脚和赚钱的地方。不过，由于工厂没有订单，秋月只做了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再去找其他工作。

她去深圳某工业区的一家港资电子厂找工作，恰逢该厂招工，厂方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填一份表格就可以马上上班。该厂的工资是每天14.5元，每天工作9小时，同时，厂方要求工人起码要工作半年才能辞工。秋月觉得劳动条件还可以，于是就进厂工作了。想不到的是，在这家工厂所经历的一切，让她真实地感受资本家对打工者的种种苛刻与欺辱，同时，使她认识到只有以集体的力量争取，才能找回工人的尊严。

工厂属于一家在港有股票上市的工业集团，在东莞及深圳均设有厂房。其中，在深圳的厂子就有两千多工人，生产各类型的电子产品，如电话机、收音机、录影带等，产品均出口到美国的一些大型连锁店。

秋月工作在装配收音机的流水线上，其工作主要是用机器将两块板连在一起。

“在流水线上要不停手地做，一个小时要做两百多台。

我们经常从上班一刻不停地做到下班，到下班都堆机，我还记得我那时堆了两大箱哩。有时，拉长很凶，若做错了或坏机，就会被她骂几句。”

### 工资很低 加班不停

“这家工厂工作时间很长，每日加班至晚上10点到11点，一个月才有四五百元的工资，连续加班了几个月，‘五一’的时候仍要上班。”

秋月自言来深圳打工两年多了却没存多少钱。平时，她从不胡乱花钱，但深圳物价水平很高，一年下来储蓄的钱很少，一年才能给家里寄几百元。访问当天，秋月给我看了她父亲的来信，父亲诉说家中生活越来越艰难，抱怨女儿寄钱太少。

“他以为深圳打工的工资很高，遍地黄金，没有想到我这边生活也不容易。”她慨叹着父母不明白自己在外打工的难处。

据秋月讲，由于长时间加班，有些女工晕倒在车间。另一方面，该厂宿舍的条件十分艰苦，二十多个女工挤在一间房间，且没有卫生间，一层宿舍内二百多个女工要共享卫生间，走廊布满垃圾和蟑螂。秋月及其他女工曾经写信给厂方，要求改善宿舍环境和工作条件，但厂方没有回应。她还给劳动局写过信，于是，劳动局派人来厂调查，厂方让工人放假，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善，女工都感到很沮丧。

### 时常放假 工人不解

连续赶了几个月的订单后，2001年11月工厂的订单开始减少，工人被安排轮流休息，每周做3天休息4天，休息时间

没工资，而且还要扣房租水电费，工人生活大受影响。

“工人的工资很低，普工基本工资每个月才350元，拉长高一些，底薪加补助有700元，助拉有504元。”

后来工人听到传言，工厂会在2002年中搬去东莞，顿时厂内工人人心惶惶，但没有人要求厂方跟工人澄清事实。在此期间，管理层如管工、拉长都忍不住在车间交头接耳，讨论厂方的举动对他们的影响。

在工厂内，拉长、技工及管工的年资较长，一般在工厂工作已有四五年的时间，按现在的《劳动法》，若厂方搬厂，工人会取得一定的经济赔偿金，她们担心厂方利用放假的办



法逼迫工人自动离职离厂。所以，她们焦急地盘算着自己的利益，考虑要对厂方采取哪些行动。

11月13日，工厂某一层生产线仍然停产，于是，拉长及管工发动了该层的几百工人一起去劳动局投诉，要求劳动局介入处理工厂放假时工人的工资问题。秋月作为员工的一分子，听了这个消息顿感振奋。

过去，仅几个工人去劳动局投诉都得不到预想的效果；而这次，工人的力量集结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她了解一些《劳动法》的知识，还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其他工人。当晚，她兴奋地去了拉长的宿舍，希望了解明天到劳动局投诉的安排。

那天晚上，秋月回宿舍后草拟了一封员工致劳动部门的信，信中要求工人的工资必须符合最低工资的标准，厂方需要跟工人签劳动合同，在放假期间工人要享有生活费的补贴，改善宿舍的生活条件，如降低水电费等。对于她和其他女工来说，这些要求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厂方重视我们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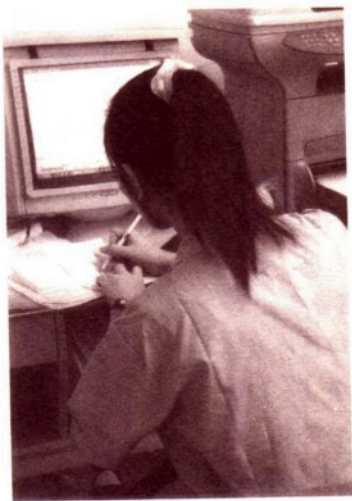
翌日清早六时多，秋月在宿舍动员女工一起去劳动部门。为了避免厂方的怀疑，她们先去附近的公园集合。秋月的心情很紧张，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真正跟厂方对抗。她很大声地念着那封信，其他女工一拥上前，毫不犹豫地信上签名，女工们踊跃签名的反应使她很受鼓舞。她还记得，9月份她和另一个女工给厂方写了一封要求厂方改善宿舍条件及工作条件的信，然而，签名时，其他女工的反应却很冷淡，这让她感到有点沮丧。“她们担心被炒，所以不敢签名。”秋月回忆着。所以，女工们这次热情的反应令她很受鼓舞。

“那时有几百工人在劳动局门外的草地聚集，我们筹备

路费和联络电话费，大家都分好工，有6个工人代表进到区劳动局，另有8个人到市劳动局投诉，有一人发电子邮件到香港总公司，两个负责联络记者，其他员工都集合在劳动局门口等消息。”秋月和其他7个工人(主要是拉长、技工及领班等管理人员)作为员工代表进了劳动局。当时，劳动局的官员被庞大的人群所震惊，找了大批公安劝工人离开。

“那些公安要求我们返回工厂，我们说大家会很安静地等待结果。”对于公安，工人们并不害怕，后来劳动局官员向工人代表保证当天会去工厂调查，便尽早疏散了工人。当日上午，劳动局的官员到了工厂调查，厂长坐着偌大豪华的

打工也要「充电」。





房车赶来了，一下车就开始责骂工人。

秋月清楚记得当日的情况：“他只是凶巴巴地问我们干吗，集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全体员工都愤怒地伸长脖子跟他吵，说工资、宿舍问题。最后厂长说不上班给每个员工5元的生活补助，但我们没有理他，我们还要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其实，他只是想打发我们走，以为我们没上班就没工资，给5元钱就可以让我们走开。但是，我们要求的不仅是这一点，那么多的条件，他一条也没有答应。”厂长争论不过工人，竟找来工业村内的保安来驱赶她们。

“全场人都呆在那里，后来治安办的人叫我们解散，我就上前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只等几个人，你们治安办的人只知道管工业村的所谓治安，你们有没有去管工人宿舍的治安？里面的环境那么差、工资那么低！’说完，我就拉其他人快点离开原地，管他在后面做什么！”

那时，秋月并不害怕，她知道必须跟厂方展开斗争才行。她和其他女工聚集在厂门外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午，劳动局的人什么结果都没有就要离开，工人们要求劳动局的人至少找工厂的香港总经理回来跟工人谈判。随之，厂里贴出通知：“在放假期间厂方每人每天补5元生活费”。

从早上等到下午5时，连早餐和午饭都没有吃的秋月和工人们一直等待着香港总经理的回来。她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厂方和工人的利益矛盾是如此突出。

当日下午四时多，香港总经理才回厂与工人谈判。工人们没有组织工潮的经验，当时虽然推选了7个工人代表，但还有工人也要跟老板对话，于是，另外十多人（主要是修理部的男工及拉长）也一下子挤进了办公室。

由于代表与中途挤入的十多人没有默契，更没有谈判的

策略，都不知如何开口提具体要求，甚至没有一个谈判底线。

“谈判时一阵沉默，大家都不知道怎样说。那个香港老板就问什么事搞得那么大，就因他的这一句话，我们都好愤怒，就说没有工资没有饭吃。”于是，工人跟厂方吵起来。秋月把投诉信给了老板，但老板没有立即回应。当日，劳动局要求厂方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要求工人签授权书授权代表跟厂方谈判，并安排在第二天早上继续谈判。

虽然第一天未有即时的成果，但工人的力量迫使厂方不得不面对她们，这一切使秋月感到很兴奋。

“觉得成功了一小步，有机会了，（厂方）必须到的人都到了。她们（工友们）都很高兴，都在那里鼓掌，为我们鼓掌。”

第一次见老板时，秋月感觉相当平静。

“我觉得他一点也不紧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还在那里挺悠闲地喝水。”老板毕竟是生意人，他是不会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在脸上的。

不过，她觉得工人代表应该用普通话来跟女工沟通，而不是广东话。“代表用广东话讲话时，很多人都听不懂，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我只好非常努力去听，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据秋月讲，在工厂里，一般的技术工、拉长多是从广东省其他地方来的，他们虽然懂普通话，但平日也多用广东话。语言上的差异使广东人与外省女工、工人代表与工人以及秋月与其他工人代表之间产生了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张。

当天晚上，工人代表草拟了一封信件，要求厂方要按《劳动法》的规定与工人签订合同，付给工人在停工期间的工资以及改善宿舍条件。凌晨12时发给宿舍内的工人签名，很快就得到工人积极地响应。

## 争取工人支持，平静面对资方

第二天清早，秋月在宿舍动员其他女工到厂门外集合，显示工人实力的时刻到了。她很认真地跟每一个女工沟通。

“我跟她们说明了写在授权书的那几条，她们不懂的地方，我就跟她们解释。关于劳动合同的内容，我也一条条跟她们说，要她们理解。后来我走上台讲了开会的内容和社会保险，还要她们每个人都要支持我们。我说：‘你们不要轻易解散，不要擅自离开，一直要站在门口等，人事部的人很注重下面的人对我们的支持。希望你们为我们加油。’她们的支持是重要的。”有了第一天在公园带领群众的经验，秋月站在台上说话并不紧张，内心反而很平静。

“我觉得那些姐妹给了我很多支持，我的信心也多了很多，她们在下面看我们在上面谈判，我觉得她们很热情，很愿意，也很高兴。”对秋月来说，工人支持代表谈判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早上，数百名工人在工厂门外列队欢迎代表进入办公室跟厂方谈判。在谈判桌上，对于员工提出改善宿舍条件（如加垃圾桶、热水器等）、降低宿舍的水电收费及补回加班费等，厂方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时，厂方亦答应所有员工的底薪以最低工资计算。但是，加班费只肯追补至同年的10月份，而10月份以前的不予补偿。拉长及技术工的底薪原本已达到最低工资的要求，因此，他们觉得给工人争取回来的条件比她们的还好，所以不答应厂方。后来，厂方态度强硬，说工人代表不答应就终止谈判。无奈之下，代表们只好与厂方签协定。当时很多代表心急地签协定，而秋月却犹豫起来。

“第一次见到他们答应了，我觉得有诈，不会那么顺利

吧！我好想拖延时间，要他们多说一点，看他们心里搞什么鬼，我迟迟不签，他们也不签。代表走过来向我解释，我和他们之间不能互相理解，我是个外人，他们懂，我不懂。我只想将时间拖得长一点。最后，在协定内写上‘不得对员工有报复行为’后，我才签了。”

### 内部矛盾突起

虽然劳资双方签了协定，但工人对于厂方还是半信半疑。不久，厂方按劳动局的要求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可合同的期限只有半年，有效期为由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



忙里偷闲——读书的快乐。

静  
子  
知  
学  
PDG

若厂方搬厂去东莞，那时工人的劳动合同业已终止，资方更无须给工人支付任何的经济赔偿；与此同时，厂方已开始解雇一些年资较短的工人，有三十多名员工被无理辞退。秋月及其他代表见厂方如此狡猾，必须商量下一步行动才行。可是，在这期间代表之间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

“拉长们因为年资长，一心想尽快拿回以前的年资和补偿金离厂，并不想继续在这家工厂工作。所以，他们要厂方先为工人办好社会保险，再签合同；若不答应就不签合同。但我觉得应该跟老板谈判，要求延长合同期。”工人代表中的拉长也逐渐排斥秋月，也不再找她开会。



不久，工人代表找律师咨询，问律师工人因厂方没有活儿做而放假可否告上法院要求厂方给予工人经济补偿金？律师表示过去有过成功的经验。工人代表最关心的只是经济补偿金。据秋月讲：“厂内工人的年资参差不齐，很多姊妹只有一两年的年资，她们关心的是工作能不能做下去和有没有最低工资，而不是离厂。”

咨询律师后，工人代表决定向员工收取每人100元的律师费（若年资两年以上的律师费用更高），并让工人自动与资方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律师身上。

得知代表有这样的决定后，秋月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让工人自动辞职，我们对资方还有谈判力量吗？打工的姊妹多是住在外省，若解除劳动关系，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工人也就分散了，那时还可召集到工人吗？他们（拉长）多住在广东，他们从家乡回到这里比较容易，我们外省的老远跑来，如何生活？很多姊妹心里都没了主意，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大家的心态是这样的，看大多数人如何走自己就如何走。”

后来，工人代表找律师的事情暂时搁置了一边，那时已经是12月初了。

经过那次事件后，秋月好不容易地重返工人代表的位置。

虽然秋月很主动地找工人代表们商量每一步的行动，但她与工人代表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大家的行动没有一点默契。11月底工人领了当月的工资，厂方已按协定支付了最低工资；由于厂内的订单渐少，于是拉长们又动员员工到市政府及市劳动部门投诉。作为工人代表的秋月，事前竟对此毫不知情。

“我真的很生气！为什么他们总是排斥我？”我还记得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她很委屈地跑来中心，我们鼓励她要勇敢去面对，重要的是她是来自流水线的女工，拉长争取的东西仍要依赖基层工人的支持。

### 想去上访 却遭制止

后来，她得知在拉长部署时行动就被制止了。凌晨2时多，7辆车驶入工人宿舍区，人员直接进了男宿舍，警告他们不得喊口号及拉布条，不得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等。次日清早，工人欲去市政府上访时，劳动局及市政府代表已在门口等待，劝工人们到外面等候，他们与工人代表一起开会。

下了一夜细雨的深圳已有几分寒意，八百多名员工打着伞焦急地在厂外的空地等待。经过谈判，资方答应为员工在一个月內补办社会保险，同时，补回9月份的工资及加班费。协定签订不久后，厂方就向工人发出通知：“现时愿意离职的员工可以按其年资获取经济补偿金，一年一个月工资为基准。”

“这分明是厂方不想给工人办社会保险的做法。”秋月再次感到了厂方的狡猾，可惜她难以力挽狂澜。早有离心的工人代表和拉长们带头离厂，其他女工对合法权益的争取没了信心，也纷纷离厂。总之，工人还没拿回社会保险就全部自动离职了。

当时的她很沮丧：“在工潮争取的中期我差不多要放弃了，一方面是拉长排斥我，其他女工因为见资方答应改善宿舍条件，却迟迟未见改善，也责怪我。我感到压力很大，她们没有直接跟我说不满，但经过我房门外就大声说，为什么宿舍还是那样子。我听了就好难过，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其他姊妹不体谅我？那时候我每天睡得很少，时常辗转在床

上睡不着。”

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午饭时她在宿舍召集其他姊妹，向她们解释需要给厂方一点时间来改善宿舍条件，并要求姊妹们为了自己的权益也要出一分力。经过了那次会议，姊妹们没有再抱怨秋月。这使秋月认识到只有行动，情况才有改变。

### 对失败的反省

经历过这次工潮，秋月认识到此次的失败除了劳资矛盾外，还有工人之间的分化，厂方恰恰利用这种分化击败了工潮。“工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有自己的主意，不应只是看大群人的意见，很多姐妹在事件中自己逃避了，不清楚自己想怎样，就跟大群人的形势。我们外省的跟她们（拉长）广东的不一样，为什么要跟着她们？”

秋月没有被这次事件击退，反而更有动力掌握《劳动法》以维护工人的权利及尊严。离开这家工厂不久，她入了另一家电子厂，她希望，自己与其他打工的姊妹关系要密切些。

### 对社会的反省

经过这次工潮，秋月想起了以前政治课中讲的资本主义社会。“真的很像。我们进厂后老板剥削剩余价值，而我们仅能获得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我觉得在外面打工像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秋月认为工人团结是很重要的。“我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其他女工，那就是要多替她们着想，站在她们的立场去做事，获取她们的信任。这次工潮也让我认识了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他们(官员)只想快点解决事情，只要劳资同意，不管公平不公平，事情过了就可以了。他们并没有站在打工者



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秋月还认为社会没有重视打工妹的地位。“我们从农村跑到城市找生活，但城市容不下我们。”她希望自己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秋月说，家乡很穷，父母希望她挣了钱就回家建房子，然后嫁人。可她却不想这样生活。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在穷困的农村里，她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去种田的情景：“家乡是山区，田都是在山上，石阶很高，一级一级地爬上去。家里种小麦，我就要背起那个满载肥料的木桶上山去，爸爸也挑起猪粪上山，我俩要一阶一阶地爬上去。那时看见爸爸背上的汗，我就想哭，虽然我背上的也很重。”她希望家乡的生活环境能得以改善。

去年底，秋月回家一次，她说：“家里的情况与我两年前走的时候相比，没有一点改变，只是村里种田的农家人少了，乡间的空房屋多了。有劳动能力的农民都跑到外地打工去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小孩，整个农村毫无生气。”



#### 4. 站在反抗线上的女工

伟珍，河南濮阳人，1979年出生。她在深圳南山区工作快五年了，别人都会叫她“大孩子”，因为她披着一头长发，秀气的脸庞总挂着天真烂漫的笑容。

她一家6口，包括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和嫂嫂，伟珍排行最小。姐姐在县城打工，很少在家。哥哥毕业后几经周折当上了厨师。“每年欢度春节，哥哥都乐意下厨做饭。一家聚在一起团圆时我倍感开心。”

她的家乡地处平原，适宜种植大豆和花生、还有水果。



团结就是力量。

种田收入毕竟有限，家乡的经济条件一般。1996年，刚读完初中的她跟随表姐，如同众多的农民工一样来遥远的广东追寻美好的梦想。

## 无忧无虑的童年

伟珍开朗健谈，主动为我们介绍河南家乡的环境。

“家里经济情况一般，不是很富裕，也不是很贫穷。还可以吧！爸爸替别人盖房子，是一名包工头，经常因工程的缘故而出门儿，留在家里的时间很少。于是，干农活的担子就落在了妈妈的身上。妈妈很疼子女，极少要我们种田，而我也很不喜欢做农活，只在放学后做一点点。怎么说呢？若是冬天还好，夏天就不行了。太阳很大很热，弯着腰下田拔草、割麦子等农活都十分辛苦。我心想，如果我们有钱买割麦机就好了，能省人力，方便快捷。唉，可惜没有钱买。另外，天旱时，庄稼枯干，没有雨水，一点都没有。务农的，只能企盼天公作美。”

为了增加一点点收入，一到农闲妈妈就在家附近打理小吃店。

“当我还未外出打工时，我经常在店内帮忙，是妈妈的得力助手呢！”她满脸得意地忆述童年时光。

伟珍比较幸运，父母并没有因重男轻女而不让她读书，倒是伟珍自己选择了停学。“我不能责怪任何人，爸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读书，只是自己非常贪玩，尤其中学阶段，十分喜欢打球，再加上课程比以前深很多，我的成绩日见退步，于是不想读书，最后就放弃了。现在后悔已晚，都怨自己当初没好好念书，如今跑到社会做事才深感知识太少。”

## 打工之路的开始

对十多岁的少女来说，自己的前途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伟珍坦然地说：“初中毕业之后，一时间自己也不知道该选择做什么。过去，我与村里的女孩子玩玩，轻轻松松地就过了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我年纪小的仍在读书，而比我年长的已经出嫁，身旁的玩伴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了。那时，我躲在家里，用小麦杆子编织草帽，一天只能挣到三四元，很辛苦。后来亲戚介绍我去学做蛋糕、制饼干、烘瓜子等等，那里每月工资一百多元，包吃包住。做满一年后，

朋友来访，只能坐在床上说话。



新学如学  
PDG

我发现在家里既挣不到钱又学不到技术，所以决定到外面闯一闯，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锻炼自己，独立生活。”

爸妈极力反对，大概是因为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她性格倔强，非要外出不可。“从小爸妈对我宠爱有加，百般呵护。爸爸听说我一定要去深圳闯天下，简直发疯了，极力阻止。说到底，他是为我着想，为我担忧，这点我是知道的。可是，不出去我不甘心。经过我多次劝说，尽力争取，他们才勉强让我去。”

于是，伟珍跟随表姐来到了深圳。

“初到深圳，我很不习惯，水土不服。表姐比我更严重，整天不吃米饭，没多久就决定回乡。这也不能怪她，我们北方人日常吃面条、包子、饺子等，其他的不大喜欢。在工厂宿舍里，我整天吃方便面，没想到牙齿逐渐变坏。看！我有两颗大牙给虫子蛀光了，留下黑洞！我刚从家乡出来时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我牙痛得实在要命，吃东西很困难，很痛苦。若是在家里，妈妈会细心照顾我，一旦在外，谁又会照顾我呢？有的工友很好，告诉我治疗法，但要她们时刻照料是不可能的。前天我患上感冒，自己拖着无力的身体去门诊部，打了一针，很累。”

在同乡的介绍下，伟珍进了一家工厂，但这份工作却令她差点中毒。

伟珍带点激动地回忆当时情景：“我负责贴胶纸的工序，怎知胶纸的毒性很大，我的皮肤出现过敏症状，双手和全身长满了小小的水泡，又疼又痒，其他工人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慌乱地去医院打了一吊针，花了足足八十多元，但情况竟没半点改善。后来，我倒是听了一些过来人的指点，用盐水清洗患处，伤口才慢慢治愈。唉，出来打工，一共带了

八百多元，医药费就花了十分之一，再加上各方面必要的开支，真是应付不了了。无奈之下，我向家人多要了500元救急。直到今天，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呢！”

不久，她又进了一家制造音箱的七八百人的电子厂，一做就是两年多。她没想到自己在这家工厂经历了一场工潮，更没想到自己还走上了行动的前线。

### 厂外集会，反抗女主管

伟珍在厂里做装配工人，最初是在流水线工作。除了不停地超时加班工作外，还要受主管的责骂。

“她以前也是与我们一个车间的，以前管一条生产线，后来她管整个车间的两条生产线。因为她的管理方法不对，以权压人，很刻薄，我们都不愿让她做主管，所以我们投诉她，想把她炒掉或调走。我们几个员工闯进生产办公室去讲理，但经理态度很恶劣，瞪着眼，讲话也很没水平，凶巴巴地说他是皇帝，我们没资格与他讲条件。我们说，我们打工的是来厂做事的，是有头有脑的有思想的，并不是天天被骂的。”但是，跟经理反映后没有任何回应，结果，伟珍想出了以怠工的方法来反抗那个主管。

“因为我们那条线是第一道工序，也就是插件，第二条线是执锡，第三条线是组装，若是我们有半天或一天不上班，工厂就不能生产了，因此，厂方对我们插件线比较重视。我们这条线有几十个人，人也比较齐心，我在线上是坐的第一个工位的。大家一传一，吃完饭就已经商量好，如果不加班就全都不加班。我们就是晚上怠工，白天不会的。”

当时没有什么怠工经验的她，召集了同一生产线的女工聚集在厂外的草地上讨论怠工的问题。据她讲，那时没有很

多人参加，有些女工在犹豫之际被厂方的管理人员发现，以为她们是带头怠工的。结果怠工的人没被炒，没怠工的人反而被炒了。

“是啊！但她们也没办法，只不过是员工。我想，他们不敢炒我们这些带头怠工的，因为他们也有点怕。想我们几十个员工也不简单，竟然能把一个主管搞垮，若是炒了我们的话，他们会怕我们会用另一种手段来对待他们。”

由于工友的坚持，那位女主管后来就辞职了。

那么，这次经验对于伟珍有什么意义呢？

“我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胆量也大了。即使现在单独一人去办公室反映意见，我也不会感到害怕。实话实说，不平则鸣。同时，在工人集体争取方面，沟通是很重要的，说服大家行动一致，才会得到胜利。”

后来，她面对的是工厂搬迁的问题。这一次，她们又采取了怠工行动了。

## 再次行动，反对工厂搬迁

厂方在原区的租用合同期满，打算搬厂到关外，而老板亦将股权卖给另一个台湾商人，可是他竟是连机器及工人也一起卖掉。厂内多是熟手工人，他们都不愿意去关外。

“关外比这儿治安乱呢！再说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就不想过去。那时辞工也辞不掉，因为我们都是老工人，都是熟手了。老板想把这些人全带到关外去，不想过去后再招工，那样做还要培训，生产也慢嘛。厂方还告诉我们，到关外去的工人会增加工资，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都不想去关外，于是，大家行动了，全层怠工，不去上班。因为一楼有3条线，插件、执锡和组装，我们是第一道工序——插件，若

是我们‘插件’不上班，后两条线就没事做，所以大家商量好，集体怠工。我们是晚上怠工，白天正常上班，因为晚上是加班，工人有不加班的权力，若白天不上班的话，就会算我们旷工，要按旷工处理。”

工人们连续3天采取了怠工方式，要求厂方不要逼迫工人去关外。那时，她们的行动也鼓励了其他楼层的工人加入了怠工行列，一起要求厂方给予工人搬厂赔偿。

“若是厂方一夜之间把东西全搬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开始就是一天搬一点，后来几天把流水线拆了，模具之类的也搬走了。当时我们真的好担心呀！若厂方很快搬

结伴而行。



新学如学  
PDG



完的话，我们的工资就拿不到了，到头来受伤害的是我们这些员工啊！怠工是不行了，那我们就去劳动局告。”

### 去劳动局投诉

“当时厂方搬厂到关外的公明镇某村，并且逼迫员工，不想搬也得搬。厂方说，关外开发了一个新的工业区，有很多厂房，都是一流的，好像是想把我们骗过去。一部分还是搬去了，而我不想去，因为关外太偏僻了，治安也不好。整个厂的四五百人，只有二百左右过去了。”伟珍回忆着。

由于工人不想跟厂方去关外，厂方不但不给工人发工资，还强迫工人一起过去。伟珍为我们讲述了有些女工被厂方保安强行送上车的情景：

“那经理好过分的，强迫人去，好像抓犯人一样，人不走就把她的行李拿上车了，不走也没办法。因为我们都是老工人，都是熟手，我们不去他们就得培训新员工，就会影响到生产的，生产率就不高了。”

由于不想去关外的工厂，她们开始辞工，但厂里不允许辞工，非要她们一起搬到关外去，否则就不给工资。她们没办法了，又不忍自己的血汗钱白白丢掉，于是，他们给劳动局送去了投诉信，并且亲自去了劳动局投诉。但是，恃势凌人的厂方，公然违反《劳动法》。

“劳动局管事的那个人说你们是××厂的吧？不用看资料了，你们走吧。她好像对我们厂的情况很熟悉。只是说‘明天我们给你们个答复’。我们肯定要说得可怜一点，否则她不会相信我们的。当时，我们个个毫无笑容，可怜巴巴地向她苦诉。我们很坚决地说我们没饭吃，睡在大街上。她很同情我们地说：‘好吧，你们先回去，我们会尽快帮你们解决

的。’果然，第二天就有了音讯，人事部接到电话并开始给我们结算了工资。”

工人并没有被有权势的厂方所吓怕，她们后来去了市劳动局及区政府，甚至找到了媒体，如《羊城晚报》等。

### 工人互选代表，集体争取辞工权利

提起第二次去劳动局的经验，伟珍还记得当时的心情：

“我们一大群人，几人一组，分头出发。一组去区劳动局，一组去市劳动局，一组去区政府，还有一组去了特区报。我还是个代表呢！那时我们选了3个代表，我们去劳动局

属于我的荣誉。



属于我的荣誉  
PDG

时，由于人多就只让我们3个代表进去了。劳动局的职员问我们这么多人来干吗，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事。当时不是很怕，唉！怕也没办法，就是怕，也要装出不怕的样子，为了争取权益，自己为自己打气吧。

“我们告都告了，还怕什么呀！如果怕就不敢去告了。当时我们进去后，他们让我们每人印厂证，我们就各自复印了一份；他们又说人太多，只让几个代表进去；最后才问我们为什么要告厂方。了解了原因后，他们的答复是‘明早去厂或打电话到厂’。第二天早上有消息传出，据说是劳动局的人来厂里调查了。厂里的管理人员很聪明，居然给我们发了辞工书。有的人很容易满足，感觉能拿到了辞工书已经够好了，总比自动离开好得多。其实，我们如果不接受辞工书不仅可以拿到工资，还可以拿到赔偿金，比如，干一年就有一个月的赔偿金。”

工人收到辞工书已经很满足了，而没有细加考虑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哪里知道，拿了辞工书就表示自愿离开，只能拿回工资，而得不到赔偿金。伟珍那时在该厂工作3年了，她一样没有领取到任何赔偿金。事后，伟珍和其他工人都后悔不及。

当时大部分工人都没有争取权益的经验，但由于伟珍来深圳后接触过一些讲解《劳动法》的中心，所以在那次事件中她被推选为3位代表中的一位。

她回忆说：“压力是有的。去（劳动局）之前只想了几点，比如该怎么面对劳动局的人，怎么对他们讲话，怕说错什么，不能面带笑容，要保持严肃等等。不过我一点都不怕，还是我第一个进去的呢。我觉得，反正不打算做了，既然参加了这件事就干到底吧。”

对于争取自己和其他工人的权益，伟珍还是很清楚的：“若是不去投诉的话，我们的工资就会白白地丢掉了。”

经历那次事件之后，她认为自己的胆子更大了。她回忆，以前在流水线上工作时经常挨骂，有时候明明没做错什么事却成了那些管理人员发脾气的对象，挨了骂也只有忍气吞声。现在，她懂得了工人也有自尊和权益，也懂得用《劳动法》去保护自己。她认为，自己的工资虽然不高，但那是她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分钱也不愿意丢掉。

拿到工资的当天工人们就被赶出了宿舍，大家只能各奔前途了。伟珍运气还算好一点，8月离开该厂，第二天就进了另一家工厂。

### 换厂工作，弱小的她已无力反抗

“我清楚记得那天是8月17日，瞥见信息栏上电子厂的招工告示，我和一位工友立即去了那家工厂。我俩曾听过该厂许多负面的传言，如没有固定的发工资日期、待遇欠佳等。但天天招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我想总得找个地方落脚，没地方住是很麻烦的。若情况真的恶劣，日后可以‘跳槽’。踏进工厂大门时，很大的厂房出现在我面前，当时觉得这家厂具有很大规模，一线希望油然而生。”

由于伟珍有电子厂的工作经验，能很自如地说出了电子组件的名称，所以很容易就进了这家工厂。

“人事部通知我们两人第二天上班，主管除了说明工时规定外，并没交待工资多少，也没留时间给我们询问。那时我也不敢多问，先进厂再说。”

伟珍负责插件的工序，后来她才得知，跟厂方签的劳动

合同只有当时的最低工资 574 元，厂方从工资中扣减住宿、水、电项目后，工人每月只能得到三百多元。

在两千多人的流水线上，工人像是一部生产机器。

“在这个厂，我真正体会到了打工的苦味，觉得疲惫不堪。第一，插件的位置极其难找。我们生产轻巧型手提电话，机板细小，要迅速在板面插上六七个组件，我很紧张，上班时不敢讲话；第二，生产线的速度快得惊人，经常坏机，挨骂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插件的动作如果不够快，机板流走了，就会产生坏机的情况。追追赶赶，我很累啊！拉长又凶，不分黑白是非，有时明明不是我的错，她都会说成是



成为「女工关怀」的义工

我的错。相反，我即使做得再好，她也不会欣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没想过她会改变什么。挨骂已经成为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工厂讲求生产效率，我若和领班作对，货赶不出来，上级压下级，最后还是要吃亏。”

工人的流动性极大，伟珍实在难以把大家组织起来以维护工人们的基本权利，只能一天一天地忍受下去。

“晚上加班，我的眼睛非常疼痛，视力逐渐减退，由1.5跌到1.2，自己十分担心。”

### 糊里糊涂转做传销，却没拉上一个客户

有一次，一位工友带她去听一些传销课，她被迷惑了。

“哇！那场讲座，我听得心服口服！演讲者是专做培训的，口才一流，手上不用拿稿件或资料，雄辩滔滔。他在台上高声说：‘如果你认定一份事业，做不成，那绝对是遗憾……你，在工厂永远没有发言的权利，也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相反，凭借本公司雄厚的实力，优越的制度，你只要努力，有多大的本领，就飞得多高！你，还在等什么？’每个在场的，都想一下子交上3900元，成为那家公司的业务员。不管运用什么方法，能交上3900元，成功就快人一步了！升职很快，由初级业务员到中级业务员，再升到高级业务员，然后是主管、助理经理、经理、高级经理等，前途无限。那时候，我真的完完全全被迷惑了，整个人像被操控一样。于是，我开始设法凑钱，向家人、朋友、同乡等急借。”

“公司制度是这样的：我先缴费成为其中一分子，然后找人加入，老乡、同事、朋友、邻居等，不论学历或经验，谁愿意加入都可以。每拉进一个人，那人交上3900元，我就会得到公司派发的直接奖赏。若那人跟我一样，拉进其他

人，我更会得到间接奖赏。这就像串线一样，一个接一个，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人脉关系链带，你拉我，我拉你，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奖金。董事长是江西吉安人，是公司宣传书刊的封面人物，据说他每月的收入为三十多万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听着听着，我当时疯狂了。”

伟珍慢慢才了解到公司属传销业务性质。

“那天放假，一个旧同事——湖北女孩邀请我和四川的朋友一起去东莞，她说那家公司比工厂好，福利丰厚，每月的工资有一千多元，值得考虑。一直以来，她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她曾说过我跟她的同学很像，昔日一起读书，一起生活，把我当做她一样。我十分感动，对她极为信任，视她为知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也太天真了，一千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会那么容易赚取呢？但那时自己却没有深入细想，一方面紧急凑钱，另一方面跟她们一样每天听公司讲课，然后立刻写信或打电话约人上去，听课就是上班。公司每天讲课，分为个人素质、沟通和业务建立3个主题。我的四川朋友以学计算机为由骗了家人的钱，加上打工储存的2000元，比我更快地成为了公司合格的业务员。还有一个男的，他很想干一番事业，听课也十分投入，誓要在很短时间内成功，竟拒绝回乡探望生病住院的爸爸。那时候，我们共8个人，有男有女，租用了一个三房一厅。大家生活得非常节约，每天吃萝卜、白菜，总是吃不饱，因为我们没拉到客户就没有收入。唉！我交不了3900元，又拉不到客户，陷在了困局中。我的上司已是中级业务员，每个月赚三千多元，理想是开办像‘家乐福’一样的连锁超市，而我仍是一无所有。”

“后来，家人病了，并且恰巧其中一人坚决退出，我俩

便不约而同地离去。否则，我是不好意思离开的，那样好像个人放弃前途，半途而废。”传销美梦是现实还是神话？该公司单单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拉结关系和聚合入会费敛财，而没经过任何货品或服务交易，怎能算正规的业务？然而，伟珍没有深究下去。

人在异乡，她感到茫然。

### 寻找生活的新力量

1999年，伟珍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女工关怀中心，并成为了核心义工。

“进来中心玩，结伴同路人。最初，我问中心职员到底要不要交钱，这可能是受以往经历的影响。她们非常亲切，我如释重负。中心给了我温暖的天地，像家一样。我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打乒乓球、唱歌、跳舞、读书讨论、探访宿舍、义工培训等，不加班的时候，我甚至天天都去。记得一次讲座是关于打工妹被骗的遭遇，别人所得的教训对自己是宝贵的提醒。再者，我在中心学到较全面的《劳动法》知识，能自我保护。”

伟珍称得上是“女工天使”，经常和其他打工兄弟姊妹互相帮助，分享经验和教训，并宣传中心。

出来打工数年，伟珍不甘心只是一个打工妹。

“在工厂做事，我从没特别喜欢过什么，还不过是一个普工，不会有任何发展。厂里的劳动条件差，上下班的时间没有规律，生产安排混乱，白天在宿舍等候上班通知，整日不能外出，否则就以旷工论处。因此，往往到了傍晚才能上班，接着工作至深夜，早上8:00起来又上班，加班赶货，非常疲惫。但另找工作也不易，我懂白话，只有初中学历，



很多地方都要中专或高中毕业的。我心里好烦，自己想在深圳发展，但找不到门路。”

伟珍计划存了三五千元就回家，开家小店养活自己。近年来，她开始面对家人催婚的压力。对于仍是一脸孩子气的伟珍来说，她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太早不好。18岁就结婚，就做妈妈，我觉得那太小，对做妈妈的责任都不知道，不是一件好玩儿的事。如果结婚晚一点，自己还能干点什么事。城市里这么好，找点事做对以后好一点。

“面对父母的催婚，我还是有压力的。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但让父母为我的事操心，我也一样不忍心。如果我回了家，的确不想结婚，父母也没办法，他们不会勉强我，只是我觉得那样不好。若真的回家，我会想一些办法去做生意，比如卖小吃、开服装店，人都长这么大了，要找点事做，不能光靠父母活吧？自己起码要挣出买日用品的钱。我整天总是好烦，乐观只是表面上的，其实我内心是很烦的。”

事实上，伟珍在近五年的打工生活中只回过一次家，那是在1999年3月。但两个月后又出来了，她形容当时是“慌着要出来的”。

“那时好像在外漂泊惯了，对家的环境有点不习惯了。在家没有那么多的人玩，最多是看一下电视，串一下门儿。好像是在工厂工作习惯了，我不喜欢呆在家里，回家的第一个月就是去找几年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和朋友。爸妈和别人都说我：‘人家回家就不想出去了，可你回家却偏偏要出去。’”

近五年重复不断的流水线生涯让伟珍疲倦不堪，她很想叫停。2002年一个秋天的黄昏，她终于回家了。





# “人间丛书”出版缘起

邹崇铭

乐施会高级推广及出版干事

站在2004年末端，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富强兴盛，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萦回心头的主旋律。在上个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和贸易急速发展，欧洲科技和工业欣欣向荣，加上彼岸的美国迅速崛起，令人憧憬着一个美丽新世界出现了。这边厢，满清王朝古国刚从列强的炮火中惊醒，急步面向国际的崭新形势，洋务、西学、维新、立宪、共和……数年间已进占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位置。

直至85年前，“全盘西化”似乎已成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共识，民主和科学是其中的核心价值，被视为是民族富强之钥，并促成中国达至短暂的统一，沿海的繁荣和公民社会的雏形。在同一时间，那边厢的欧洲，却从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方向，现代化的期许没有如期呈现。随着2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来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步伐更是骤然停顿，并间接助长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崛起，人权和自由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直至55年前，西方国家已从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站稳，展开新一波以美国为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与此同时，这边厢的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民族自主自强的基石。但此一进程，却同时令中国与国际发展再次脱轨，重新回到相对封闭的岁月。

直至35年前，中国正陷入极左的运动之中，孤立于国际社会以外。西方社会亦同样出现左倾的浪潮，对资本主义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推动环保、反战、女权、种族平等浪潮的兴起，进一步提升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促进了西方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

直至25年前，西方国家已饱受石油危机、政治失效和通货膨胀的困扰。这边厢的中国，则开始重新抬头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但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百多年来首次让人民普遍得到温饱，同时亦令个体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力，重新得到了解放。

直至15年前，社会改革的浪潮已席卷全球，东欧社会主义的围墙被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往后的数年，在这边厢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亦正式确立，城市的生产力进一步获得释放，并借助全球经济升浪的推动，令中国经济开始全面与国际接轨。

直至5年前，正当中国如火如荼地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时，那边厢的西雅图世贸会议却平地一声雷，揭开了反全球化浪潮的序幕，并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既创造了大量财富，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同时亦加剧了贫富悬殊，令发展中国家经济进一步受发达国家的支配，令发展中国家的人变成企业和市场的生产工具。

直至现在，中国已是世贸组织的一员，左右谈判的实力亦与日俱增，而且随着国力的不断提

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亦大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民间组织得到成长。一百多年前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梦想，看来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然而，发展、进步、效率，是否就是中国现代化功业的全部？与国际社会全面接轨，是否就是民族富强兴盛的唯一终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否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西方经济发展曲折漫长的道路，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早在三四十年前，台湾、香港和邻近地区，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中发展起来，成为所谓的“东亚经济模式”。约在二十年前，陈映真先生在台湾《人间》杂志创刊词中指出，由于整个社会的勤勉工作，当时台湾已经创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富裕、饱满的社会：这是台湾人民值得骄傲的成就，但也令他们付出了一些代价。“因为社会高度的分工和组织化，造成了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之间，一个市场和另一个市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人与人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之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失掉了目标。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

“东亚经济模式”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以外的选择，企业被认为在强调竞争之余亦应重视社会责任。英美个人主义和欧洲、日本团队主义的发展模式，对于组织的形式和个体的保障，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在全球化浪潮横扫世界的今天，经济发展是否只剩下单一模式？西方国家以往经历的发展阵痛，后来者能否避免重蹈覆辙？资本主义在全球带来的种种问题，又能否得到修正和改进？

过去25年，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下，中国人民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亦逐步扩大，流动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平等的对待，国企改革令大量工人下岗，自然环境和天然资源亦受到过度的耗损。在都市繁荣的身影背后，弱势群体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市场失效”的情况十分显著。

“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破了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迷思，强调经济和社会必须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城乡和地区的差距必须加以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张力亦必须得到协调。这些都有别于过去25年局部发展、区域发展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体现？市场与个体的关系如何重新界定？公民社会又能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挑战。



乐施会是一个独立的发展及救援机构，建基香港，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与贫穷的人一起面对贫穷和苦难，让所有人都得到尊重与关怀，享有食物、居所、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基本权利，在持续发展建设中建设一个公平的世界。

乐施会于1976年由一群志愿者成立，关注贫穷问题，其后于1988年在香港注册。乐施会是国际乐施会12个成员机构之一。自1976年以来，乐施会先后在全球超过40个国家推行扶贫发展及救灾工作，帮助贫穷的人改善生活，自力更生。

自1987年开始，乐施会便致力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社区组织发展、农村综合发展、增收活动、小型基本建设、卫生服务、教育、能力建设及政策倡议等。

从1991至2003年，乐施会在内地开展赈灾与扶贫发展工作，投入资金总额超过两亿元人民币。现时在国内19个省市，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重庆、陕西、甘肃、内蒙古、青海、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海南、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及广东等地，均有扶贫、发展或赈灾项目。受惠人口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偏远山区的农民、妇女和儿童等。近年，乐施会在城市开展项目，对象包括流动人口、工人等。

#### 乐施会香港总办事处

香港北角马宝道28号华汇中心17楼

电话:(852) 25202525

传真:(852) 27899545

电子邮件: china@oxfam.org.hk

网址: www.oxfam.org.hk

平  
等  
PDG

## 北京项目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小区10号楼

蓝筹名座B座一单元301室(邮编: 100020)

电话:(86) 10 65512635 65512636

传真:(86) 10 65511521

电子邮件: bjo@oxfam.org.hk

## 西南项目办公室

云南昆明市西华小区东区7栋4号(邮编: 650032)

电话:(86) 871 4142033

传真:(86) 871 4150599

电子邮件: swpo@oxfam.org.hk

## 贵州项目办公室

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158号发成旅社一楼(邮政编码: 550025)

电话:(86) 851 3621892 3621938 3622948

传真:(86) 851 3622148

电子邮件: gzo@oxfam.org.hk

## 甘肃项目办公室

甘肃兰州市天水路298号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17层1711-1713室(邮编: 730000)

电话:(86) 931 8910905

传真:(86) 931 8910904

电子邮件: gso@oxfam.org.hk



## “女工关怀”简介

“女工关怀”于1996年创立，是一个非牟利的民间注册团体。本会宗旨乃全面提升中国外出女工互助的能力，争取劳动及性别权益，实践女工自主。我们的成员有劳工组织者、女性主义者、大学教授、社会服务者、文化艺术工作者、工人和学生，透过筹划多元的培训及组织项目，支持女工团结，倡议草根参与，追求民主发展和社会公义。

### 本会四个工作方向是

推动劳动权益  
提高女性意识  
推广职业健康安全  
实践女工自主

电邮: [cwn@cwwn.org](mailto:cwn@cwwn.org) / [exco@cwwn.org](mailto:exco@cwwn.org)

网页: <http://www.cwwn.org>

